〔德〕弗·鲍尔生 著
滕大春 滕大生 译

德国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德国教育史

〔德〕弗·鲍尔生 著

滕大春 滕大生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德国教育史

〔德〕弗·鲍尔生 著
滕大春 滕大生 译
责任编辑 韩书玉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县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64,800
1986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7012·01076 定价 1.25 元

译者的话

本书著者弗利德里希·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是德国柏林大学的知名教授。在本书内,他以简练的笔法,将从中世纪起德国教育的发展,钩弦提要而又重点突出地作了叙述和评议。出版后,欧美各国学者予以好评,在教学和著作中曾纷纷征引,用为权威性的论据,其重要性是可知的。兹根据英国劳伦兹(T. Lorenz)的英译本《德国教育的过去和现在》(German Education, Past And Present)译为中文,供国内研究教育科学的同志参考之用。内中译误之处,敬希指正。

在此应当说明,作者是资产阶级学者,他的论述是凭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加以分析批判,以期对德国教育的演变获得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1985年9月15日

序　言

托布纳(Teubner)出版公司邀我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丛书》撰写一部论述德国教育对德国历史发展的影响的著作。这对我倒不是不适合的任务。我想即使在我所规定的有限篇幅内，这部书也不仅能使人们增加一些历史知识，而且能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德国教育的现状和未来。这样一本概括的著作，对各历史时代及其有关人物，自难做出详尽周密的阐述。正因为如此，却更便于突出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同时也有助于向前展望和有利于推动教育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去。教育史的著述本来易于陷入叙事过于详尽和探讨漫无目标，我的力求精简或许使这部教育史有助于今日教育政治家的参考。从这观点出发，我想对早期教育发展的叙述尽量从简，而对近期教育成就则务求详尽，这样略古详今谅非荒谬。

本书所遵守的历史原则是：教育发展并非孤立的运动，非自始至终与世绝缘的运动，而是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在任何地方，我都把广阔的人类精神生活发展的趋势及其在教育上的影响，尽可能清楚而明晰地显示出来。对于各种教育主张、教育法规、学校课程或具体设施以及不同地区的特殊作法，等等，我都作详细介绍；不过，这种介绍不是只追述一些枯燥无味的年月和事实。读者如通过这部德国教育简史能够对于德意志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社会思潮的发展，见其一斑，我就深引为慰了。

弗利德里希·鲍尔生

于柏林-施特格利茨(Steglitz)

《德国教育史》目录

第一卷

中世纪的教育制度

第一章

中世纪教育的一般特性

古代教育、中世纪教育和现代教育的显著区别 在古代，个人是为国家而受教育的；在中世纪，个人是为教会而受教育的；在现代，个人是为个人自己而受教育的。这样描绘欧洲文化史上三个伟大时代的教育特点，是带有片面性或有些言过其实之处；但在历史的概括上，这是难以避免的。

在古代，统治社会的是国家，即城邦。因此，教育目标是使青年一代，无论平时或战时，都要适于为城邦作出有成效的贡献，使城邦借此得以保持永存。正是这个原因，教育便把"为城邦服务就是为城邦之神服务"，作为超乎个人的现世利益之上的人生目标和人生意义。

在中世纪，社会是在教会势力的控制与支配之下，教育的目标只能是按照教会的宗教教义去引导青年一代，以"上帝的永恒天国的公民"作为人生最终的目标和最高的目标。

到现代，国家已升为不受教会支配的、最后甚至成为超越教会之上的政治权力机构。由于国家和教会这两种社会现实力量的冲

突，遂为个人享有更能独立生存的权力创造了条件。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视人格发展为个人的自由与至高无上的权利，已成为现代史上天经地义的问题。这种思想倾向在教育领域和在其它任何领域一样，越来越加明显；把人教育成为有理性的人和有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人，正逐渐成为教育的主导思想。

中世纪教育的宗教性质　如果我们注意观察中世纪的教育体系，就可看到教会里流行的追求永生和信仰超现实的宗教思想，在教育中已成为两大明显的特点。第一，有关全社会的一般道德与文化教育，其中包括青年教育在内，无不具有宗教和教会的性质；它是由教会举办的和为教会服务的、非为今世而为永生的教育。第二，只有僧侣具有享受专业教育的机会，公共的道德与文化教育机构全是专为僧侣设置的。寺院僧侣和非寺院僧侣所进行的和所接受的教育，是在教会主办的教育机构所进行的唯一的专业教育。世俗群众从来没有为自己特设的学校；直到中世纪末期，这类学校才开始设立。在此以前，一般群众只有仰赖僧侣学校的眷顾，作为僧侣学校的"客人"，去接受僧侣所规定的有关教义和教规的课程和培训。

当时的教育组织同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具有密切的关系。在社会上，主要分为僧侣和俗众两个等级。在僧侣中包括寺院僧侣和非寺院僧侣；在世俗群众中，统率军队的武士后来逐渐同农民分开，而成了专业的骑士等级。到中世纪的最后几世纪，由于城市获得了独立的权力，又产生了新的区分，即自由市民又形成了资产阶级或中等阶级。

僧侣阶级　在四个等级之中，僧侣的地位最高。他们被公认为社会的领导者，他们至少在文化生活中是无可非议的领导者。他们规定信仰和道德的准则；他们不仅管理人们的灵魂问题，也要管理人们的思想问题。就僧侣等级而言，似乎同有组织的专业教育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艺术和科学是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中所必需

的；从最初级的传授读写起，直到最高级的解释经文中的上帝启示和按照上帝意旨指导人的灵魂，他们都离不开艺术和科学。他们要获得艺术和科学，除通过有条理和有系统的教育之外，别无它途。此外，他们学习多科知识，不论有关研究方法的或有关研究目的的，都必须借助一种外来语文为媒介，即天主教会惯用的拉丁语文。拉丁语文学习完了之后，还须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因为《圣经》原本是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书写的。僧侣具备了上述的教育，才算达到一般布道的水平。即使极平常的僧侣也要有一定的学识，要熟悉一定的书写艺术和教会语文，要会唱歌和懂得宗教仪式，等等。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僧院学校、教区学校以及教团学校便纷纷诞生了。

贵族阶级 第二等级，即世俗贵族，在中世纪还没有必要到公共教育机构去接受什么专业教育。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战略和战术以及世俗政治，还没发展到象司祭和教师那样需要进行专业教学的程度。无论如何，人们从幼年在实际活动中就学到了那个时期的战术和政治，是不须通过有系统的教学去学习的。纵使贵族们偶尔要借助于学术知识、书写艺术和拉丁语文，他们身边的僧侣是随时可作他们的秘书和顾问的。当贵族子弟感到需要懂得一些“公文技艺”时，他们可到任何传授这种知识的学校去学习。后来，从十字军东征起，在骑士等级中有些有学养的世俗贵族逐渐变成撰写骑士诗歌的世俗文化的代表人物时，他们子弟的教育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世俗文化在当时尚不被视为“学术”，也是无需通过正式教育就能学习到手的。在中世纪，青年骑士还没感到需要象十七世纪“骑士学院”(Ritter-Akademien)那样的专门学校。未来的骑士从幼年参加日常生活的活动中，就学会了将来担任宫廷或贵族官邸职务所需的艺术和学识。贵族的青年子弟倘若准备将来担任“圣职”，在儿童时期就可以作为“学员”去参加各教团在教

堂所设立的僧侣会组织。

农民和市民阶级 农民和城市商人阶级当然更不需要专业的公共教育机构。农民的孩子在参加家庭日常的操作中，就学会了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手艺人和商人的孩子则到老师傅开设的作坊和商店里去当学徒。在那些社会生活已进步到需要一些阅读书写和计算能力的都市里，附近的僧院学校和教区学校都给儿童们提供了就学的机会。由于这种入学的要求不断增加，靠近中世纪末期，遂出现不依赖教会而独立设置的教育机构，即城市学校（City—Schools）。这种城市学校同今日为中等阶级所设的学校，是没有共同之处的。这些学校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同僧侣学校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伦理的和宗教的倾向 我们应当看清中世纪的青年教育，不象今天德国学校那样以传授知识和学识为主要目标，而是以培养意志和情操为主。教育的主要意义是塑造青年成为信仰坚定和态度恭顺的人，就是使他们相信教义、服从教会并忠于上帝、忠于人类。教育注重使青年们在那种讲求敬畏、讲求恭顺而不讲求理智探索和不准自作主张的气氛中，发育成长。他们的学习方式是以恭敬的接受为主，学习方法就是用心死记和反复诵读所习的内容。

中世纪教育的两个时期 中世纪的教育史可分为两大时期，前期以十二世纪为终结，后期以十五世纪为终结。

两时期的不同之处大致如下。中世纪前期的特点是一些新兴民族，特别是德意志人，完全以被动接受的态度对待基督教和古代文化。他们象虚心的学生般地接受教会传授给他们的教义和教会从古代文化发源地吸收来而尚未完全消化的古代文化财富。到中世纪后期，一种独立探索的精神显露出来了。人们努力运用个人的理智去理解宗教教义，并把世俗科学和世俗哲学渗入教义之中。伟大的经院哲学体系和经院神学体系，就是这时期努力奋斗的产物。

文化知识是同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都市生活的蒸蒸日上，为新文化准备了发展的土壤。在教育领域里，这些变化立刻促使两种新型教育机构，即大学和市民学校，发展起来。这两种学校都是以都市生活为基础的。大学发展得很快，不久便使旧日僧院和教团的学校的地位一落千丈；同时，市民学校中的中产阶级也在文化知识领域进步到崭露头角的地位。

基督教的教团组织 基督教内部的各派教团也发生了变化。在十三世纪建立的多明我会(Dominicans)、芳济会(Francisans)和奥古斯丁会(Augustinians)等新的教团，很快便遍及欧洲各地。这些新的教团同旧的教团不一样，旧教团指的是宾尼迪克特教团(Benedictines)及其派生出的一些支派。宾尼迪克特教团的成员是在幽静的乡村谋求发展，新教团则在城镇定居了。当旧教团避离人群而退隐山林的时候，新兴的行乞的修道士便开始把周围的社会人士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了。他们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且要用教学与布道来拯救世界。多明我会就以教学和布道而闻名于世，并且在这一点上还成了耶稣会 (Jesuits)的先行者。多明我会和芳济会都因中世纪大学的名教授和建立哲学体系的著名学者多是他们的成员而感到自豪。其赫赫有名的，如亚伯特·马格努(Albertus Magnus, 1193—1280, 德国哲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 —1274, 意大利哲学家和神学家)和艾克哈特(Master Eckhart, 1260? —1327, 德国哲学家)，都是多明我会的会员；又如布纳芬杜拉(Bonaventura, 1221—1274, 意大利神学家)、斯克德斯(Duns Scotus, 1265? —1308, 英格兰哲学家)、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6, 英国哲学家)和奥克姆(William of Occam, 1285? —1349?, 英国哲学家)，皆系芳济会的会员。由于这些才识出众的成员所作出的贡献，新的教团遂享有威望而非旧的教团可以相比了。

第二章

中世纪前期——僧院学校、教区学校和教团学校(600—1200)

僧院学校　德意志最初的教育组织出现在七世纪。当存在于法国摩洛温王朝的古代罗马教育体系的残余在欧洲大陆逐渐消亡时，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修道士便渡过英伦海峡，把基督教传给了德意志人，同时也把那与教会生活结为一体的学术基础知识传给了德意志人。宾尼迪克特在巴伐利亚(Bavaria)、苏阿比亚(Suabia)、图林吉亚(Thuringia)和赫斯亚(Hessia)所建的僧院是德意志土壤上最古老的教育建筑；富尔达(Fulda)、雷钦诺(Reichenau)、圣葛琳(St. Gallen)和台葛恩西(Tegernsee)是当时的著名僧院。僧院学校本来是专为培养未来的修道士而建立的；但是后来一些不准备作修道士的儿童也被允许入校学习，并且由于这种学生不断增加，学校在内舍生(Schola interna)之外，又增设外舍生(Schola externa)。这是可以从现在保存的圣葛琳修道院的规划上看到的。

教区和教团学校　僧侣教育第二个起源是各教区主教举办的教育。主教的职责是为所属教区培养教民。最初，主教指定一位僧侣负责监督这项培养教育工作，后来便发展成为教区的学校，习称教区学校。随后，教团也采取同样教育方法培养接班人，教团学

校也就诞生了。梅兹城的克罗迪冈主教(Bishop Chrodegang of Metz)于742—766年对学校进行整顿,规定教区教堂和教团教堂的教士都应按照教规过一般的僧侣生活。这种办法曾被普遍采纳,对于所有这类教区学校和教团学校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查理曼(Charlemagne,世称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查理曼于768—814年登上法兰克王位期间,对于零乱的学术苗床进行有系统的大力整顿。这位新世界帝国的缔造者以恢复自罗马衰亡即失去的西方统一之局为目标,同时也渴望自己成为支配各国的统治者和教育者。他到意大利参观无数碑碣和遗迹时接触了大量古代文物,便以其卓越的才能,为着丰富他的臣民的精神生活,不知疲倦地从无穷的古代文化资源中,积极吸取营养。他的宫廷成了当时著名学者聚会的场所;他同他们结为亲密的朋友,并且不耻作他们的小学生。在这些文人之中,有著名的文法、修辞和辩证法大师,即盎格鲁撒克逊的阿昆(Alcuin),他所著的这些学科的课本迄今尚存;有著名的希腊文诗歌作家,即郎古巴(Langobard)的鲍鲁斯·戴康纳斯(Paulus Diaconus),还有著名的拉丁诗人,即奥尔良的狄奥多夫主教(Bishop Theodulf)。法兰克原有的宫廷学校更重加建设,并置于阿昆的指导之下;查理曼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到那里,同一些显贵子弟一起学习。后来,阿昆在杜尔城(Tours)的圣·马丁大寺院任住持时,又在那里建立一所著名学府,使之成为法兰克帝国的高等教育中心,终致广大的帝国境内无不受其影响。后来富尔达僧院学校的领导人毛路斯(Hrabanus Maurus),即是该学府的最优秀学生之一,他领导的僧院学校也是仿照阿昆的模式在德国创建的学府。

这位国王在推行他的教育宏图中,当然除去教会人士之外,是无人可资借助的。他把僧侣充当佐理之人。约于787年,在他给

帝国境内各主教和大寺院住持的通报中，曾宣布一项规划，其中的主导思想同七百年后马丁·路德在《致市政当局书》中所持见解完全一样，即不学习语文和文学，就无法正确理解《圣经》。他在通报上说，大量文理不通的呈文和诉状很引起他担心，因为缺乏学识同样可能导致对《圣经》缺乏理解。"所以我恳切地希望你们不要忽视文学的学习，只有虚心诚意地和不甘落后地学习文学，才能使你们得以更好地探索经文的奥秘。因为《圣经》中包含着借喻和比喻，一个读者的文学教育开始得越早和学习得越好，他对于神的意旨的领会也就越能深入"。

遵照查理曼的建议，亚琛城的宗教会议于789年决定，僧院和教区教堂都须附设学校，教导儿童学习赞美诗、阅读、基督教历法和拉丁语文，并以此作为教育法规；与此同时，还按照法规作了强制性的规定，即司祭的职位只授予通过考试及格的僧侣，考试的要求应当既严格而又周密。应考者必须通晓和理解担任司祭所需要的一切有关经文，能按照罗马的方法歌唱赞美诗，还能草拟文稿和书札，以上各项都要用拉丁语文是不待言的。

除对于准备作神职人员的专业培训作了规定之外，查理曼还力求提高一般国人的教育水平。如果把如今初等学校实施强迫入学同查理曼的提高国人教育混为一谈，当然是大错特错。在当时，使法兰克的萨克森的武士和农民去学习读写，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用处的。查理曼的实际意图是推行有关基督教义的基础知识教育。所用的教学方法自然是当时一般流行的方法，而且是在几百年后这类教学仍然在采用的方法。一般是由学生反复诵读教师口授的语句，直到牢记为止；教师要听学生背诵，还要按照自己当初学习的那样再给学生进行讲解。查理曼曾三令五申地晓谕全体教士，对所有教民，不论男女老幼，至少要教以《使徒信经》(The Creed)和《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一直到他们能背诵为止；

他并责成主教督促教士履行这种职责。在各教区中，不论男女，凡玩忽学习或抗拒学习者，都要受鞭笞或禁食的处分；凡拒不接受惩处者，送交国王亲自处理。

所有这些规定与其说是教育行政的组成部分，不如说是国王统治教会与国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这些条例的精神实质，从其规定每人都应能用拉丁语背诵《使徒信经》和《主祷文》一点（尽管后来因行不通而废止），就可明显地看出。那就是把它们看成是象洗礼和葬礼一样的具有威力的神秘仪式，叫人内心信服它们；同时也表示出当权者想利用它们作为约制人民的手段。对于教育史来讲，所有这些条例或许还没有查理曼后来颁发的指令更为重要，因为他在后来的指令中规定：所有教区都应有固定的歌唱赞美诗者，歌唱赞美诗者须学习读、写；其它儿童也可参加学习，而且除自愿捐献者外，一律不收任何费用。

进一步的发展 查理曼竭力以基督教的古代文化来教育他统治下的各族人民。他的教育事业有多少收获，由于缺乏统计资料，尚难作出定论。皇家命令所宣扬的改革成就与实际的改革成就之间的差距，在那个时代甚至比今天更要大些。凡是教区主教和寺院住持热心贯彻查理曼指令的地方，学校就建立得多，而且办理得好；凡不热心执行指令的地方，便大不相同了。因为当时没有强迫落实政令的办法的。国王死后，从上而下的压力显然松弛了，许多地方便恢复了以前的泄沓状态。但在随后的年代里，年轻人们如饥似渴地要求受教育的思想却依然如故；同时，教主和君主处心积虑以满足这种要求的也不乏其人。德国先后在位的各帝王，因为与希腊帝王有亲属关系，也不断以新的文化知识来丰富德国的文化教育。最初以敷衍态度信奉基督教的萨克森人，不久便受到了教义的熏陶，许多著名的宣扬宗教学术的学府随而在萨克森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从此，马德堡大教堂和贝尔根(Bergen)修道院的

附属学校乃是东方学校教育的前哨；施派希特(Specht)的调查概况表明，莱茵河地区的和南方的旧学府仍旧保持未变；而且一些新学府又诞生了。

总的看来，僧侣教育的一般水平是在继续不断地提高。查理曼王朝发出的灿烂光辉虽然慢慢消失了，曾经一时照亮了黑暗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异彩也黯然失色了；僧院和教堂附设的学校的数量却始终在增加，其所出产的成果，不管怎样不惹人注目，也不管怎样缓慢，却始终未曾停顿。学校教育在十二世纪末叶，要比在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period, 751—987年，法兰克第二王朝，随后分为东西两法兰克，东部即德意志，西部即法兰西)的末期普及得更为广泛。对文艺复兴时代一味热情歌颂，而见到一般的学术研究低潮或某个别著名学校的倒台便不胜其慨叹，这样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是容易误入歧途的。看不到人类历史中这种逐渐向前演变的趋势，就确实无法理解十三世纪大学的突然兴起。实际上，大学的兴起完全是大量教徒和群众渴望求知所促成的；而一般学术基础知识，特别是拉丁语文的基础知识，便随着人们求知欲的高涨而发展起来了。

教学方法和教材　现在需要概括地介绍一下旧日的教区学校和僧院学校的课程。这些学校以教育人们精确地理解《圣经》的要义为目标；当然学生们并不能都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他们把艰深枯涩的"圣经学"视为最高的学科。一般学习者达到最终目标须要经过三个学习阶段：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第一阶段叫学生按照A、B、C字母表硬记字母。然后学习朗读，自然是朗读拉丁文；同时也背诵一些颂圣诗。随后再学习书写，通常是先在蜡板上练习；用笔和墨水在羊皮纸上书写是到充分掌握书写艺术的时候才进行的，因为真正的书法确实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的。在进行这些学习的同时，每天还要练习唱歌。学生在第二阶段则学习

一般性的基础学识。在中世纪，这些基础知识的学习程序是按照五世纪马西阿那斯·开匹拉(Marcianus Capella)所提出的“七艺”(Artes liberales) 来分科进行的。七艺分为两部分，即初级三艺(Trivium)和高级四学 (Quadrivium)。前者称为形式艺术或讲道艺术，其中有文法、修辞和辩证法；后者称为真实艺术，其中包括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文法当然指的是拉丁文法。拉丁文的朗读、书写和背诵等预备性质的练习，都要在第一阶段完成。在这时候，要有系统地进行语文教学，最初以道纳特(Donatus)编的文法为课本，后来以普利西努(Priscianus)编的文法为课本；同时还要阅读拉丁古典作家和基督教时期作家的作品，魏吉尔(Virgil)的名著在其中占最重要的地位。在修辞学方面，西塞罗(Cicero)的《论文集》最受欢迎，它指导学生能正确地草拟各种文件，附带着也讲一些法律知识。辩证法以包伊夏斯(Boetius)的著作为主要依据，它指导学生如何按照艺术规律掌握概念；并通过正式论辩以提高掌握论点和反驳论点的能力。算术最主要的用途是确定基督教的节日。几何学不很受重视，早期的几何学还包括地理和各国疆土的知识。音乐由于在宗教仪式中占重要地位，所以是受重视的学科；包伊夏斯的五部《音乐论》(De Musica) 是研究音乐理论的基础。天文学有助于确定每年的节日和每天祈祷的时间，同基督教的活动有密切关系，因而各地也都予以重视。

所有这些世俗学科，在当时都是第三阶段应达到的最终目标的从属性学科，也就是讲述上帝启示真理的神学的附属学科。在理论上，世俗科学的价值只在于它们对《圣经》能作出逐步深入的解释。无奈学者往往把兴趣集中在追求新知识上或不断增长自我表现的能力上，却从根本上忘掉了神学的目标。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非从基督教根源上发展起来的世俗艺术，除非能为神学服务，都没有存在的权利。就古典作家的名著来讲，尤其是这样。只是

因为语言、文学、诗歌和传奇等知识都离不开古典作家，也就是说，基督教文学是从古典文学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才承认古典作家的用处。不料后起的傲慢之士有时竭力摹拟古典作品来显示自己的才智，甚至以这类华而不实的作品来装点神圣事物。这类怪事恰恰可用一般常引用的史实来作比喻，那就是以色列人由埃及出走时，掠夺了埃及人的金银器皿，并把这批赃物制成了供神的器具。更有甚者，他们还故意强调，无论个人还是全体男女老幼，都应提高警惕，不要读那些非基督教的诗人的作品，以免他们的灵魂受到色情淫猥的异教精神的污染和败坏。在这样的年月里，基督教诗人的作品便从书架上被拿了出来，利用它们去取代古典名著，在教育青年时尤其如此。因此乃引起社会上前所未有的普遍反感，教会对此也不得不公开承认。甚至在十六、七世纪的清教徒运动中，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女子教育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并未完全排除妇女于文化教育范围之外。女子在修道院的生活中，就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有学识的修女也并不罕见。女修道院和僧院一样地成为学府，而且对不准备终身作修女的妇女也是开放的。从中世纪后半期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情形始终很是盛行。在新兴的大学不准许女子入学时，高门的青年妇女实际上仍然被送到女修道院接受教育的。因为骑士制度的兴起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她们的文化教育也随而受到尊重。可以想象，当骑士盛行时期，妇女的文化教育几乎无例外地至少不亚于男性，因为男性的军事训练和专门职业教育使他们无暇从事文化学术的研究，妇女遂得享有文化教育的权利了。

第 三 章

中世纪后期——大学和城市学校
(1200—1500)

大学的兴起　在西方教育史上，十三世纪大学的兴起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当时人们强烈探索知识的欲望促使新科学诞生了。以阿伯拉德(Peter Abelard,1079—1142)为代表的新思辨神学和新思辨哲学，大胆地设想上帝是人们凭赖理智所能理解的，甚至还可作为人们能够批判的事物。以爱尔纳里亚斯(Irnerius)为代表的新法学，乃是导源于旧罗马法而与教会法并存的独立法学。以"宇宙博士"亚伯特·马格努为代表的新自然科学和新医学，则是以丧失多年却又被重新发现的亚理士多德的著作和以后问世的阿拉伯学者的著作为基础、并以自由调查研究自然现象为依据的新科学。

所有这些新涌现的向知识进军的力量，到十三世纪末，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大学，这种大学是既享受独立自主权，而又经政府许可的学者们的组织。首先建立大学的是欧洲西部和南部各国，如意大利的波隆那(Bologna)大学和莎莱诺(Salerno)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蒙培利(Montpellier)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西班牙的塞拉曼加(Salamanca)大学。东方和北方的国家，包括德国在内，到了十四世纪中叶以后才跟着建

立了大学。旧德意志帝国境内最古老的大学有布拉格(1349)、维也纳(1365)、汉堡(1385)、科伦(1388)、艾尔富特(1392)、莱比锡(1409)、罗斯托克(1419)等校。事实上,在德国境内象大学那样进行学术研究的机构,在相当时期以前早已存在;例如,科伦和艾尔富特在很久以前就出现了有名的神学和哲学的学府。从1456年到1506年,又有第二批九所大学出现,它们是1456年建立的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1457年建立的夫莱堡(Freiburg)大学,1459年建立的巴尔(Bale)大学,1472年建立的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大学,1473年建立的特里尔(Treves即Triev)大学,1477年建立的麦恩斯(Mayence)大学,1477年建立的杜宾根(Tubingen)大学,1504年建立的魏丁堡(Wittenberg)大学,1506年建立的法兰克福(Frankfort-on-the-Oder)大学。巴黎大学是德国大学的主要典范,并且巴黎在当时仍是公认的哲学和神学的研究中心。

大学的组织 就组织而言,大学可以说是教会和君主授予特权的师生独立团体。它是合法的组合,在这组合之内,得以传授广泛的知识,师生享有特殊权利和豁免待遇。大学最主要的特权有三项。第一是教学权以及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的考试权和授予权;这些都是宗教权威(罗马教廷)赋予的。第二是自治权,就是说,大学的章程和规则由大学自行规定。第三是独立审判权,大学师生不受普通法庭的传唤,并免交各种租赋和税收,这是地区或市政当局赋予的特权。

为了充分行使这些特权,中世纪大学具有双重组织关系。为便于掌握教学和考试,大学实行学院制,即分成神学、法学和医学等三个专业学院,和一个实施普通教育的文学院。文学院是低级学院,它把古代的"七艺"加以修订,作为教学基础,其水平是介乎注重学习拉丁文的文法学校与神、法、医等专业学院之间。各学院

分别选举院长主持院务。所谓院务主要是安排课程和分派教学任务,主持论辩会,办理考试和授予学位。各学院通过授予硕士学位也就扩大了自己的学术队伍;因为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或医学硕士学位的人,同时也获得在各该学院的授课权。在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大学与最高权力机关(即教会)在一切原则问题上,都能保持一致。因为大学校长都由在教会有地位的人担任,所以虽则颁发证书,无非是走走形式而已,但实际上却必须经校长批准。

为了行使自治权和审判权,一些欧洲大学的师生常根据出生地区,分别组成若干"同乡会",各同乡会自行选举主席和财务人员。大学这种组织的首脑叫校长(Rektor),是经选举产生的大学主持者。以意大利的波隆那和莎莱诺两大学为例,校长一职都由享有声誉和承担经费开支的显贵家庭出身的学生充任,一般事务工作则由另一年龄较大的成员担任。在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德国大学的同乡会存在不久即被废止,即使还有,也不过苟延残喘。它们从开始就是在当局指示下建立的,并不同于意大利和法国大学中那种自发组成的同乡会。

教学科目 大学教学须照固定的规程进行。教学的范围大体上是由传统来决定。各科教学都须按照教会审定的课本进行。在神学院,关于基督教义的教材是依《圣经》经文和教会教规来编成的;只有在讲解、系统整理和论证这些教义时,教师的个人思想才有发挥的余地。在法学院,教学主题是这样规定的,教会法是以宗教议会和罗马教廷公布的教规和命令为依据,罗马法是以东罗马查士丁尼法典(the Code of Justinian)为依据。教师只能讲解和写出大纲,任意发挥是不可以的。在医学院和文学院(两个低级学院),教师个人思想活动的范围略大一些;不过对于标准课本中经过审定的内容,也没有个人发挥的余地。在医学院,希波克拉底(Hippoczates)和伽林(Galen)的著作,恰如文学院(有时也称哲

学院)中亚理士多德的著作一样,起着一种教规式的权威作用;掌握他们的著作内容乃是学习的主要目标。

教学方法 中世纪大学所采用的教学方法,自然要按照上述处理教材的情况而定。四个学院的教学方法都不外讲授和论辩。讲授的目标不是象现在学校那样系统地阐述学科内容,当然也不是口头背诵课文,而是讲解学生手持的课本,对课文加以注释和摘出有系统的纲要。"评注"和"摘要"遂成中世纪两种主要文献。论辩的目标是检查学生对课堂讲授的教材能否实际运用,也许是使学生通过对教材的再次运用而记得更牢固些。在大学举行的庄严的论辩会上,全体师生一起参加。先由一位教师提出某些"论点",其他人依次根据逻辑推论进行驳斥;论辩人只能以揭发对方在逻辑上的谬误或违反一般公认的原则之处,来进行反驳。在课堂中为了实地练习这种对于各个论点进行驳斥与反驳斥的艺术,大学生也举行定期的论辩会。论辩时启发自动思考和快速运用所学的知识,当然是最恰当的方法。因此,论辩成了讲授的必要补充,因为讲授主要还是叫学生被动地接受。

学习的过程 大学各学院对学生学习的进度,都一步一步地作了细致安排。为了取得参加考试的资格,学生必须听完课堂中一系列的讲授课程和参加一定次数的论辩会。通过第一种考试者可以获得"第一级学位",即学士学位。他们要取得参加第二种考试资格,还须再听一些学术报告和作一些学术报告;通过这次考试就可获得最高级学位,即硕士或教师一级的学位;后来当高级学院颁发博士学位时,硕士又处于低级学位的位置了。考试和颁发学位典礼一般都同时举行,文学院尤其如此;各院所举行的典礼都是很庄严和很隆重的。所有这类考试都纯属学术性质,而无授官的性质。获得学位只证明学习的成就,并不意味已经获得任何工作职务;不过,其中却含有推荐的意义。只有"僧侣的生活待遇"的享

受者，情况略有不同，因为享受此项待遇的大学生，不啻取得了将来充任教会职务的委任状；不过，就今天的情形看，学术成就和学术学位既不是获得此项待遇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不是获得此项待遇的可靠保证。

中世纪学生学习的进程大致是：学生先入僧院学校、教团学校或城市学校，学习一些文化知识和拉丁语文。约到十五岁时，便须前往大学，在繁多的艰苦的入学测试之后，才得宣誓并注册成为大学成员。年龄很小而被准许入大学的人也是常见的；在很多地方，这种入大学前的准备教育是由大学附设的供应食宿的预备学校来提供的。按照一般情况，大学对每个学生都指派一位文学硕士作为专任导师；学生须住在大学所设的宿舍，或住在为教师所设而受大学监督的宿舍，接受导师的监督。在此后几年内，他主要是在课堂听讲亚理士多德关于逻辑学和物理学等理论，要参加学院举办的论辩会和进行辩证法的练习，还要提高拉丁语文方面的知识。最后，通过第一次考试，他便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以后，他再听两年较高深科目的讲授，其中有心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同时学习数学和宇宙哲学，并以助理教师身份参加教学和论辩会。最后，再通过第二次考试，他就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到此时，一般的年龄都是二十岁或二十一岁。此后，他便开始自己负责讲课和主持论辩会了；在许多地方，他至少要在大学担任两年教学工作。另外，他还可升入高级学院，继续学习神学或法学，医学在德国是不受重视的。这时，他便按类似上述的程序，以几年的时间，争取获得神学或法学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在获得这种学位之后，他便享有在大学去留的自由。由于高级学位逐渐被人视为担任高级职务的适当条件，他遂有了充任有薪给的教师和教士的机会和充任教会中显要职务的机会了。当然，很多人只修毕大学文学院即不再学习，绝大多数人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没得到便离开大学了。

中世纪大学的宗教性质和国际性质　中世纪的大学还有一个特点须加以说明。就是说，它们是按照教会的独特生活方式去活动，特别重视教会的世界性质和国际性质。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大学，至少德国的大学，无例外地是在基督教会的土壤上蒙受天主教会的庇荫而成长起来的。教会的教义成了它们教学的基本原则，教会的通用语言也是它们的语言。大学的成员，无论教师或学生，多数都是享受"僧侣生活待遇"的在职人员或预备人员；大学讲座，至少在德国，多数都享有不必强迫居住寺院的僧侣的俸给。因为大学具有教会和宗教团体一样的国际性质，遂使教师和学生养成乐于到国外居住的习惯和勇于冒险的精神。尤其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大学里，有大量德国学生前往留学，这些留学生在法、意两国的大学里享有品学兼优的美誉。中世纪大学生无穷的冒险精神不仅显示在这一方面，也表现在一些穷苦学生的漫游队伍上。他们从这个城市游学到那个城市，从这一国家游历到那一国家，既轻松愉快而无忧无虑，又赤贫如洗而果敢无畏；他们这种广泛而频繁的漫游有时曾招致人们的厌恶。

城市学校　大约在大学兴起的同时，教育领域中另一项新生事物也发展起来了，那就是城市学校。这些学校不由教会管理，而由市政当局管理；即由市政当局负责处理它们的教师的聘用或解聘，视察它们的工作，筹建它们的校舍，教师薪津的募集或捐赠也都由市政当局负责。这类学校的经费主要靠学生一年按四季所交的学费来补助，甚至来维持。有的城市学校由校长自聘助理教师和自付薪津。由于大学日渐普遍，城市学校教师后备队随之而增加了。富裕城镇常常聘请大学毕业生担任校长，助理教师有时则从学生中选任。这些城市学校在教学上与教会学校没有大的出入，也传授基础知识和拉丁文入门。在一些重要城市中，如纽伦堡(Nuremberg)、乌尔木(Ulm)、哈格诺(Hagenau)等等，其城市学

校课程范围比较广泛，每每讲授"著名作家"和大学文学院的各学科的基础知识。这主要是取决于城市的开化程度和教师的学养水平。城市学校和大学的教学本来没有严格的分界线，这条界线直到十九世纪才开始划了出来。

至于城市学校的起源及其与旧有的僧侣学校的关系，从多数地方看，城市学校似乎是从旧有的教区学校发展而成的。因为教区司祭须经常联系教区内的少数儿童，在教堂举行宗教仪式时，司祭们要来帮忙，司祭便由自己或另请教师给儿童们讲些基本知识。以后城市范围扩大了，工商业的发展普遍需要具有一定学养的人，越来越多的市民乃急于为他们的子弟寻求接受这样教育的机会。学校越兴旺，也就越引起城市群众对于教育福利的关心。市政当局通过为学校筹建校舍或为教师捐助薪津，遂取得了监护学校的特权。市政当局对学校管理权的增涨曾引起一场摆脱各方影响的解放斗争，直到中世纪末，市政委员会才被公认为掌理学校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许多地方，市政当局曾为此而同教会当局进行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因为以前掌握教育大权的是教区教堂和教团教堂的司教僧侣，司教僧侣认为招收学生和聘用教师，纯属他的权利，并把聘用教师或任命校长视为他的一项收入来源。不过，市政当局取得学校领导权的斗争，从无反对教会或反对教义的气氛，仅仅是针对取得地方教育领导权而进行的。而且，在这场斗争中，关系重大的是宗教方面的高级领导人，他们总是站在市政当局一边。因为促进任何类型的教育和学校的政策，都是完全符合那种贯穿整个中世纪教会所显示的仁慈精神的。到十五世纪末，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所学校了；甚至在小镇和乡村中，设有学校的也不少见。克耐帕(Knepper）在关于亚尔萨斯地区的学校调查报告中，对此提供了实际例证。在这项调查报告所列举的众多学校之外，必然还有许多学校存在，可惜它们的名称都没有留传下来。有些市

镇不只设立一所学校，那些已经衰落的教区和教团学校还不计算在内。

私立(初级)学校 为了满足人们广泛的对初级教育的要求，与公立学校同时并肩发展起来的还有私立学校。当时出现的男女生兼收、而不用拉丁语授课的“德语读写学校”，完全是私人设立的；这种学校到中世纪末已普遍存在于各大市镇，有时数量还是相当多的。有些地方当局对它们也很关心，并曾制定了管理规章。这些学校乃是现代初等学校的先导。

从上所述，似乎可以断定，到中世纪末期，都市的广大群众，除最下阶层的以外，都有了读书和写字的能力。关于这一点虽没有可靠的数据，但印刷业很快发展成为主要工业乃是最有力的证明。如果不是因为人们普遍需要书籍，这是不可能的。要想知道十六世纪初，印刷事业对于文化知识的普及和对于宗教思想的传播起了多大作用，我们只回忆一下马丁·路德和赫田(Werich von Hutten)以及他们所印发的大量书册就行了。他们的新思想象生了翅膀一样地在各地风行，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如果群众没有阅读能力和阅读愿望，这是不可能的。

学校纪律 中世纪学校的纪律很严厉，甚至是很残忍的；这与当时社会的风气和教会崇尚纪律的精神是一致的。那时矫正错误最妙的手段就是拷打，无论在家庭或在学校都是一样。中世纪教师权威的象征就是教鞭。甚至为达到教学目的也经常用拷打。体罚在僧院是家常便饭，偶尔施行体罚被看成是治疗青年百病的灵丹妙药。这种痛苦的处罚并不永远是一本正经而不含幽默的。按照一般的习俗，学校所安排的一项旅游活动确是很有趣的。这种旅游的目的是要学生自己从丛林中砍伐桦木条子，以备鞭打学生之用，虽则在旅游中，学生们都可纵情欢笑，甚至畅饮啤酒；学校且戏称之为“教鞭节”。这岂不很诙谐吗？

中世纪后期教育的普遍趋势 对中世纪后期的教育发展概况进行全面观察之后，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发展意味着一般文化事业在此期间已取得很大进步。最主要的是学校教育以及文化知识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首先，所有西方各国都出现了一个广大的受学术教育或半受学术教育的社会阶层。关于大学教育发展情形的统计数字，甚至也可能找得到的。根据尤伦保(Fr. Eulenberg)的统计，当1500年前后，德国大学的在校学生约三、四千人，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大学的学生以及德国在外国读书的学生，尚不包括在内，如果统统计算在一起，德意志大学生将超过六千人。假设这些人在大学平均肄业二年，可以断定，即在那个时代，德国人也会为此而感到骄傲。依此计算，仅用二十年便可培养六万受大学教育者，在那政府官吏尚不需要就任以前就预先接受准备教育的时代，六万名受过大学教育者确实是惊人的数字。此外，我们还须计算一下在城市学校和教会学校受教育的大批学生的人数。这个确实数字虽无法统计出来，但想到当时有那么多的学校，有些大城市竟有四所、六所或八所之多，这确是值得赞叹的。例如，纽伦堡在1485年有四所学校，四位校长，十二位助理教师，纳费学生245名和相当多的贫苦的外舍生；1532年且曾限制这种贫苦学生不得超过110名。在1503年，奥格斯堡的全城僧侣及其五所学校的学生，在一次列队游行时统计，共有523人之多。最后，还有大量在上述德语学校或向塾师学过一点基础知识的群众；这是因为众多具有一知半解文化知识的人们为了谋生，已经形成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行业了。

就这时期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约可分为以下几种主流。第一，就其组织关系讲，教育机构逐渐摆脱了教会的控制。大学同旧日的教区学校和教团学校相比，可以说，已成为享有自主权的组织。学术和学者在社会上已得到一定独立性和受到一定的重视。

不是说它们已经摆脱了教会和教义的一切束缚；这在中世纪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不过，一方面它们有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它们也对教会产生了极强烈的影响。有一句谚语的确很有道理：上帝赐予法国的巴黎大学，恰如它赐予意大利的罗马教廷和它赐予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世俗政权，特别是德意志的世俗政权，通过筹建和资助大学，开始获得了文化和学术机构的一些控制权。城市学校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就是说，在青年教育事业方面，市政当局开始取代了教会的地位，后来，宗教改革运动更使这种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其次，就学术知识讲，也显露出同样的发展趋势。就是说，在知识探索方面，世俗兴趣已明显地占有优势地位。最突出的是在医学和法学这两门学科中，它们已把一向为教会所不能容许的教材，纳入了研究的范围。在哲学和神学的研究上，也有同样的趋势。就大学对亚理士多德哲学进行的研究而论，不管对它怎样修正和保留，在中世纪前期，大学开设这项同基督教毫无渊源的学科，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在这时期，亚理士多德哲学所受的重视常常同《圣经》不相上下；亚理士多德的权威（毕竟是反对上帝启示的理性权威）也几乎同《圣经》不相上下。难怪马丁·路德就在这一点上，对教皇提出最严厉的控诉了。他指斥教皇已经允许老异端邪说在基督教的学校建立了统治——照马丁·路德的说法，亚理士多德这种统治力量已深入到神学内部了。他这句话倒是事实，经院神学本身及其意图就是理性的神学。它也承认上帝启示和宗教信仰；但它的目的是要以更高的形式来解释这个内容。这就成了后来黑格尔哲学的先声。黑格尔哲学是力图把“信仰”转变成并溶化为知识和辩证思维的。当然，“信仰”经过这样的转化，其实质不发生改变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那种严格尊重传统、渴望求助于某种公认权威的思想，同这种理性的基本因素形成

了奇异的对立，正是这两种内在的对立倾向，导致了中世纪末期经院哲学体系的崩溃。

中世纪理性主义的另一特点是对于文学研究怀有普遍的反感。法国夏特利 (Chartres) 大主教约翰 (John of Salisbury, 1115?—1180)的一句名言："文学阴暗污秽，逻辑阳光明媚"，确可作为中世纪大学探索各科知识的座右铭。其结果便是：古代富有诗意和文笔流畅的文学遭受鄙视，而独有哲学和科学的作品受到尊崇。在这种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科学受到片面重视的局面之下，文学的形式和风格以及纯粹的文学作品遭到漠视，甚至藐视，乃成为通常的现象。我们今天还可以从康德或黑格尔的哲学术语上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他们提及的哲学主题和概念是值得研究的，但其表达形式是无足取的。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异军崛起，不啻是对统治人们思想达三百年之久的演绎推理热狂的当头棒喝。这时"诗人和演说家"的冷嘲热讽，首先是指向当世人们那些粗野地误用语言文字和丢失体面地鄙弃文笔风格。此时，全部经院主义哲学和科学，才被人们以极端轻蔑的目光视为纯粹胡说而弃置不顾。有人责问，象"实质"(quidditas)及其相对词"实体"(entitas)等等的经院哲学词语，能有什么合理的含意呢？在此后的三百年间，学校里尤其充满了对中世纪不合规范的语言文字的愤怒声讨。推至其极，竟然有人倡说，单凭文学的形式和古典的文风就可以培育出有教养的人！其愤激之情是溢于言表的。

第二卷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
(1500—1650)

第一章

新时代的一般发展趋势

文艺复兴 研究教育史和教育制度史的学者，几乎每跨进一步都会碰到一种乍看起来令人感到奇怪的现象。我指的就是：每个新时期无不是从它以前的时期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可是都以毫无感激之心，甚至都以轻蔑傲慢之态，摆脱前一时期对它的一切约束。不过，以对于教育传统的愤怒反抗作为时代特色来讲，任何时期也不象现代在从中世纪脱颖而出的时期那么显著。十五世纪末，青年们在热烈探索新教育理想的过程中，把从前一代人那里继承的一切，弃之有如敝屣。实际上，前代人的努力，纵然未曾促进科学方面的发展，无论如何在传播前人流传下来的知识方面和在奖掖学术人才方面，确是伟大而有成效的；可是我们却没听到后一代对它有一句赞美之词。他们对于旧时代的学校教育和大学教育，以及对于教育的代表人物，只有无休止的责难，甚至疯狂的谩骂。经院主义哲学以及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斯克

德斯等人所造成的不讲语法修辞之风，成了人文主义者永无休止的批判主题。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以古典作家和古典文学为基础的新文化，则热情歌颂，赞美它是一种新生，认为单凭新文化就可以把“自然人”培育成为诚实的人和高尚的人。

我们常常称之为文艺复兴的那项伟大而无所不包的运动，其主要趋势大致如下。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动力源泉，是人们热烈地响往个人的绝对独立；要求个人独立乃是现代人的特性。这种响往之情最突出地表现在积极摆脱传统的桎梏和外在权威的压制。每个人对任何事物都要保持享有按照自己和自己的理智来作最后结论的权利。他拒不承认公认的准则；他只承认他自认为正确的理论，绝不屈从任何其它理论。他以根据理性论证来推翻正统观点为快事。批判之风因而大为盛行，对于传留下来的一切都要进行严格的评选；即使最受历代尊崇的事物，只要有谬误，就难免遭受批判。这就是瓦拉(Laurentius Valla)和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等人的精神。在此不久以前，批判大约就是从反对以前一直被一般人公认为先验的原理开始的。这就是笛卡儿的态度，他的哲学就是为了建立一种以纯粹理性为基础的思想体系，遂从怀疑一切出发，借以清除基地。

这一时期和前一时期的对峙是明显的。贯穿于整个中世纪的主要趋势是倾向于依靠权威，即叫人们从内心里对公认准则、对教会和对教义，都抱着服从的态度。甚至到中世纪晚期理性主义已经出现的时候，人们对于传统和既定真理依然存有敬畏之心。经院主义神学的目标是理解“信仰”的实质；但到了无法用理性来证实“信仰”时，人们仍然难免认为信仰的事物总是有道理的和有妥适性的。人们的偶然的独立思维毕竟不能保证不产生矛盾，其表现便是一般恭顺的态度保持未变，在理智方面顺从旧的框框依旧是严肃认真的。对于教会，表面上煞有介事的服从态度，在十六、十

七世纪，是同今天一样的。但是自从个人的思想意识完全摆脱了宗教制度的客观约束以来，人们对宗教权威的服从总是诚意不足了；忏悔只是表现在口头上和笔头上，而非出于真心实意了。

这次运动的另一种主要趋势是人们热烈追求精神生活的新内容，希望在精神生活上有个人选择的自由。这种新的内容在古代社会中早经存在过，在那最初由意大利带头发掘出的古代经典中发现过；换言之，这种新内容是在基督教出现之前的异教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古代的文物、文学、诗歌、哲学、雄辩术、历史编纂术、艺术、建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等，在此时期无不受到人们极高兴地和极热情地仰慕、欣赏、学习和摹仿。奥林帕斯山(Olympus)的诸神，差一点又作为唯一真实和可敬的神祇而被重新修建起来和供奉起来！在这里，只有在这里，人们才有希望寻求他们所渴望的自然、真理、美丽、自由以及人生的美满。在这时，古代文化被视为人类真正的启示，它使人本主义的精神得到体现。在另一方面，前一代的文化及其艺术、科学、神学和哲学，都被诋毁成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虚伪、矫作、残酷等丑怪之物，简言之，全然成了未开化的“哥特”人的野蛮和粗鄙。野蛮哥特人的入侵，毁灭了，或至少埋葬了人类的理想世界；曙光冉冉冒出地平线的新时代的唯一任务，就是使那埋葬在漫长而暗无天日的中世纪岁月里的世界，重见光明。当时人们真正的目标不是从事语言学家或历史学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而是使古代文化复活。在整个艺术和文学领域中展开了巨大活动，其目标就是恢复和继续古人所丢下来的工作。从此，在古希腊和罗马的典型精神的鼓舞下，人们开始进行了建筑的设计、图画的绘制、诗歌的创作和哲学的探索。跟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古代宝藏在一起，还有无数新生产出来的艺术成品。文学方面也是如此，一种新文学，即新拉丁文学，也产生了；各种著名的古代文体都复生了，其中有哲学对话、修辞史话、科学调查和论文；但最

突出的是雄辩术和诗歌等著作，一切古代诗歌的形式和韵律都被运用起来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作品中绝大多数似乎都是毫无趣味和毫无感情的仿制品，而在当时却被看成是富有才华的创造性大作，竟没有人看出它们是当代人假借希腊和罗马诗人和哲学家之名所摹拟的冒牌货。

这种对于基督教以前古典文学的偏爱，还显示出另一种具有时代特性的新倾向，即人们从重视来世转变到重视现世。早期的基督教显然是讲求来世的宗教；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是顽固地坚持超自然主义的。这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于形成中世纪的人及其周围的社会，曾经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学术多半是关于来世的，很少是关于现世的；逃避现实而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中的圣徒，想要实现他们所想象的最美满的生活，是可以毫无阻碍的。实际上，中世纪的人并不能隔绝尘寰而过超然世外的生活的；人生中存在着战争和掠夺、狩猎和比武、谈情说爱和声色之娱、英雄的史诗和乐师的歌唱，等等，而且青春的情趣和人世的享受比起圣徒的忏悔生活，更近于真正的人的感情。无奈，中世纪的人们为了渴望灵魂得救，却使生活变得悽悽惨惨，阴郁黯淡。文艺复兴标志着重视现世生活的倾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来世生活以及天堂和地狱的远景，在人们意识中，才渐渐消沉了。哥德在《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中写道：

“被两只混账眼睛指引到那里去的胡涂虫！……

现实世界就是能以实现的世界；

你为什么要追求那永恒的虚无缥缈之境？”

这几行诗可以作为新时代的铭言。在这种精神影响之下，神学的冥思乃让位给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修道士的禁欲主义也让位给热情美满的幸福生活，怯懦的自我克制也让位给豪爽的自我判断了。美洲大陆的发现开始了欧洲称霸世界和奴役其它民族的历

史；与此同时，哥白尼开辟了使人类以智力统御宇宙并排除超自然界的道路，即使不能从现实中排除这种超自然界，至少他已从空间上排除了它。布鲁诺(Giordano Bruno)还以宇宙无穷尽的学说为基础，提出上帝与自然界等同的理论。世俗政权也于此时从宗教权威下得到了解放。按照马基亚弗利(Niccols Macchiavel)所著《论君主》(The Prince)一书的理论分析，和按照以西班牙与法兰西的君主政体为代表的伟大现实世界来看，现代国家无不以武力为后盾。

一般人的兴趣从以未来世界为中心转移到以现实世界为中心，是同人们的兴趣从探索抽象概念的世界转移到研究具体实际的世界，以及同人们的兴趣从致力辩证论和概念论的哲学转移到致力自然和历史的具体现象的研究，具有连带关系的。在中世纪后期的几百年间，大学和一般学校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抽象的推理上，有时甚至毫无掩饰地表示它们的轻视现实世界，以致常把现实世界仅仅视为逻辑学家搞智力训练所用的物质材料。文艺复兴所代表的恰是这种片面理解所必然引起的反作用。人们常以《浮士德》中的恶魔靡菲斯特菲立斯(Mephistopheles)在其名言中所表达的心情，把这块逻辑和形而上学的空想的不毛之地，换成真实的绿油油的牧场。辩证法所论证的各个老问题已经反复而热烈地讨论了几世纪之久，却仍然毫无进展；这时，对这一方面感到无穷厌恶而对另一方面寄予莫大期望的青年一代，便不得不逃出文法学者和逻辑学者所统治的学校，逃出机械论者和形而上学者永无休止的争吵漩涡，前去探讨真实的世界，特别是那伟大而完美的古代文化世界。人们以极端嘲笑的态度来揭发那些蔑视青年的神学和哲学教授的诡辩；而且到今天，完全以这种诡辩而持有经院主义哲学思想的人，尚非少数。的确，我们总得承认经院主义哲学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在四百年前，抱着必然可以把信仰转化为知识的信

念的人们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工作，现在已宣告失败。其结果是经院哲学在这方面再没有可以研究的了，只好用它的方法去研究另外的一些问题，而其所研究的问题不外有关现世或来世的人生问题，有些属于实质的问题，有些属于极端荒诞的问题，不是文法问题就是逻辑问题，不是物理的问题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总之，磨粉机隆隆地响个不停，但已经磨不出面粉了。随后的三百年间，经院主义哲学在学术界中受到了极端的鄙视；直到今天，它才随着十九世纪天主教的复兴而得以复苏。

在最后，我要指出两点：第一，这次运动不是从外面浸入西方各民族的，也就是说，它不是象基督教那样从外国传入萨克森的。它是从西方民族的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它是现代精神第一次显示其伟大的自动能力。在这次运动中，年轻的民族开始意识到他们本身具有强大的教化力量，也意识到他们的世界同基督教文化以前的那个充满青春活力的世界，颇有相似之处；并且在这种思想意识支配之下，他们抛弃了从前教育上超自然主义宗教的伪装。第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运动的最初发动者是上层阶级。世俗君主和宗教领导者的宫廷，在当时都成了著名艺术家和诗人、政治家和哲学家的聚会场所。所以由此而勃发的新教育理想具有明显的贵族的高雅色彩以及明显的脱离群众的倾向。由于教育理想上缺乏对普通人民的尊重，在道德上也相应地常常显示出对群众的不尊重。即使我们还找不出它的根源所在，我们大体上也可以断定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任何时代和在任何地方，上层阶级的道德观都有些不顾是非的倾向；而在诗人和艺术家的道德观中，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这时期的这种新的贵族与群众、美与丑、高雅与粗俗的区分，促使旧日那种善与恶的严格界限逐渐从人的意识中消失了。

宗教改革　这时期爆发的另一伟大运动是1517年从魏丁堡

开始的宗教改革，它在开始时似乎对正在德国流行的人文主义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是由多种不相干的根源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很快就显露出分歧的趋势。文艺复兴运动是从意大利输入到德国的一种贵族学术的美学运动，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是一种具有民族性和群众性的伦理运动和宗教运动。

就某些广泛的倾向而言，马丁·路德同文艺复兴确有相同之处。他也是为使人们摆脱传统和权威的统治而争取个人解放的。他的目的是肃清教会和僧侣在人与上帝之间进行的干预，所以他教育人们要依赖自己的信仰和良心来敬奉上帝，不必求之于僧侣的中介。他在抨击人类权威时，的确提出一种更高的权威，即《圣经》；不过，他同时却非常相信自己的理解，以致经文若有同他的理解抵触之处，他就大胆而爽快地不顾文字而按自己的精神来解说，他认为他的精神同上帝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宗教改革运动对于重新受到重视的现世生活，并非完全无关。这一点主要表现为它对于僧院里那些圣徒们的懒惰生活，深为反对；对于世俗的职业和婚姻生活，却甚表赞扬。此外，马丁·路德和人文主义的领导者一样地仇视经院主义哲学和经院主义神学。他于1520年《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中所流露的对于传统大学教育的憎恨与唾弃之情，其强烈不亚于他在《无名人的书信》中所表露的。

然而，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还弥漫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正如前面所说，马丁·路德愤恨经院主义作家和大学的原因，归根结底，不是由于他嫌恶这类哲学和神学问题的争论对理性让步太少，而是嫌恶人们对理性让步太多；嫌恶人们把《圣经》上的基督教义同"鄙陋、自负、狡诈的异教徒"亚理士多德的学说混为一谈；还嫌恶人们侈谈人类秉赋的美德和优点，而不强调人性的丑恶和上帝的宽恕。马丁·路德对待这一切问题，违反了他本人的出发点，他

以唯有《圣经》和唯有“信仰”是可依靠的为出发点，而且他宣称他的这种出发点不是从理论的玄想中产生的，而是从最富有人性的宗教实践经验中得来的。事实上，他曾利用教会原有的教义和仪式来邀上帝的恩宠，不幸失败了；他才肯定老一套乃是不对的。在马丁·路德的神学中，我们找不到企图使信仰和理性协调的迹象，因为经院主义神学就是从这种协调的愿望中产生的；按照马丁·路德的说法，信仰的基础就是信仰，信仰一旦混入理性就只能遭到破坏。他对于学术和教育也并没有寄予很大的希望，这些文事远非其主要兴趣之所在；他对于以毕生精力从事学术与教育事业的伊拉斯谟那样的人，即使不心存疑忌，也绝少同情。在提倡重视现世生活兴趣方面，他同他的门徒赫田和芝文利(Ulrich Zwingli)的看法，也各不相同。马丁·路德认为修道士的禁欲生活并非平息欲念和贪心的办法；在他看来，从事艰辛工作和善处家庭生活似乎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更好办法。他对于教育、文化和娱乐事业，确实不大重视；他的基督教完全是一种赎罪性质的宗教；他对于罪恶与宽恕的看法，和早期基督教徒的看法，在基本要点上，确实没有不同之处。认为中世纪和天主教曾经使基督教趋于世俗化，只是没有使赎罪性质的超自然主义的宗教转变为半理性的文明宗教，这可能使听者感到奇怪；但事实上，恰好是由于这一点才导致马丁·路德背叛了教皇的意旨。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因为教皇利奥十世在梵蒂冈供奉不少非基督教的神，或至少陈列很不少的偶像，马丁·路德才向他展开生死斗争；利奥十世正是为此而宣布马丁·路德背叛基督教。这样，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在初期建立的联系，也就必然很快地瓦解了。人文主义的领导人卢希林(Johann Reuchlin, 1455—1522)伊拉斯谟和穆天(Muttian)等人随而纷纷离开了路德派；最后，旧日的天主教会似乎比较那坚持讲道德和无条件讲信仰的宗教改革派，给那崇美文化和理性学术的发展，

提供了更为适合的土壤。这件事对于被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文化与教育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没有妨碍的。原因是伟大的历史运动总是沿着它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并不取决于运动倡导者的意图的。

从上述各节，我们可以说，在人类精神生活上，这两大历史运动的性质是：它们的爆发标志着现代历史的开始；并且，不管这两种力量彼此联系或相互斗争，它们都对此后几世纪的发展，起着确定行动方向的作用。这些相互竞争的影响，在教育领域中显示得最为显著；它们对于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全部都给予了改革。

第 二 章

历史发展的过程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领导人

诗人和雄辩家 早在十五世纪后半叶，文艺复兴运动就已影响到德国的大学和学校。最初在各地的大学里，诗人和雄辩家开始露面了。最早是鲁德(Peter Luder)那样不很体面的人物。稍后才有凯尔梯斯(Conrad Celtes, 1459—1508)那样比较有权势和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过，他也并不反对当时诗人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因此，他也到处游荡，早期游方学者的生涯似乎又在他的身上复活了。凯尔梯斯是德国国土上第一位桂冠诗人；他是于1487年在纽伦堡经德皇腓特烈三世授予桂冠的。经过多次周游圣地之后，他开始担任诗歌和雄辩术教师，最初任教于英戈尔施塔特的巴伐利亚大学，继于1497年受神圣罗马皇帝麦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 1459—1519)的命令，充任维也纳的诗歌学院院长，他把这个学院建成大学的第五学院，与原有的文学院比肩并列，享有给诗人加授桂冠的特权。在那时，新诗歌居然被看得如此隆重！另外还出现了大批的游方诗人，其中最重要的是爱斯梯坎片纳斯(Aesticampianus)和布斯奇亚斯(Buochius)。还有，赫田在早年也是游方诗人。他们到各宫廷和各大学去游说，信心百倍地向那

些不开明的人宣传新教育和人文主义思想。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非一般讲道德、说仁义可比，遂把他们这种侠义冒险行为写成了流畅的拉丁文诗歌。他们用可以使人流芳千古的辞句来颂扬他们的赞助人；也用使人遗臭万年的笔调来威胁他们的敌人。从1516年的一部《书信体诗》(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来看，他们的威胁绝不是装腔作势。在这部诗中，鲁宾纳斯(Crotus Ruleanus)和赫田对旧大学教授，特别是对神学院和文学院教授，进行一阵冷酷无情的讽刺挖苦，它的余音至今仍可从一些讽刺性的报章上听到的。

伊拉斯谟 在这时期，新古典文化的真正代表人物所从事的安安静静的工作，其影响之深远更甚于漫游四方的诗人的热狂行动。前者的最杰出的代表，首推伊拉斯谟。他出生于荷兰，后来他常居住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他晚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德意志的巴塞尔(Basel)和夫莱堡度过的。他的文学和科学著作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最主要的是他以评注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宗教作品和非宗教作品的方式，不仅为学术界，而且也为当时伟大历史运动的领导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还有，他于1516年出版了第一份希腊文版的《新约全书》。他又为奠定人文主义教育制度的基础，而写了大量有关方法论和教育论的论文。最后，他用论战式的文章，更多是用书信体裁，对当时的重大问题提出许多的主张。在宗教改革运动从魏丁堡大学爆发的前后，伊拉斯谟在欧洲占有独特的地位。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驰名的教育代表人物，是当时僧院内外有权势的基督教人士所共同欢迎的。他在当时的地位恰如二百年后启蒙运动中的学者伏尔泰(Francois-Marie Arouet Voltaire, 1694—1778)。不过，伏尔泰的一生生活在幸福的环境中，伊拉斯谟却是历尽坎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由于伊拉斯谟不可能同他们保持鲜明的一致关系，遂失望地把他作为过时

的人物而抛弃了，他也就在孤寂和苦难中逝世了。

卢希林 除伊拉斯谟之外，我们必须提到的还有卢希林(Johann Renchlin, 1455—1522)。他使希伯来文同希腊文同样地得到了复活；他同科伦的多明我教派的长期斗争引起了伟大的文学论战，在这次论战中，《无名人的书信》乃是对旧制度的致命的最后一击。比卢希林年轻的一代中，享有名声的是摩斯兰纳斯(Moselanus)和梅兰希顿(Melanchthon)。

人文主义的优势地位 约当1520年，旧有的经院主义和新兴的人文主义在教育领域中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新思想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人文主义乃在旧的哲学之旁赢得一席之地。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各大学几乎都采取了改革措施，其结果是在研究与讲学的新方案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明白地表明人文主义获胜了。在这方面有三点最为明显：第一，学术团体接纳了雄辩家和诗人。第二，古典拉丁文代替了中世纪的拉丁文，即使在学校的教学上也不例外，亚理士多德著作的旧译本也被新译本所代替，阅读和摹仿古典作家的诗歌和修辞也被列为必修科目和考试项目。第三，设立了希腊文教授的职位。

为时不久，甚至一般学校也受到新学风的一定影响。早在十五世纪，底芬特的赫济亚斯(A. Hegius of Deventer)和施莱斯塔特的钟金保(L. Dringenberg of Schlettstadt)，已开始指摘经院主义著作的文法变化莫测，主张学校讲授古典作家的作品。到十六世纪最初的二十年间，各处也都出现了改革拉丁文教学的企图。在教学上，占统治地位将近三百年之久的旧文法课本，即Doctrinale of Alexander de Villa dei，被废止了。学校采用简短的古典拉丁文为课本，并以古典作品为学生读物，教导学生摹仿古典诗歌和散文。在这方面的改革，德国南部的各大城市和莱茵河流域的尼德兰地区，是走在前面的。

宗教改革运动 当教育机构的改进过程似乎已经达到人文主义向旧有的学校和大学"和平渗透"的时刻，在蔚蓝晴朗的天空中，突然起了风云之变，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了；瞬息之间，它把德意志人的注意力从美学和文学的研究，转向宗教和教会方针等重大课题。当时人们研究人文学科的热情，始而被积极围攻教义、继而被冲击教会的激情所取代了。爱好安宁和提倡和平与文化的伊拉斯谟，不得不让路给伟大的战士马丁·路德。这些情况对于教育机构所起的第一种作用，乃是毁灭性的。在社会、规章和经济等一切方面，同教会结合得那么密切的旧学校和旧大学，只有随天主教而倒台。仅就停止享受"僧侣待遇"的希望一事而言，就使学校和大学的学习受到了极严重的影响。随后，农民战争又使双方都遭到惨痛的蹂躏；跟着又发生了从1525年到1535年的"十年浩劫"。这次浩劫使学术与教育都陷入举世无双的凄凉萧条的苦难之境。大学的学生人数下降到十年前的四分之一，一般学校的状况自然也是一样的。所以伊拉斯谟惊呼："凡是马丁·路德得势的地方，文学与学术事业就完蛋了！"

梅兰希顿 但事物发生了意外的变化。一位从这次浩劫中挽救了全部教育事业从而受到德意志民族感戴的人，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就是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他是莱茵河西岸巴勒廷纳特地区(Palatinate) 布莱顿 (Bretten)地方一个刀剑商的儿子，人文主义者卢希林的外侄孙。他对于人文学科和希腊文化的研究，似乎从幼年就极为爱好。他早岁就学于杜宾根大学时，已成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518年离开该校就任魏丁堡大学的希腊文教授。他在这里得到萨克森宫廷中的斯帕拉坦 (Spalatin) 的协助，并同自1508年起已在魏丁堡大学供职的马丁·路德携起手来，从而使这所大学得以完成人文主义的教育改革。有一段时间，他在马丁·路德过激性格的

影响下，受到这位伟大革命家的强烈仇恨心情的感染，曾经违背了自己正确的主张，不仅反对经院主义哲学，也反对亚理士多德的哲学。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当这种宗教狂热给学术与教育带来致命的破坏刚刚开始暴露时，当各种积极分子开始宣传科学无用论和鼓吹宗教热情可以使人不须学习就能明了一切真理时，梅兰希顿即倾其全力向这种严重错误展开坚决斗争。他明确地提出，不学无术则不能保持新教教义的继续生存，更谈不上使之发扬光大了。从此，他便不知疲倦地宣传“教义必须与科学相结合”。这种主张成了他的许多著作的主题，特别在学术讲演中，成了他反复阐述的主题；这种主张也成了他作为大学教师所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和不求人们称颂的义务，同时又是他百折不挠地组织和建设新教的教育制度的主旨。在他死的时候，弟子们对他艰苦备尝的一生所流露的感激之情，他确是当之无愧的。

马丁·路德 阐述和宣传新教教义固然需要学识；依据真正原始资料以恢复原来正确的教义，也离不开学识。马丁·路德对于这些确实是信而不疑的。可是，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只有宗教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其余一切，包括文化学术和知识教育，都是次要的；不过，他毕生的工作从未离开过学术，特别是从未离开过语言学术，所以他的一生无时无刻不与学术为伍是极为显然的。因此，他在《致基督教贵族的书信》中已积极主张，沿着人文主义和新教的教育路线来改革文法学校和大学；宣称《圣经》和语文的研究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当教育发展出现可悲的下降趋势的苗头时，当宗教狂热者和其它各种积极分子宣扬单独依赖“热情”时，马丁·路德便于1524年发表过极关重要的《致德国各市镇的市镇长和议员书》。信中有两个主要论点：第一，学习，特别是语文的学习，是理解《圣经》的经文，从而捍卫福音，也就是捍卫新教教义所必不可少的。他说：“因为上帝要使他的使徒到世界各地传布福音，他才给予他们

说话的才能。再者，从前在罗马帝国统治下，上帝在各地广泛地推行拉丁语文和希腊语文，以便他的福音得在辽远和广阔的地方迅速地开花结果。现在，上帝又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在此以前，人们并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创造不同的语言；今天，他使我们懂得了，就是为了传布他的福音，从而教导并消灭那些不信基督者的统治权利。所以，福音对我们是太可珍贵了，我们怎能不勤奋地学习语文呢！"第二，信中还宣扬提供完善的学校并鼓励人们入学，乃是城市和一般行政当局的职责。"因为全城的财宝、荣誉和人身安全已经都委托给行政当局，如果他们不竭尽全力、夜以继日地考虑全城的利益和全城的繁荣，他们就是不忠于上帝和国家。现在，一个城市的利益不仅仅在于储藏大量的财富、筑起坚固的城墙、建造宏伟的房舍和创造华丽的器皿。的确，这些东西多的地方，正是愚蠢和险恶人所觊觎的地方，他们所要掠夺的也正是这些东西，因而这个城市被陷落的危险性也就越大和越多。所以一座城市的最大的利益、最大的保障和最大的力量是具有大量有学识、明智、正直和虔诚的市民"。后来，他又在1530年发表的《论学校保育儿童的职责》中，建议有关当局为使政府得到有才学的人员充任官吏，须选拔优秀儿童给以专业知识教育，必要时甚至可用公款培养，并可采用强制措施。

梅兰希顿领导下建立的新大学和新学校 以梅兰希顿为代表的新教教育组织的主导思想是：在世俗政权领导之下，实现新教教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理想。

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各地争分夺秒地建设新的教育机构。在1521—1526年之间，在梅兰希顿亲自积极推动之下，马德堡、埃斯莱宾（Eisleben）和纽伦堡等地的新文法学校建立起来了。1528年，萨克森选侯区的第一份普通学校管理章程公布了；这份章程是《萨克森区督察人员的工作条例》的组成部分。这份条例可以看成

是教育改革者们共同进行的对于教育现状的调查和对于改革事项的规划。随后又有一系列学校管理规章出现。这些规章最早出现在北德意志一带地区和城市，其中有些是出自布瑾哈根（J. Bugenhagen）之手。例如，布伦维克（Brunswiek）的学校管理章程颁布于1528年，汉堡的学校管理章程颁布于1529年，什列斯威格-霍斯坦（Schleswig-Hol-stein）的学校管理章程颁布于1542年。经梅兰希顿亲自修订的最后的学校管理章程，可能是梅克伦堡（Mecklenburg）于1552年颁布并于1556年编入《宫廷法规》的那一份。与此同时，有些新的大学建立起来了，有些原有的大学也经过改革了。按照新教的方针建立的第一所大学是1527年问世的马堡（Marburg）大学；梅兰希顿在世时，又于1544年建立了孔尼兹堡（Königsberg）大学和于1558年建立了耶拿（Jena）大学；他逝世不久，又于1576年建立了赫尔姆施太特（Helmstedt）大学。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魏丁堡、杜宾根、莱比锡、法兰克福（Frankfort）、格赖夫斯瓦尔德、罗斯托克（Rostock）、海德尔堡（Heidelberg）等地原有的大学，无不按梅兰希顿的教育思想进行相当彻底的改革，以致这些大学面貌一新，不异于新建的学府了。梅兰希顿对于这些大学的改革常常给予帮助或建议，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喀麦拉利亚斯（Joachim Cameraruis）则是这项改革工作的主要当事人。梅兰希顿以惊人的毅力和不知疲倦的精神，致力新教的教育工作，先后达四十年之久，饱尝内外交困和与险恶环境斗争之苦。在他逝世时，这种建筑在巩固基础之上的新大厦，特别是崭新的高等教育制度，主要都是经他亲手缔造的。为了便于看清他的全部成就，在此可归纳为三点：（1）他奠定了新教的大学和学校的组织原则，他参预许多地方的教育建设的决策工作，他或是亲往帮助，或是提出书面建议；（2）他编写的拉丁语文和希腊语文的文法和修辞学以及逻辑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神学等学科的优秀课本，一直

应用达数百年之久；(3)在他从事学术活动的四十二年中，他为满足德国高等教育的需要而创建的新的教学专业，几乎涉及所有各种学术。当他逝世时，在德国广阔的文教领域中，有数以千计的经他培养起来的学生，在各大学和中等学校担任教育工作。大约从1530年起，魏丁堡大学已成为新教的重点大学，菲利浦大师则成了一切学术的灵魂。他的学术报告几乎包括所有各门学科在内，他不仅讲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作家的名著，也不仅讲授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作家的名著，而且还讲授有关哲学的各种学术问题，甚至连天文学和历史学也无不属于他所讲授的范围。他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德意志人的伟大导师。

第 三 章

十七世纪初期的教育机构

为了对十六世纪后期梅兰希顿所缔造的新教的教育机构的内部与外部组织结构，得有清楚的概念，有必要先作一个概括的全面观察。

I、大学

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 这时期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当然是取决于在教会中占优势地位的大教派。大学以往所具有的世界性和国际性已不存在，却普遍地带有地区的性质了。凡较大的地区和较大的城市都企图成立独立的宗教组织和教会组织，并企图把培养教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教育工作控制在自己所设的大学内。因此，在十六、十七世纪，无论天主教地区或新教地区都建立了大量的大学，同时在大学之外也必然有很多文科中学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大学的组织形式基本上并没有变化。过去大学所有的四个学院、校长和院长、讲授和论辩、考试和学位等等，虽经过各时期历次的风暴，但都依然如故。四院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改变；文学院这时改称为哲学院，仍然是准备升入高级学院的预备班性质。值得注意的是高级学院的学生，特别是神学院的学生，增加了。在此以前，神职人员不需要、也不要求必须从神学院毕业；现在却渐渐成为新教一般神职人员所必具的条件。这一点是同新教教会的性质和重视教义的解释有关。因为天主教司祭仅是掌握教规和宗教仪式的

行政人员，而新教的牧师则首先是《圣经》的宣传员和讲解员。法学院也逐渐扩大了，一方面因为罗马法被看成是有效的“帝国法律”，同时还因为现代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发展，也促使具有法律修养的人员增加了。医学院在某一时期仍然是无足轻重的；实际上，有的大学常常根本未设医学院。

哲学院 哲学院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已经谈到，哲学院仍处于文法学校和大学高级学院之间的地位。它相当于现在的文科中学的高年级，学生平均年龄为十五岁到二十岁，恰好相当于文科中学生的年龄。它的课程同文法学校相衔接，一般学生在文法学校已经获得当时学术界通用语言的基础知识，哲学院则为神、法学院的专业学习奠定必要的普通知识基础；不过，它传授的普通基础知识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旧日的文学院几乎完全以亚理士多德的哲学为基础；现在则把这些哲学课程换成古典人文学科，因此也就为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数学和物理学在哲学院也逐渐受到重视；不过直到十八世纪，这些学科才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时期在学术的教学方面，已逐渐显露出偏重科学的性质。

教学方法和教材 大学教学的进步，可以从大学讲座的组织方面明显地看出。在旧日的大学文学院中，每位教师对所有各门学科都要不加区分地统统负责讲授，也就是要包教文学院的全部课程(有许多地方确有这样的风习：用抽签或轮流的办法分配教师担任的学科)。到此时，则有几门学科已设置讲座，由讲座专门讲授几种学科。讲座领取职务薪金，并有无偿地讲授他所负责的专门学科的义务。与此同时，他也有讲授其他学科的自由；不过，可酌取报酬，而非无偿地讲授。这是哲学院学术教学专业化开始时的情况；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直到进入十八世纪很久，大学教师依然有的从这一讲座改任另一报酬更优厚的讲座，甚至从这一学院转为另一学院的讲座，其中由哲学院转为神学院讲座的情形尤为

常见。魏丁堡大学于1536年所采取的改革方案，可以作为一般哲学院设置讲座职位的典型实例。该校设置正规讲座职位的有十种学科：希伯来文、希腊文、诗歌、文法（以Terence读本为基础）、数学（设置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两种讲座）、辩证法、修辞学、物理学和道德哲学。人文主义的语言学和经院主义的哲学，在进行教学时是相互结合的。在以往，旧的教学内容包括有辩证法、物理学、伦理学（或许在梅兰希顿的修订的课程中，这些学科是以亚理士多德哲学为基础的），另外还有数学。文艺复兴时期增加的新学科，有拉丁文的文法、修辞和诗歌，还有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另外，有些大学的讲座也按类似的方法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类；不过略有改变，即财力不充足的大学常由一位教师充任两个讲座；稍后又有很多大学增加了史学讲座，一般史学讲座常与修辞学或伦理学等讲座合并设置。

大学的教学方法，一般说来，与普通学校的教学方法无大区别。各学科的授课时间都排列在固定的授课时间表上，学生按照规定的安排上课。喀麦拉利亚斯于1558年制定的莱比锡法规中规定的学程，即一实例。第一学期（半年）：希腊和拉丁文法、辩证法和诗歌；第二学期：继续学习拉丁文法和辩证法，另外增加修辞学；第三学期：在学习诗歌和修辞学之外，再加物理学和数学。然后，对各科进行考试，通过考试者获得学士学位；此后再经过二年的学习研究，即可参加硕士学位考试。在这最后的两年，学生必须听古典文教授所讲的古典作家的著作和哲学教授所讲的亚理士多德的理则学；此外，在第一学年还要学习亚理士多德的物理学和伦理学，第二学年学习数学。从上可知，这段学习过程所讲授的主要是语言文学方面的学科。在讲课之外，还以实习为补充。科学方面的教学要以论辩来巩固所获得的知识，而语言方面的教学则以书面和口头摹仿古典诗文为练习。"演讲"是进行学术论辩的样板，

须用公开演讲的方式进行；首先由教师作公开演讲为示范，然后学生仿效练习。演讲练习是梅兰希顿在魏丁堡大学首先采用的；后来，各地也都采用了。那时语文教学的目标和现在语文教学的目标很不一样。那时语文教学既不以研究语文发展史为目标，也不是为创造性研究作预备训练，是要把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自己所写的文章中，其最终目标就是复兴古典文学和继续发展古典文学。所以在“新拉丁文学”中，其摹仿的作品与原始的作品之间，确实没有明显的界限了。

II、中等学校

城市学校 中等学校的组织系统大致如下。自1543年起，在新教地区有两种不同的中等学校同时并存，即城市学校(Stadt-Schulen)和邦立学校(Staats-Schulen)。城市学校是从中世纪的同名称的学校直接延续下来的，它是由城市建立的，由聘请教师和支付教师薪津的市政议会承担一切管理责任；多数地方的城市学校校长，特别是小镇的学校校长，都由市镇的传教士兼任。市议会一般也是在僧侣协助下，进行学校视察和制定学校规章等工作的。原有的城市学校在这时都经过了改革，同时又建立了许多新的城市学校。这些学校最突出的是在水平高的中等学校的高年级，设置各种程度较高深的学术性科目。所有怀有雄心大志和企图独立发展的富裕城市，都切望设置这样程度较高的学校。

地区学校 邦立学校也叫地区学校(Landes-Schulen)，有些地方则是寺院学校(Kloster-Schulen)。这种学校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新生事物。它们是由地区行政当局建立的，所以其监督管理由地区政府负责。他们的教育目标是由地方政府担负经费来培养由全地区选拔出来的优秀青年，成为为社会服务的人才。这种学校的建立是根据马丁·路德在对市政当局演说中所提出的要求。带头建立这种学校的是萨克森地区侯爵摩利斯(Maurice)；他于

1543 年在萨克森的普佛塔(Pforta)、梅森(Meissen)和葛利玛(Grimma)建立了三所有名的邦立学校，把原地区内世俗化了的寺院的建筑和财产都捐赠给这些学校。三所学校共招收 230 名学生，其中一百名由地区内各城市的群众子弟中选录，七十六名由贵族子弟中选送，五十四名由侯爵自行安排。选录学生的办法是从家境贫困而具有拉丁文的基础知识的青年中，择优录取。学生在校学习五、六年准备升大学的学科，一般年龄是在十二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以公费资送他们到莱比锡或魏丁堡大学去接受高等学术教育；他们学成之后，须从事教会工作或政府工作，来为君主效力。随后，一系列类似的学校都是按照萨克森的先例建立起来的，其中较为著名的，在南方有符腾堡(Wurtemberg)的寺院学校，建于 1559 年；安斯巴赫(Ansback)学校，建于 1582 年；科堡(Coburg)学校，建于 1605 年；在北方有波马兰尼亚(Pomerania)和勃兰登堡于 1543 年和 1607 年先后在什切青(Stettin)和约阿希姆斯塔尔(Joachimsthal)所建的邦立学校。

邦立学校的建立表明中世纪国家向现代发展又跨进了很有意义的一步。因为它说明维护学术和维护专业研究，已成为国家所急切关怀的事体。就教育机构本身的发展而言，它也不是没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因为邦立学校在各种形式的中等学校中已成为骨干，并成为其他中等学校争取效法的楷模。在德国教育遭到各种暴风雨的时刻，它们起了维护教学不致中辍的作用。最突出的是萨克森和符腾堡的一些著名的学校，在这方面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坚持这种传统的一些学校，直到今日仍在继续不断地培养出无数杰出的人才，确足证明这类学校在文化和道德上所发挥的巨大影响。这些学校在德国教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恰如英国的公学(Public Schools)在英国教育中所占的地位。

班级的编制 现在再谈谈这类学校的教学进程。它们的班级

或年级编制一般以三级为基础——初级，教授写和读；中级，讲授拉丁文入门；高级，教授古典名著和指导摹仿古典文章。在1527年梅兰希顿制定的学校规章中，曾以三个组代表初、中、高三级，就是在一个教室里分组进行教学。这份学校章程显然是适应小市镇的急需而订的。凡是学生较多和经费较充裕的地方，班数也增加了，其中多数是分成五个班，把中、高级各分为两班。在那些更大的都市，城市学校甚至分成更多的班，最终是分成每个年级一班。著名的司徒尔姆(J. Sturm)于1538年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曾建立一所分为十个班的学校，即十个年级的学校。一般是每班设教师一人，讲授该班的全部学科。因此，一个学校起码的条件是要有三个教师。当然，较小的乡镇进一步紧缩的情形也不罕见。

人文学科、语言和宗教教育　在此再谈谈这些学校的教学科目和教学方法。这种学校的教学范围，同大学文学院一样，是依照梅兰希顿把人文学科与基督福音相结合的原则来确定的。它们的主要课程是语文和宗教教育；在规模较大的学校里，还增授人文学科基础知识。司徒尔姆曾提出教学目标包括三项，即宗教教义、语言和科学(人文科学)。

拉丁文　支付学生时间和精力最多的学科是拉丁文。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拉丁文都是主要课程。拉丁文教学的目标是充分掌握拉丁语文，因为拉丁语文不仅是学习古典作品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在交流和写作方面也都离不开它。雄辩术一词的含意是自由地运用古典拉丁文，其中包括精通拉丁文诗歌的写作。总之，拉丁语文在那个时期是活的语文，是学术界和文学界现实通用的语文。正确地和尽可能流畅地运用拉丁语文乃是当时有教养者的必备条件，恰如我们今天必须精通自己祖国的语文一样。

拉丁文教学方法主要包括三部分，就是语文规律、文章模式和文体摹仿。语文规律最主要是文法教学以及修辞和诗歌教学；文

章模式是从阅读古典作品中去探索；文体摹仿是概括学生运用拉丁语文写作和会话等一切实地练习的总名称。文法教学是从学生入学之始起，直到毕业为止，都要进行的；按萨克森邦学校规章的规定，学生每天要用一小时作学习拉丁文的时间，规章中指出“因为青年在文法学习上如不付出足够的工夫，对于文学的学习为害极大。”诚然，有教养的人如果在文法上犯了错误，是最感到难以为情的，而且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如此。学生在全部读书期间都是朗读与摹仿练习同时并进。写作与口语的练习是从短句和短句变化开始，然后逐步进入演讲和诗歌创作的练习阶段。文人在实际生活中，到处都有运用他们在学校所学习的拉丁语文的机会。每遇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的悲欢离合的场合，总要请他们作文或赋诗，借以表示庆贺或悼念。因此，摹仿古典诗文成了教学的真正主要目标；这不仅是选择读物的依据，也是阅读古典文学方法的准则。所以只有那些可以摹仿的作品才能被选为读物，并且在阅读时也只注意推敲作品的形式而不研究其内容。学生在笔记上所摘录的都是一些词句、习语、成语、格言、比喻、隐喻等等，以备在作文或写诗时用来润色自己的作品。中年级学生所读的主要是希腊寓言家伊索、罗马诗人奥维德、罗马喜剧家德伦西、罗马大将军和史学家凯撒等人的名著，还有一些近人所作的对话体读物；高年级学生则以诵读罗马诗人魏吉尔的诗歌和罗马演说家西塞罗的著作为主。

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拉丁语文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在可能实行的地方，也作为教学用语。学生在学校中严禁讲德语，即使彼此交谈也禁用德语。在禁用德语的拉丁语团体里，凡一时疏忽而讲了德语者则要受体罚，在许多学校规章中都列有这样的条款。这种使儿童从幼年开始就听古语和讲古语的方法，对于养成娴熟古语的运用，确是极易生效的。学校常以戏剧表演作为培养古语学习的手段，因而在十六、十七世纪，戏剧表演在学校生活中占非

常重要的地位。学生把一些古典作家的剧本和一些教师临时编写的剧本，在邀来的观众面前公开表演；有些地方还为此而建有永久性的学校舞台。编写这类剧本几乎被视为教师应负的职责。剧本的主题不是圣经故事，就是民间故事；其主要内容是剧中人口中所说的带有韵律的台词；这些剧本常以"坚忍"、"忠诚"、"奢华"、"贪婪"等代表比喻性的人物。这种带有道德意义的摹仿诗篇，临到十七世纪末还有人在写；直到十八世纪后期，代表资产阶级文学的狂飙运动时期的诗歌登上舞台，它的最后残余才被肃清。

希腊文　在规模大的学校里都设有希腊文学科，它的地位仅次于拉丁文；到后来，则比拉丁文落后了。它并不是象拉丁文那样的活语言；严谨的学者固然把它视为必要的学识，而对一般人来讲，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希腊文的教学方法和拉丁文的教学方法相同，也是把文法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朗读之外补充以文体摹仿，希腊文似乎也是以学习词章为主。事实上似乎也曾经出现过"新希腊文学"；不过，与"新拉丁文学"相比，更显得微不足道了。实际上，有很多人虽学习了希腊文，但在离开学校时，连一点希腊文的知识也没有了；有更多的人刚刚学了一点希腊文初步知识，就放弃学校给他们的学习机会而不去学习了。人文学科教授们曾为此叫苦不迭。真诚学习这种基督福音和《圣保罗》原始著作的文字的，倒是那些神学研究者。于是这门最初为人文学科而并非为神学而设置的学科，反而逐渐以学习《新约全书》为重点，荷马和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等希腊学者的诗歌和演说以及亚理士多德的原著，却越来越被忽视了。

希伯来文　为了神学研究，大规模的学校也设置希伯来文的学科；不过，其教学内容始终没有超出初步基础的范围。

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在学校中是极关重要的。这门学科的设置始于宗教改革运动；新教视《教义问答》为他们的得意之作，他

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敌方所不知重视的。这也显示出新教的宗教教育的性质，就是在宗教教育中，教义被视为首要的，一切礼拜和仪式等等都是次要的。所以，人们从幼年就应受到正确教义的熏陶乃被视为根本问题；因为马丁·路德曾指出，要使老罪犯改恶从善恰如驯服老羊一样的困难。最初施行的宗教教育的内容极为简单。1527年萨克森的学校规章规定，奠定信仰基础的最主要办法是必须牢记在心中，就是熟记《使徒信经》、《主祷文》、《圣训》和一些赞美诗，另外还要背熟某些简单的注解。然后，则讲解“福音”或《新约》中其它某些章节的文法构造。后来，由于新教的体制逐渐巩固地建立起来，新教的神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宗教教育的性质也就复杂化和教义化了，对于高年级的学生就开始讲授新教神学的初步知识了。还应提及的是全校师生都必须参加教会举行的祈祷仪式，这种仪式最初是每天都有，并且因为在举行仪式时经常以宣传教义和解释经文为主要内容，所以这种祈祷仪式或多或少具有宗教教育的作用。因此，这种仪式就成了学校的宗教教育的组成环节；至于一般学校每堂课开始时都先进行祈祷，自不待言了。

文理学科　大规模学校的高年级都讲授人文科学基础知识。一般除讲授文法之外，还增授修辞学和辩证法，前者主要讲解“创作”或构思、“布局”或文章格式，后者主要讲解论据和论证。后来，在大规模的学校里，公开的演讲和辩论遂成固定的制度。在这些学科之外还讲授实科基础知识，即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和宇宙学，所有这些学科的教学仍按旧制进行。历史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只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论及一些历史问题和考古问题。

音乐　歌咏和音乐是很受重视的，在同教会有密切关系而一心想作教会研究学府的教育机构里，歌咏和音乐更成为教学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以上是梅兰希顿于十六世纪按照新教思想与人文主义相结合

的原则所建的新型中等学校。这种学校的主要面貌，直到十九世纪初期教育大改革时，依然未变。

学校纪律 这时期学校纪律还是同中世纪一样的严厉。青年教育的原则便是“学习就是服从！”后来坚持这一原则的不是别人，正是哥德。的确，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服从；因为这时所有的教与学，都象在初等学校和文法学校中所进行的那样，采取先教学生牢记课文、然后静听学生背诵课文的方式。凡不愿或不能遵照这种要求的学生，就立刻尝到必要的苦头。因为体罚仍是训导和教学的灵丹妙药。没有任何学校不是每天穷凶极恶地挥舞教鞭的，学生不仅因为故意犯错误而受到体罚，而且因为对于所学习的课文有所疏忽或不懂、不会，也要遭受体罚。这种情况一直到十八世纪末期，基本上也没有变化。到十九世纪，人们认识到体罚根本没有作为教育手段的价值，教学才逐渐开始变革，高级学校的体罚才逐渐废除。据雅格(Oskarzäger)说，在符腾堡(处于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区)地方，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这种旧习惯事实上还在流行，那个地区的学生如果在拉丁文或希腊文造句上犯了错误，仍要按照一张固定表格上规定的数量挨打。在此期间，即使在斯瓦比亚(Swabia)最偏僻的山区，人们也已经学会不用这把钥匙而能打开拉丁文的秘密了。

III、初等学校

新教地区初等学校的起源 初等学校的诞生也应该归功于，至少是间接地归功于宗教改革运动。新教的特点就是提出新的要求，初等教育当不例外。在新教徒看来，以正确教义为基础的信仰乃是宗教的主要实质，而正确的教义是应以经文为依据，即绝非以僧侣的权威而应完全以《圣经》为依据。马丁·路德所最关心的事，是在使这项一切真理的源泉重新为信仰基督教的人们所理解。在以前，教会的司祭一向严禁把《圣经》译成普通语文，而十

六世纪二十年代马丁·路德的伟大功绩恰恰是用德文翻译了《圣经》。为了使所有教会成员都能直接阅读经文，所以对他们进行文化教育遂成了时势之要。在信徒都能阅读经文之后，又产生另一问题，就是要人们正确地领会《圣经》，没有人帮助是办不到的。学习经文而没有人指导是极易误入歧途的；新教对此问题的重视是比天主教及时的。为了防止人们误入歧途，为了指出领会经文的正确途径，马丁·路德又写了两种《教义问答》，一种是供应一般人学习的简本，另一种是为培养牧师和教师使用的详本。这两书相当于指导人们阅读和解释《圣经》的经义总论。

这种为奠定人们运用经文和解释经文基础的文化教育和教义教育，竟成了新教的初等学校发展的基地。

德语学校或国语学校的初期状况 当然，德语学校在开始并不是宗教改革者事先考虑成熟的事物，也不是象智慧女神那样尽美尽善的事物。德语学校甚至在理论上也只逐渐被看出是不同于文法学校的另一种特殊性质的教育机构，而这种学校真正成为政府承认的教育机构，则又经过更长的时间了。最初，宗教改革者的全副精力都贯注在中等学校急需的改革与兴建上；至于实施更广泛的教育只是一桩附带的问题。马丁·路德于1520年撰写的《致基督教贵族的书信》和于1524年撰写的《致德国各市镇的市镇长和议员书》，其意图就是如此。在前一封书信中，他曾顺便地提到一所女子学校"每天可用一小时给妇女讲解福音，不论用德语或用拉丁语都可以"；在后一封书信中，在论述文法学校也应由市议会作为城市学校建立时，他说那些不准备从事需要学识的职业的儿童，"每天应在业余时间到这类学校学习一两小时，但不应妨碍他们操持家务和学习手艺。"萨克森的学校规章也提到只有一所学校面向市镇所有的儿童，这所学校明确规定不设德文课。这所学校和一般学校一样，只授拉丁语文，不教德语、希腊语或希伯来语，对于贫

苦儿童负担不了这么多的学科是未予考虑的。因而，孩子们不得不在入学之始就念拉丁文和写拉丁文；他们还要学习多纳特和加图(Cato，罗马政治家）等古典文作家的作品。拉丁文法和古典文阅读是从二年级开始学习。不过，在事实上，严格说来，德语在当时似乎已经成了宗教教育的用语；因为用拉丁语解释《使徒信经》、《圣训》和《主祷文》，就无法实现“教育儿童学习基督教徒和宗教生活的初步知识”。一些天资优异而确定从事需要有学识的职业的儿童，在修毕二年级的学科后，即升入专门学习人文学科的三年级；其他不准备深造的学生，学到“教义问答”和少许拉丁文则已很满足了。后来梅兰希顿和布瑾哈根所制定的学校规章，对于这一问题也没有作出规定；文法学校在教育编制上依然处于群众性教育的地位；这份规章只附带地提到“德语学校”，只因“德语学校”既已建立，则姑且准许其继续存在而已。

符腾堡和萨克森的发展情形 最早把德语学校列为专门一章的，是1559年符腾堡的侯爵克利斯托福(Christopher) 所颁布的学校规章。这份规章的重要性不只在这一方面，其中所有的主要项目都被纳入1580年萨克森的管理规章之中。事实上，这时期仍视德语学校为农村或市镇的临时性学校；凡是有正规学校——文法学校——的地方，德语学校就被看作是附设的学校或分校。按照学校规章的规定，德语学校的读、写、教义问答和歌咏等学科的教学工作，一般都由教会或教区的执事人员担任，并且特别规定这些担任讲课的人不得同时兼任公务员或警察等职务。牧师是学校的监督管理人；校长由教区居民选举产生，不过他的宗教信仰和专业能力先要通过教会总监(General Superintendent)的考试。总监相当于天主教会的“主教”(Bishop)的职位。新教的教区在教会总监之下又划分较小的巡回区，每区设监督(Superintendent)一人，乃是牧师的顶头上司。

私立学校 从上可知，在政府颁布的学校规章中，对于德语学校或国语学校只是偶尔地予以提及；直到十七世纪教育改革运动中，才被地方当局承认是专门的和重要的地方教育机构。由于这种迫切的需要日益加剧，寻求满足这种需要的办法就变得刻不容缓了。这些早当十五世纪在一些较大市镇就已出现的私立的德语读写学校，虽则最初曾被教育当局侧目而视，并被当作为"野鸡学校"加以摧残，它们却依然存在，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有些学校规章还曾附带地提到它们。如布伦兹维克和汉堡的管理规章都承认它们是合法组织，并由市议会给他们委派教师。新教教会对于乡村青年教育的热心关怀是无疑的，所以私立德语学校在乡村也同样地发展起来。不过，一般学校规章的主旨都是对各地已经存在的学校加以监督管理，并使成为强迫教育的机构，并未规定增建新的教育园地。

教会和家庭的影响 除学校教育之外，教会和家庭的教育影响在这时期也不断地加强，这是可以推知的。马丁·路德的热切愿望可能不在于此，因为他在《教义问答》简本的序言中说，牧师和家长的责任是给儿童讲解教义问答。这种教育极为简陋，只是以最简单的方法叫儿童跟随教者反复背诵《圣训》、《使徒信经》和《主祷文》，直到背熟为止。不过，这种宗教教育却慢慢发展成为阅读教学了。我母亲在我上学校之前，就教过我读了几本书，而且这样的事实在新教地区绝非罕见。这种情形，可以肯定，在宗教改革运动时期就已经发生了。牧师不仅是成年教民的教师，同样也是儿童的教师。另外，宗教仪式本身就具有教育的性质，一般在举行宗教仪式之外，还以星期日学校为补充，有时教区人员就借此机会代替牧师而在星期日学校进行教学。

IV、耶稣会

耶稣会教团 在瑞士的宗教改革中，教育机构的发展也有同

德国类似之处，我不准备在此叙述。关于天主教地区的教育改革概况则必须予以阐述。天主教的教育改革，在性质上，大体与新教相同，它显然是受了新教的影响。当然，它也不是没有其独特的性质，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天主教地区内，相当于新教地区邦立学校的中等学校，既不是政府设立的，也不是由教会直接设立的，而是由一个国际性的宗教团体——耶稣会——设立的。

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一样，是西班牙对西方各国的贡献。该会是西班牙神学家伊格尼夏斯·罗耀拉(Ignatius of Logala，约生于1491—1556年)所创立，并于1540年经教皇批准的。从创建之初起，耶稣会就以教育工作为主要任务之一。该教团的目标是：恢复天主教会原有的地位，使世界服从教皇的统治，更主要的是挽救那些堕落到邪教中去的教徒；其达成这种目标的办法，最重要的似乎莫过于成功地为教会培植学识丰富、品德高尚和严守纪律的僧侣。该会从开始就以实现这项目标作为主要任务。他们也和十三世纪多明我会一样，准备成为教授教团。因此，耶稣会在组织上始终坚持以"才华出众"并"决心遵守纪律"作为选择会员的首要准则。该会终于成了天主教的教授教团，它的目标也确实实现了。早在1600年前后，从西班牙的泰格河(Tagus)到波兰的维斯杜拉河(Vistula)之间的天主教国家的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包括高级文科中学、神学院和哲学院)的确都已由耶稣会掌握了。

学院——低级学术机构　在德国境内把教育机构委托给耶稣会的主要地区，除莱茵河和梅茵河沿岸天主教统治的地区外，还有哈普斯堡(Habsburg)和魏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k)两皇族所统治的领地。

就耶稣会控制的教育体制而言，多数学院都是由君主和教主，还有些是由市议会和私人，捐款建立和捐款维持的。耶稣会对于

这类基金，除非捐款人把款项的使用、管理和监督等全权委托给教团之外，一般都不去经手。学校规章是由耶稣会会长颁布的；著名的1599年《学院课程编制》是该会第四届会长阿奎维瓦(Aquaviva)制订的，并且在1836年罗坦安(Roothaan)会长颁布新规章之前，各学院一直都根据这份《编制》确定教学大纲。学院的院长由耶稣会会长委任，各学院的教务主任和教师则由地方政府委任；但这些人却只对会长和教团负责。资助人对捐款建设的学校是不进行任何干涉的，他感到把捐资兴建的学院委托给耶稣会已经满足了。欧洲各地都不惜牺牲自己的职权，把培养青年一代的教育事业委托给一个国际性的教团，这种独特的协定确实包含着对该会无比的信任和对自我无比的克制！

每所学院都有三部分学生。其核心部分是由耶稣会的新成员构成的。核心部分之外是自费生，一般都是贵族子弟，甚至包括皇室子弟；这些贵胄都把子辈教育委托给耶稣会的。另外一部分则是城镇上的走读生，他们只是在白天来校听课，学院也不收费用。他们通称为“外舍生”。前两者被称为“内舍生”。许多学院，特别是有大教堂的城市中的学院，都附设由神父负责掌握的、专收贫苦儿童而培养成为神职工作者的神学班。

耶稣会所办的学院，在课程方面，和新教的大型中等学校没有多少区别。两者在班级或年级的编制上和所教的学科上，也都相同；耶稣会的学院在课程上也仿效新教所创的先例，增加了宗教教育。拉丁文在语文教学中占首要地位，因为该会是具有国际性的组织，拉丁语文是他们互相交流的通用语。他们的语文教学也以培养“雄辩”为目标；修辞学和诗歌（其中包括戏剧诗词和舞台表演）等学科的教学都极为认真。希腊文则无足轻重了，连《圣经》原文也不读了。科学基础知识和世俗基础知识则合并为“博学课”(erudition)。

大学——高级学术机构 在某些学院中设有大学班，其程度在学院之上。大学班有三年制的哲学班和四年制的神学班。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十三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哲学家。他著有捍卫基督教义的《反对异端邪说文集》，“Summa Contra Gentiles”和概括一切学术的《神学总论》，“Summa Theologica”，还写了许多有关亚理士多德的评论。他对天主教的影响是极大的，天主教会曾正式宣布以他的著作为神学研究的基础）是备受崇敬的圣者。耶稣会认为托马斯的教言不应被废弃，而只有认真加以总结。该会成员在大学班毕业之后，一般都是按其特长在大学作一定时期的教师。通过反复讲课便使他们学习得更加透彻。

耶稣会教育的成就 耶稣会的成绩是辉煌的，不，是压倒一切的。经过不到六十年的时间，它已经成为天主教世界的一个教授团体；到1616年，它已拥有三百七十二所学院，遍及三十二个地区，有13,112名学生。可以大胆地说，这种成就主要归功于它那名符其实的教育。该教团为天主教国家培养出来的教师都是最优秀的，最有学识的，也是最能胜任和最有责任心的。无知、愚昧、懒惰、拙劣、冷酷的人是不会得到耶稣会的推荐的，也是最不配充任教师的。耶稣会会员掌握了各种当代的学术知识，是无可置疑的；无论文艺复兴的文化，还是经院哲学的逻辑，他们无不精通。的确，从该会会员中可以找出相当多的学术界的知名人物。还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其初期，该会就在规章中明文规定各地区耶稣会要注意使教师掌握教育的技能。所以耶稣会所主办的学院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培训高级教师的师范学院。他们在教学方法上得到众多的赞誉，是不足为怪的。到后来，由于过分地利用竞赛、奖励和类似的诱导手段来激励学生进取之心，曾受到人们的指摘。我对这种方法也不敢苟同。教师教导学生认识学习的重要性而使其主动致力于学习，比使学生为争取奖励而努力学习，当然更为妥善。不过，在



奖励与体罚两者之间，我还是赞成奖励的。至于体罚，耶稣会的神父们似乎运用得很少，而且也很慎重。在非用体罚不可的时候，他们是指定专人执行；教师不能每天对学生干这种可耻的事。一般教育原则自然是根据教会和教团的性质来决定的。这些学院的教育不以发展个人的个性为目标，自不待言；相反，他们是以宗教信仰和宗教成规来约束个性，使之循规蹈矩；不过，他们是在发扬人们灵魂中的理性力量为外衣的掩护下，来实现这个目标的。耶稣会成员的全部教育都是以消灭自我肉体的情欲和私心杂念为最终目标。这种自我否定就是使人们为天主教的等级制度和为天主教会，而心甘情愿牺牲个人的意志与生存；归根结底，还是要求人们相信上帝，相信天国。耶稣会成员在思想感情上要达到完全自我否定和绝对皈依戒律，以及为上帝和教会的荣誉而绝对自我献身，其主要手段就是“精神修养”。各学院对非会员青年的教育当然也采用同样的观点，无可否认，也获得了许多不可磨灭的成就。我们不应忽视耶稣会统治学生心灵的办法并不是严厉的强迫，而是依靠学生的自律和依靠学生的良心与光荣感。另一方面，如果说他们毫不迟疑地依赖良心的控制、依赖彼此间互相监视或依赖个人野心的激励等这类危险的手段；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是有理由的，他们的主导原则是：“凡想达到这种目的的人，也必然愿意接受这种手段。”

耶稣会的衰落　对于十七世纪教育发展作出辉煌成就和对天主教复兴作出重大贡献的耶稣会教育，到十八世纪便开始衰落了。我们从他们的态度上去寻找衰落的原因，也许不会错误的。从十七世纪末叶以来，人们都以新科学和新哲学来检验一切事物；而耶稣会领导下的教团和教会对于新科学和新哲学，却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这乃是它趋于衰落的根源。

就耶稣会的本身而言，它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性，是不错的。

因为它的第一条原则是绝对服从权威；这一原则的主要意图是向个人意志进行斗争；它的主导倾向是压制一切革新，不管宗教方面的或文化方面的革新，它一概加以压制。该会的规章中明确地显示这种倾向，即凡有喜爱革新表现的青年一律不得任用为教师。所以这个战斗的教团的最初成就尽管是那么伟大，但它在前进中却同它最初的誓言产生了矛盾。才智之士是绝不接受约束的，而且到了最后，人们感到教团和教会阻塞着一切前进的道路，它遂失去了领导的地位。这时，领导权就自然地落到新教的手中。新教国家的科学和哲学，经济和政治，都显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气象。相形之下，耶稣会学院的声誉迅速降落；1773 年，教团乃被宣布停闭。这时已进入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于理性的信仰达到了顶峰，新教便又在康德哲学中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的最高准则——理性自由和良心自由。这更陷天主教教团于尴尬之境了。

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历史本身在进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实验，通过这次实验来解决“自由与责任的原则”和“个人绝对服从外在权威的原则”之间的争端。在历史上，比这次运动所作的更为明确的结论，是不多见的。新教国家成了进步与自由的代表；而天主教国家却处于“专制主义”与“暴力反抗”相互倾压的动荡之中；如今长期盛行的革命思潮正进一步地削弱着这些国家的力量。

V、总结

新学习制度的前途无限 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两种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教育制度，已被证明是符合长期历史发展的需要的。它的主要纲领是直到十八世纪末仍然被采用的，这种事实足以证明它符合当时的一般要求。这种教育把它那时代的基督教文化和古典文化等两种伟大教育力量，融会在一起了。这里所指的古典文化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亚理士多德体系中所包含的并在中世纪已被采纳的科学和哲学，二是人文主义者所传播的诗歌和雄辩术。现

代科学、现代语文和现代文学等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诞生的教育力量，直到十九世纪初期的大革命运动中才受到重视，才被列为教学的必修科目；到了今日，又有新的进展，即由于这些教育力量的蓬勃发展，遂使中等学校一直保持单一类型的老框框被打破了。

有教养阶级和无教养阶级的分化 谈到十六世纪这种教育的实际成就，可以说就是把它所最重视的拉丁文写作提高到令人瞩目的地位。古典拉丁语文被学术界普遍采用为日常应用的语文，一般学者都应用得相当纯熟和轻快，不少人的拉丁语文修养甚至达到优美的程度。由于竭力学习和运用古典著作，人们对于文体的爱好和审美的兴趣也随而产生并发展了。在此应指出，德国语言和广大德国人民群众并未从这种美学和文学的发展中得到益处。相反，在古典拉丁文化蒸蒸日上的时候，德国语言却日益衰退和没落。在此以前，德国人民已产生了有教养阶级和无教养阶级的大分裂。一方面是为数不多的学习过古典文并能运用古典拉丁语文的学者；另一方面是只懂德语、因而不得进入文学和学术禁区的广大群众。在中世纪，拉丁语文还只是僧侣们的职业“官话”，世俗贵族仍然和人民群众讲同样的语言，骑士和中等阶级的现代诗也是使用人们日常使用的语文写的。但到这个时期，世俗贵族和一部分中等阶级也受到了新古典教育，拉丁文成了多种文件的通用文字，甚至法庭诉讼也使用了拉丁语文，至少也要德语加拉丁语。普通德语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语言，成了对于宗教和法律、文学和艺术等等一无所知的广大群众的语言；因为宗教和法律等书籍都是用拉丁文写的，群众自然看不懂，而文学和艺术等著作更是须受过文法学校和大学教育的人才能看得懂的。象劳动人民诗歌会（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德国各大都市里的一种群众组织）中受人称道的诗人塞克斯（Hans Saehs，1494—1576），在那些受过新古典教育者的心目中，不过是个丑角而已。这些有教养的人们

对于中世纪后期的大众文化的思想感情，在下面两行著名的诗句中表露得淋漓尽致:

“汉斯·塞克斯一个缝鞋匠

也成了诗人！”

一个从来没学过拉丁文，也从来没有听过教授讲诗学课的臭皮匠，在有教养的人看来，只不过是冒充诗人罢了！在这样情况下，遂使德意志人民陷入麻木的深渊，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他们才又开始活跃起来。很明显，这时期的人民群众无异于无知的愚氓。那些捍卫“纯正教义”的有学识的牧师、精通渊源于外国古奥法典的有学识的法官、懂得文学和科学并能写拉丁文诗文的有学识的教授，在人民群众看来，都是高不可攀的人物。

德国语言遭受的灾难 德语由于长期搁置不用，曾陷入贫乏而日趋衰落的状态。从马丁·路德(1483—1546)到莱辛(Gotthold Ephrain Lessing, 1729—1781，德国戏剧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数百年间，连一个有名的德文写作家也没有，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为人民而写作，都是为拉丁文的学者们而写作的，都好象是闭门著述而不公之于众的。所以到十七世纪末叶，在德国语文又开始被运用的时候，德文显出极为凄凉惨淡，无数的文字都是借用拉丁文和法文，语法构造的形式简陋不堪，摹仿拉丁文的表达方式更使德文显得无比拙劣。我们只要拿起托马西乌斯所编的《月刊》，将他摹仿马丁·路德的作品阅读几页，就必然体会到在那两个世纪中德语遭到了多么可怕的摧残。其他国家的语言虽也受到拉丁文的影响，但很少象德语那么严重，这不仅因为它们和拉丁语在语汇和构造上更为近似，还因为象德国那样在文学领域中长期的完全废弃本国语言的极为少有。我只提一下法国作家蒙旦(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和西班牙小说家

赛凡蒂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 这些十六世纪的名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当然，历史上一些伟大的政治变革对于这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在这时期的西欧一些民族大都团结成为统一国家，德意志人民在政治上却仍沦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衰退，再加上德语的衰退，遂使法语在十七世纪盛行于德国，其结果是使法语成为耶稣会公认的通用语言长达一百余年之久。

收获 我不希望使自己遭到人们的误解。只看到上述一系列事实的阴暗面，或许有人便说人文主义在德国教育上根本没有地位。那未免太蠢了。因为历史是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的，而且它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时还会遇到沼泽的阻隔的。纵使在德意志人民与这次西方文化运动之间，要是有可能设置障碍的话，那也不能不使各方面都受到灾难。我们的全部精神生活，要是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就不会有今天的样子。首先，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就不会有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生，更不会有后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因为哲学与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和人文科学，无一不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从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中世纪国家，过渡到以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运动，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事。从中世纪末叶到现代历史时期的开始，这一百五十年间，文化与科学在广度方面的迅速发展，学术与教育在推行的范围方面的不断扩大，都应毫无疑议地归功于宗教改革运动。另外，促使学术迅速传播的最主要的力量，是当时教会与政府都已发展到需要受过学术教育的人来充任牧师或官吏；因此，大约到十七世纪中期，德国境内每个农村最少也有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牧师。另一方面，促进普通教育推广的主要原因，则是初等学校的发展。到十七世纪末，甚至在下层社会里，人们也认为不识字是极不体面的事，当时文化学习的普及情形

就可以想见了。其更为重要的是用德文翻译的《圣经》始终被人视为有价值的遗产；正是凭赖祖先的这份遗产，德语才获得更大的发展的。

印刷术 印刷术和读物对当时教育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首先，它们使教学和思想交流再不必依靠人们面对面地进行了；有了印刷术和读物，也使教育摆脱了学校当局和教育当局的限制，并使那通向个人解放的大门打开了。没有这些，全部现代史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在中世纪，一切教与学都要在教育机构中按政府批准的方法进行，除此之外就再没有教与学了。各种学校和大学都要受当权者的控制，特别要受教会的控制；任何得不到当权者赏识的新思想，都可以通过压制提倡新思想的人，而很容易地被压制下去。印刷术使言论摆脱了因此而受的困境。思想一旦被印成书籍便无处不可流传了；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一切禁止与压制再也无能为力了。马丁·路德要是没有魏丁堡大学的课堂，他就无法扩大其影响，他的宗教改革运动也会同在他以前的许多次宗教改革运动一样，很容易地被扼杀掉。宗教改革若是依靠大学当局所持的态度，它永远也不会实现的。但印刷出来的宣传品确能到处流传，并能在成千上万的地点同时燃烧起燎原之火。印刷术对于到现在为止的历次伟大革命运动，都起着同样的开路先锋的作用。思想一旦被印刷成书，一切禁止和压制思想的企图——检查措施从印刷术诞生之日便开始了——都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在知识方面焕发出五光十色的惊人异采，成了近代欧洲的特点，我们可以肯定，这种惊人的异采是同印刷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欧洲社会方面的变化，如表现在不断消除阶级对峙的变化，也同样与印刷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本有教育意义的书籍或一份有煽动性的印刷品，是可以深入到学校无法到达的遥远的偏僻角落的。

第 三 卷

在法国影响下出现的
现代贵族文化时期(1650—1800)

第 一 章

本时期的主要发展趋势
和新的教育理想

新时期 维斯特发利亚和平会议标志着历史又进入一个重要时期。可以把它看作是神权统治的结束，是以科学和哲学为基础的新文化和新教育的开端。的确，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真正现代的起点,而把它以前划归中世纪。但从另一方面看,整个现代文化的主要发展趋势,却都渊源于和形成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一向统一的天主教会因此而形成的分裂是如此之深，以致这次分裂恰好成了我们现今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起点。

教育机构的世俗化和现代化 当时教育和教育机构的新的发展趋势,可以说是急剧地世俗化和现代化。具体来讲,就是急剧摆脱古典文化的影响和超自然的基督教的束缚。这种世俗化的趋势,到了后来，引起了一种反作用，那就是虔信派运动(The Pietistic

Movement)；另外，十八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新人文主义则是反对摆脱古典文化运动的。

巴黎 现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要作一概括的观察。简单说，这次运动主要是从法国发展起来的，不久即波及到了英国和荷兰。如果说十六世纪欧洲文化生活的中心是集中在意大利和德意志，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都肇端于意德两国；这次运动的中心则逐渐西移，巴黎遂成了新的贵族文化与教育的策源地。

理性主义的倾向 从十七世纪上半期开始而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形成的文化界的伟大变化，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超自然主义的旧神学的崩溃，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尤其是作为现世主义的新哲学基础的数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于神学和基督教的兴趣，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的斗争中，曾经再度兴起，并曾在世界上占了统治地位，在某时期还几乎压倒文艺复兴所提倡的世俗教育的势力；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宗教兴趣却被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学术势力所排挤，而且在很多领域中确实被消灭了。由于教会的分裂导致各地爆发长期的残酷战争，如法国的胡格诺战争、德国的三十年战争、英国的内战等等，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终于使人们对于宗教和神学问题失去兴趣。人们不禁自问：为了这种问题而人类互相残杀和国家互相蹂躏，又何所取呢？这些虚缈的问题又怎能得到解决呢？如果不能，那么，让每人能信仰什么就信仰什么，岂不更为合理？与其浪费唇舌去争论那些无法令人信服的“变质论”(Transubstan-tiation)“宿命论”和“圣体实在论”等问题，还不如去研究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天文学等既具有使人能以理解的永久性真理而又可以验证的科学。如今种类众多的科学确可为现世生活提供创造幸福的新知识；而超现世的冥想，除产生出象神学家那样诚惶诚恐地拜倒在自己所捏造的信条之前的一些蠢物，则是毫无用处的。大约到十七世纪末，对于神学、有时甚至对于宗教和来

世的怀疑和冷漠，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的最普遍的态度。在这种情形下，神学家对于无神论的发展所进行的无休止的怨谤，便黯然消失了。在那个时期所创造出来的"无神论"一词，连一些大哲学家也跟着应用起来，不仅斯宾诺莎和霍布士如此，还有笛卡儿、洛克和莱布尼兹也都应用了。无奈这种神学家的怨怒如今已是无济于事了，他们对新时代精神的恶毒攻击也彻底失败了。历史车轮从此跨入了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天赋人权的时代，中世纪终于结束了。

作为下一时期指导思想的理性主义，主要是在当时的环境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当时数学和数学在自然科学上的应用，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想的起点。具体讲，科学的胜利前进是由哥白尼发动的。他不再凭感觉去解释太空现象，而应用推理和数学图解来说明这些现象了。随后，伽利略为数学打开了进入物理学领域的大门；与此同时，在亚理士多德的机械式的经院物理学中所惯用的根据感觉对现象所作的简单描述，也被如实地表明自然规律的（最显著的如"动者恒动定律"）而与一切感觉经验相反的有预见性的理性解释所代替。康德在所著《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中，也强调现代自然科学的这种理性主义的性质，并且提出他的新认识论作为建立这种理性主义的唯一基础。的确，人们的思想在这个时期已完全受客观事实所支配，因为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全部理性主义以及这个时期的绝对相信理智，都是由客观事实决定的。当时数学被看成是一切真正自然科学的典型形式，按照这种典型重新建立其它一切科学的形式，遂被看成是时代的伟大任务。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纵使仅仅从其形式看，也是煞费苦心地想解决这个问题的。

相信自然事物受永恒不变的规律所支配，只不过是相信人类理性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因为自然事物要是能为理性所了

解，那么，自然事物就必然符合理性的假设和必然同普遍规律相一致。在这里既不存在偶然性，也不存在任何奇迹；因为在这里，偶然性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而奇迹是同超现世的武断与混乱一样的不可理解的。在这里，恶魔们所精心刻划的奇迹首先被抛弃了，随而倒台的还有那些妖魔人物，直到最近，天主教区和新教区还都因为这些人残酷迫害相信邪术的信徒，竟陷入极端恐怖中。对于上帝奇迹的信仰不久也趋于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上帝按照永恒不变的规律和按照理性的基本原理来支配世界的信念。由于从这种观点解释《圣经》而摆脱掉超现实世界的神秘影响的十八世纪的神学理性主义，是以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为依据的，而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是在前一时期用机械定律和数学定律解释自然事物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这种相信现实世界可以为人所理解的思想，也在一般人生观上引起很大的变化。从此，认为学术与文化可以开辟通向"改善人类现状"和"道德与幸福之境"的道路的乐观主义，在人们思想中逐渐占了统治的地位。《圣经》中那种由于人类有知而失掉乐园的教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人类的发展每况愈下的理论，也被相信人类历史所显示的每况愈上的思想所代替。这样，使人们所渴望的尽美尽善的世界，不再存在于一去不复返的幻想的天国之中，而是在我们的面前，在未来了。以上的想法乃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科学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乌托邦。

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变化　上述文化领域中的重大变化也给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带来了同样重大的变化。路易十四的君主极权制是现代国家理想的第一次的卓越的实现。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也达到了高峰，就是说，当时的世俗统治阶级已上升到最高的阶级而成了宫廷贵族，随着他们的地位的上升，僧侣和市民的地位却不断地下降了。巴黎和凡尔赛国王的宫廷，不仅是全国贵族聚会之地，也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荟萃之所。

德国在这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比法国进行得缓和而妥善。德国的僧侣和市民都仍保留一定的原有权利。就是说，僧侣依然是不受政府支配的教会成员，而市民依然是国家法定的选举人。在德国，至少在德国的新教地区，在宗教改革前曾居于高位的僧侣，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他们在天主教统治时期所享有的精神统治者的地位。僧侣现在成了为国王服务的官吏，而国王却被看成是本国教会中品级最高的大主教。还有，他们完全依靠地主士绅的眷顾，仰赖地主士绅的捐赠维持生活。市民呢？他们曾经煊赫一时，并享有掌握富裕都市命运的力量，现在也由于"三十年战争"而陷入贫困没落之境。在这种情况下，除占统治地位的王室子孙之外，只有贵族保持未变。依附于宫廷和政府机关的贵族逐渐把他们统治下的值得掌握的军事和政治职位，通通给垄断起来，享有地方特权的大地主又把农民降低到农奴和都市贫民一样的完全无足轻重的地位，至少使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处于绝对的附庸地位。从此，整个社会生活都以新府邸为重心。柏林、汉诺威、德莱斯顿(Dresden)、卡赛尔(Cassel)、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卡尔史儒 (Carlsruhe)、司徒伽特(Stuttgart)、慕尼黑和维也纳等地的宫廷，不仅是政治生活中心，也是文化生活中心。宫廷贵族和上流社会成了同义词，除此之外便只有群众了。

新法兰西文化　这些欧洲宫廷在当时都盛行法语和实施法国式的教育，法国统治阶级也为各国政治发展树立了典型，法国贵族还在贵族风度和上流社会生活方式上，作出了榜样。巴黎成了新兴的国际文化胜地，欧洲各国青年绅士争相摹仿法国的仪表和风尚。巴黎更是国际新文学的诞生地。宫廷戏剧通过表演充满高贵傲慢神气和端着世界统治者架子的男人和妇女，反映出这个社会的壮丽和豪华。所有巴黎的艺术大师，其中包括建筑师、园艺师、绘画师和雕塑师，为了歌颂伟大的国王，自动地联合起来去创造精美的艺

术作品。巴黎不仅是艺术的中心，而且它新创建的科学院也成了新科学的中心，这所学院以它的声望和成就当然也给宫廷增添了灿烂的光辉。

在法国文化的辉煌成就面前，古典文化便如黎明前的星辰在冉冉升起的阳光下而黯然失色了。十六世纪初，人们视古典文学为高而不可摹拟的完美典范；到十七世纪末，人们不仅敢于同它一较短长，而且大有睥睨之意了。在科学方面，我们可以想象到人们会说：我们的创造发明是足以自矜前无古人的。甚至在艺术和诗歌方面，也不落后于古人，法文不仅优美典雅、举世无双，而且描绘任何文学思想感情也无不尽美尽善。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成就，他们感到毫无愧色似乎也不是没有理由。试问，骁勇善战的古罗马兵团能抵挡现代部队和远射程武器吗？

这种情形使得人们对于古典文化的看法起了极大的变化。现代人开始感到再没有什么东西要向古人学习了，无需再受古人的教导了，自己完全能够独立了。培根和笛卡儿以及所有现代数学家、物理学家、工艺学家和医学家都以轻视的目光看待亚理士多德了。他们所钻研的这许许多多学科，亚理士多德连听也没有听过的。他的一切自然科学无非是为逞雄论诡辩所讲的一些模糊不清而又不确切的概念；而现代思想家却从因果关系对自然事物进行深入探索了。如今还顽固保持亚理士多德观点的大学和各种学校，只能同亚理士多德一样地遭到轻视；人们把这类学校看成是落后于时代的教育机构，它们除了争论和空谈之外，一点真正的科学也没有。宫廷人士对人文主义学校和拉丁诗歌与雄辩术的看法，也是如此，因为它们所讲的都是对于现实生活毫无真正意义的“陈腐艺术”。现在哪里还需要拉丁语的论辩和拉丁文的诗歌呢？对于神学的教义和论战等学术文章，不也是一样吗？

前一时代的教育理想既然已成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以文雅风

范和现代知识为目标的现代宫廷教育理想。作一个成功的骑士和绅士，他须能在宫廷或王室的客厅中文质彬彬而又气度翩翩。他须既擅长骑士的艺术，又擅长现代语言和现代科学，才能胜任宫廷的军事或政治职务。他虽不懂拉丁诗词，但他能讲流利的现代世界通用的语言和熟悉最新的文学作品。他虽不能论辩经院哲学和神学问题，但他精通现代学术——自然科学和数学，并且还学得一些现代政治史、谱系学和地理学的知识。他对当代哲学家也不陌生。他不会因为神学家以恶言秽语咒骂现世书籍，便不去阅读；因为他是了不起的现世主义者和自由思想者，对于目光短浅的正统派神学和迂腐不堪的经院派哲学，同样是一笑置之的。

法国文化影响下的德意志 德国思想界在这时期虽仍旧保持着被动和消极接受的态度，它毕竟也采纳了这种新的教育理想，也有人在这里宣扬法国学者莫里哀和布瓦洛（Nicolas Boileau Despreaux）嘲笑经院派哲学和大学教育的言论。例如，托马西乌斯等人就津津无倦地讥讽人文学教授和经院哲学家为迂腐的书虫。托马西乌斯象以前的舒波（Balthasar Schuppe）一样，认为强使富贵之家的子弟入旧式学校去过修道士的生活，是荒唐到了极点。试看，硬以压制手段驱使孩子埋首于拉丁诗文堆中，充其量只能培养幼小的腐儒苗子；这种方法又怎能培养出社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呢？莱布尼兹的见解也是如此。他也看不起旧式学校和大学，并且认为自己侧身于这样的学校即有损于他的尊严；他本人就是身居宫廷而讲法语的人。他在无数的纪念会上，很象当今显要人物常在这种场合发表重要政见一样，曾详为阐述其关于具有现代和实用意义的功利主义新教育的见解。

虔信派的教育运动 这种讲文雅和重实用的教育，在德国没有象在天主教盛行的法国那样带有明显的不敬上帝的色彩；在德国，不仅中产阶级，贵族阶级也包括在内，对于宗教问题都是比较

严肃的。因此，新教育便同这时期刚刚出现的一种新型宗教生活，结成了特殊的同盟。这种新型宗教生活就是基督教虔信派的运动。它是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从德国西部发展起来的一种反对正统派的运动。新教育与新型宗教两种运动的共同之处，主要在于两者都面向实际和讲求实效，都注意实际生活的兴趣，都厌恶迂腐的学术和思辩哲学家与神学家的玄思冥想。斯宾塞称亚理士多德为“邪恶之徒”，其斥责之词和马丁·路德所用者颇为相同。除上述的观点之外，虔信派虽然有些非现世的气味，但绝非没有“基督教的明智”；而所谓“基督教的明智”乃是既有充分的现世知识，又深明人类的弱点，从而能找出达到必要目的的有效方法。在另一方面，信仰新教的德国贵族阶级虽则倾向于现世主义的新教育，但他们不仅普遍地保持着前辈人的崇高道德，而且对于上帝的虔诚之心也非巴黎人士可比。所以我们在这些虔诚的贵族身上，看到一种极为奇异的“混合”作风，就是既有虔信派的虔敬，又有现代宫廷派的习尚。青年伯爵森增道夫(Nikolaus Ludwig, Graf von Zinzendorf)在日记上记载着如何使跳舞练习和法语会话课程同祈祷和反省等宗教仪式交替进行。虔信教徒和《德意志君主下的国家》(The State under German Princes)与《基督教国家》(The Christian State)的作者埃纳斯特(Ernest)的朋友，西金道夫(V. L. von Seckendorff)，又是这种特殊结合的另一种典型代表。这一切当然没有消除这两种运动在本质上的对抗性，也没有避免两者破裂而相视如仇。克·吴尔夫(Christian von Wolf)于1723年因公开宣扬无神论而被逐出哈勒大学这一事实，乃是虔信运动首领弗兰克(A. H. Franke)和哲学家克·吴尔夫之间的冲突的高峰，它正好说明虔信派同理性主义是不可能长期并存的。另外，从腓特烈大帝以仇恨和藐视态度对待虔信派及其“严肃古板的信徒”这一事实，也可看出要同时既和伏尔泰友好，又和弗兰克友好，是完全不

可能的。

德国语言和德国文学　现在将十八世纪德国语言和文学逐渐发展的情况，略述于下。就全面而论，现代宫廷教育是从外面移植德国的，是不切合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德国统治家族完全是迫于他们的地位而成为国际性的，这是含有反民族性的意味的。他们的统治权之所以建立，是因为当时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的国家。腓特烈大帝的情况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在那时期，如果说还没有普鲁士称霸德意志的想法，那么，他的统治权威，除依仗他在帝国之中是独立的以及依仗他在国际上的地位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可以依仗了。腓特烈大帝的思想感情是完全切合于这种形势的。他的宫廷文化全部是法国的，而且在他为所欲为的时刻，环绕在他周围的都不是普鲁士人。虔信主义运动也没有更多的民族主义性质；它那超自然主义倾向，必然同早期的基督教一样，对于那些促使人类分裂的自然的和人为的尘世间的界限，是不予注意的。不过，在另一方面，甚至在十七世纪，德国的民族意识也有所表露，认为外国语言和外国教育在国内流行乃是德意志民族的耻辱。如果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讲本国语言，书写本国文字；如果笛卡儿和洛克、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柯奈和拉辛等哲学家和诗人都能讲他们的英语或法语，德国人为什么就不能讲自己的德语呢？早在十七世纪前期，以发展德语为目标的组织就曾出现了，其中最早的是“效益社”(Fruchtbringende Gesellschaft)。另外，从奥皮茨(Martin Opitz, 1597—1639)时代到戈特谢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1700—1766)时代，德国已有无数诗人和教师积极地以教科书和典型范例，来鼓励人们致力经典性的德文诗歌的创作，叫人们参照法国诗人和拉丁诗人的模式，制定一套德文诗歌的韵律、格律和主题、素材等等。这种带有爱国精神和学究气味的摹仿诗歌，随着一些有才华的德国诗人的出现而被淘汰了；这时出现在德国文坛上

的有克劳普斯多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莱辛、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哥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和席勒(Johann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等著名作家。无论如何,这辈先驱者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清除了葛罗宾纳斯(Grobianus)淫词秽语影响下的低级庸俗文学，并且通过与其它民族相比较而使德国人看到自己的落后,从而给德国文化运动以有力的鞭策。自十八世纪初叶开始，哲学家遂已使用德文著述了。托马西乌斯、克·吴尔夫和康德等赫赫盛名之相继出现，适足证明这方面的进步;康德更是第一位完全使用德文写作的伟大思想家。

教育改革家：拉提克(Ratichius)和夸美纽斯(Comenius) 当时这些变化如何反映在教育改革的文献上,也应谈谈;因为教育改革方面的文献是曾经及时地出现过的。早在1612年,拉提克就开始遍游德国各地,宣传他的"新教学法"。他的宣传在一些宫廷,特别是在萨克森邦和安霍尔特邦(Anhalt),以及在许多城镇和学院，立即引起了反应。这就明显地暴露出梅兰希顿时期的旧的教育理想已不合于时代要求。这位性情急燥、感情冲动而行动鲁莽的人,不仅在科森(Coethen)的刘易士(Lewis)王子委托他改革学校的工作上归于失败,而且在掌握他的听众上也是同样失败的。然而,他所掀起的教育改革运动并未因此而消失,特别在威玛城(Weimar)和哥达城(Gotha)。在拉提克之后,夸美纽斯(1592—1671)随而把这项改革继续起来。夸美纽斯活动的地方较为广泛。他从波希米亚开始,不久就传播到波兰、普鲁士、瑞典、英国和匈牙利。在这辽阔的领域之中,各处的教育文献,各地的教育机构和学校的教学方法，无不留有受他影响的遗迹。在此我不去谈夸美纽斯的生平、活动和著述,也不多提其它教育改革家的大名(在十七世纪,这方面的作家是很多的)，且概括地介绍这些改革者的工作性质。

就这方面而论，有三个主要倾向须加阐述。一旦掌握了这些倾向，则上述文化领域中的一般发展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种倾向可以称为“现实主义”与“本本主义”相抗衡。改革家们异口同声地指责人文主义的学校片面重视语言教学，批评它们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咬文嚼字上，以致使学生失去了研究事物本身的机会。他们指出，事物的知识是唯一有实际价值的知识，而文字知识的价值则属于间接的和次要的。莱布尼兹曾说，一个人能用三种不同语言来表示同一概念；但他的知识却没有增加。因此，局限于语言教学的学校，必然迷失真正的教育目标。因为学校的真正目标不是讲说漂亮语言而是养成真才实学，也就是取得有关活生生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知识；并且应该以最终获得广泛的和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为出发点，即以掌握一切科学知识的观点，来制定学校的教学方针。

第二种主要倾向是改正学校因过分崇古而牺牲现在。这时期学校所制定的教学方针仍然以中世纪末期的设想为基础，认为唯有古人曾创造和发明过真正的哲学和科学；由这种设想出发，遂把语言教学放在首要地位。不过，从那时起，文化已经又进步了；教育改革家可能也象他们所景仰的培根那样地说：若论真实知识，我们自己是最优秀的，无论就经验的广度或思考的深度讲，古人对我们都是望尘莫及的。因此，他们看清，学习真实知识没有必要再借助于那没有新义的陈旧语言了，因为用任何语言都是可以讲解科学的。此外，他们还可能说：他们在另一方面也超过古人，就是说，他们也有真正的宗教生活。他们既可阅读《圣经》，又何必自寻苦恼地在学校里去讲那些不信基督的诗人所作的诗歌和不知上帝的哲学家所著的书籍呢？十七世纪，无例外地，比十六世纪更重视非基督教的古典文化，这主要仍然是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

第三点是反对当时语言教学方法的错误。人们承认外国语，

特别是古典语，不能完全废除；但教学方法却极需改变。就实际情况看，单单学习拉丁文和一点希腊文就耗费十年以上的宝贵时间，到头来，孩子们还远远没有学通。与此适成对比的是，跟着部队到外国去作生意的行商，仅用几个月的时光，既没有费劲，也没有人教，就学得很好，就能流畅地运用几国外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学校语言教育的成绩不好，完全是教学方法问题。拉丁文本来应该在实际运用中学习，而学校教学却不如此，偏偏靠讲解文法来进行教学。而且学校教师在讲文法时是用拉丁语讲解，真是愚蠢透顶，结果是使听讲的人似懂非懂。教育改革者切望以比较切合自然的方法来代替这种拙劣的教法。具体讲，就是不由讲述文法的格律和抽象的单词开始，而由语言的实际运用着手，或按照拉提克所提议的以某些古典作品为教材，或按照夸美纽斯所提议的以简短语句和日常会话为教材，另外还应译成本国语言。一旦儿童对于生疏的声音，通过耳听和口述都已熟习并能掌握其含意，再给他们讲解文法构造，就易于理解了。这就象先疏松土壤然后再播种子，才易使种子发育成长一样。先讲具体事例而后找出共同规律的"归纳法"，在语言教学上也同样是合乎自然的方法。教育改革家还进一步提出，教师传授普通文法构造时，应该先用本国语言进行解释，然后再练习外国语言的应用。总之，他们的基本要求是，教学应先从本国语言开始，而不应按照学校传统的方法从拉丁文开始。教师教学时，不应给儿童增加不必要的困难，在开始时尤其不该如此。所以在教孩子们学习任何外语之前，都应先进行本国语的读、写、说的教学。

上述各点乃是当时教育改革家的主要主张。我们在 1618 年赫斯郡(Hesse)和 1619 年威玛城所制定的学校规章上，都可看到这种主张的影响。但在学校的实际执行上，由于习惯势力很大，曾作出些让步，不过是逐渐的让步。这是因为对于已经死亡的古代

语言而言，要按当时所要求的切合自然方法进行教学，确实有其特殊的困难。在中世纪，拉丁语的实际运用或许比后来设想运用拉丁语，更容易些；由于中世纪的实际运用已使拉丁语成为活的语言，并且也使它发生了变化而不同于古典的拉丁语了。古典拉丁语是纯粹文学的语言，是涵意完全固定不变的古语，所以要想在今天用合于自然方法进行教学，是必然有其难以克服的障碍的。

第 二 章

教育中的现代化倾向

I、骑士学院

贵族教育发展概况 骑士学院是十七、八世纪教育发展中新涌现出的特殊的产物。它们的目标是为包括王子在内的贵族子弟提供贵族政治教育，以培养他们能胜任军队或政府机关的职务为主旨。要追溯这种教育机构的起源，可以上推到十六世纪末。1589年在杜宾根所建的依拉斯特学会(Collegium Illustre)，1599年卡赛尔所建的毛里田纳姆学会(Collegium Mauritianum)，乃是这类学校的先驱。维斯特发利亚和平会议之后，这种学校增多起来，柯尔堡(Colbeg)于1653年、吕内堡(Luneburg)于1655年、哈勒于1680年、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uttel)于1687年、埃尔兰根(Erlangen)于1699年、勃兰登堡(Brandenburg)于1704年、柏林于1705年(柏林骑士学院被腓特烈大帝于1765年改组为贵族学院)，黎格尼兹(Liegnits)于1708年、埃托尔(Ettel)于1711年、西尔德布尔格豪森(Hildburghausen)于1714年、布伦兹维克于1745年和维也纳于1746年，都先后建起了骑士学院。司徒伽特于1775年建立的高等卡尔斯学校(Hohe Karts-Schule)乃是这类学校最迟问世的；但这所学校同上述布伦兹维克于1745年建立的学校一样，在许多重要方面与其它早期建立的学校有所不同。就学校的类别而言，这些贵族教育机构于十九世纪已不存在；就个别学校而言，多数仅存很短的岁月，以后有的改成纯粹军事学校，

哈勒和埃尔兰根等校则改成为大学了。

骑士学院与社会变化的关系 骑士学院的兴衰适反映当时社会阶级的变化。在十六世纪，贵族子弟和市民子弟曾肩并肩地出入于高等学校，那时市民阶级正处于有钱有势的高峰。到十七世纪，阶级分化使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开了。长期战争导致都市和市民阶级濒于崩溃，而在朝廷和军队中居于高位的君主和贵族，却声威大震。这两个阶级既在社会生活方面产生了差距，因而在学校方面也分隔开来。这时贵族子弟纷纷从旧有的文法学校中退出。他们中间有的在家庭聘导师受教，因为当时学神学的学生人敷于事，待遇又极菲薄，家庭教师遂风行一时；另外，面向贵族子弟的“等级隔离”学校也应运而生。这种专为朝臣、王子和各级贵族所设的学校之多乃是德国的特殊情况，德国贵族在社会生活中也比其它任何地方的贵族保持着更为与众不同的势态。1672年，萨克森的骑士就要求在府邸举行基督教的入教仪式，理由是“同平民子女一起受洗，有损于高门子弟的身份！”这些贵族学校，特别是十八世纪设的贵族学校的主要目标，即专为培养军队和政府的高级官员，新兴的贵族阶级遂更加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

十九世纪贵族学校的衰落 到十九世纪，骑士学院已经消失。贵族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独享的特权已不复存在；而中等阶级由于所受的教育和拥有的财富，又恢复以前的地位，并重新获得与权门通婚和交往的社会权利，以及在政治上，甚至在军事上担任官职的合法权利。与此同时，贵族子弟却重新回到中等阶级子弟也可入的高等学校，而文科中学和大学的学历便成了充任高级官吏，至少是充任文职高级官吏的必要的基本条件；甚至培养未来军官的军官学校的军事教育，也或多或少地仿照“实科中学”的模式来办理了。

教学科目 骑士学院的一般性质是由它们服务的对象所决定

的。它们为新贵族阶级提供文雅的现代教育，而这种体现骑士风范的新教育是切合贵族地位的。就学院的课程看，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占首要地位。掌握拉丁文对于绅士还不是多余的；不过，他们确实用不着再用拉丁文写作诗文，因为无论在宫廷或在公共场所，都不需要拉丁诗文了。另一方面，他们却须要精通法语，要是懂得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后来还有英语，就更好了。在学术教育方面，经院哲学时代已成过去，经院哲学在世界上已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数学和自然科学则大不相同，不仅由于它们本身确有价值，还由于它们即是新哲学和新世界的基础，同时对于军事工艺和和平工艺(如筑城学、建筑学、机械学)等又有应用价值。在这种为满足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新教育中，还设有德国史、法制史、政治学和地理学等新学科；统治家族的谱系学、功勋荣典学以及类似的学科，对于未来的官宦而言，也被认为是有用的学科。至于公法、私法、道德哲学和自然法则等等知识，在培育精通世故的新人的教育中，也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竞技和运动　骑马、跳跃、击剑、跳舞、网球等骑士和宫廷的游戏运动，也被给予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在筹办各种设备的计划书上与具体规划上，对于这些项目都非常重视；有些宫廷还为学生准备马厩和教练员。学校所在的城市如果有朝廷官员的府邸，有时还要规划同它们联系，以便向最优秀的典型人物学习风度和仪表。同时，未来的官吏和骑士也可借此机会寻求奥援、结交有权势的朋友和与贵族人士拉好关系。这些对于他个人的前途和官位的升迁都是必要的。

骑士学院的影响　以上对于骑士学院的简短介绍，足以说明它们具有了现代教育的性质和功利主义的目的。十九世纪的中等学校所设置的一些学科乃是它们首先创设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以往旧文法学校所根本不知道的体育运动课，还有十八世纪文法

学校开始列入课程表而到十九世纪才逐渐被看成与古典语文同样重要的现代语文与自然科学等学科。不过，骑士学校的教育活动并不局限于知识教育。骑士学校和一般旧时的地方学校相似，也都是供应食宿的学校；更重要的，它们还是成熟期青年的道德培训机构。假如它们能继续维持和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条件与环境，假如它们能向中等阶级敞开大门，它们在德国可能会发展成象美国学院那样的教育机构。在那种情况之下，它们作为中等学校和大学之间的过渡阶段的教育机构，就可能为一般青年提供优良的科学与哲学的基础教育，也可能同时为有资产和有文化的阶级，提供比较广泛和比较自由的社会教育了。

II、大学教育

快速的进步 在十七世纪末，德国大学的声誉，和其它国家的大学一样，已是一落千丈。在宫廷文化时期，它们被看成是过时的和逐渐衰亡的教育机构。一些生气勃勃的人物，如莱布尼兹，还有莱辛，都离开了大学。到十八世纪末，大学在德国又恢复了在学术上和科学上的地位。我们现在略述这次伟大变化的性质及其原因。

a. 哈勒大学

现代哲学和思想自由与教学自由 这时期的新发展起源于哈勒大学(1694 年创立)和格廷根大学(1737 年创立)，继它们之后还有埃尔兰根大学(1743年创立)。作为普鲁士振兴新基石的哈勒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大学。它不仅是德国的而且是欧洲的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哈勒大学之所以声望昭著，由于它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采纳了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第二，它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基本原则。在此以前，新教设立的大学和天主教的大学一样，都以教会肯定的教条为教育原则，教授要保证不触犯这些教条；这一点在神学和哲学的教学上固然是最重要的禁条，

在法学和医学教学上也不例外。从哈勒大学始创之时起，自由主义哲学就成了公认的原则；现代哲学与科学的跨进大学并不是通过它们被官方认可为合法的理论体系的形式，而是通过它们成了自由思想和自由研究等原则的依据。这就使大学的性质完全改观。大学不再是沿袭传统教条的学校，它成了领导整个学术界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基地和真理的拓荒者。

托马西乌斯 哈勒大学的第一位教师，也可说是这所新大学学术的奠基人，就是伟大的现代思想家、经院哲学和迂腐学术的厌恨者、卓越的"启蒙运动"代表和首任大学讲座，托马西乌斯(Chr. Thomasius)。他于1655年生于莱比锡的一位教授的家庭。他由于一贯攻击流俗的见解和迂腐的学究，未能获得大学教师的位置。他受尽了凌辱与迫害，终于1690年，简直象逃亡者似地来到了哈勒，在这里进行私人讲学。他的讲学活动导致哈勒大学于1694年问世了。他后来就在该校讲授哲学、德语演说、法理学和自然法则学。他奋斗的唯一目标是粉碎老一辈学究所保持的象等级社会中种姓制度般的使人麻木不仁的魔力，是使科学和大学教育与实际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是以开明思想和实用知识教育青年，借以清除陈腐的博学和崇古的学风。从此，在大学讲学中和科学论文中，德语才被采用了。推翻迂腐傲慢的学究们作为壁垒的拉丁文，对此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批学究乃是以拉丁文作为枯燥无味的学术和毫无实用价值的废物的护身符的。腓特烈大帝对于托马西乌斯非常推崇，把他和莱布尼兹相提并论，认为在现代人中，对德国人民的启蒙和教育贡献最大的，就是这两个人。

弗兰克 几乎完全和托马西乌斯同时在哈勒大学任教的还有弗兰克 (A. H. Francke)。弗兰克的性格与托马西乌斯相反；但二人在某些精神方面却是一致的。弗兰克于1663年生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卢卑克城；后来在哥达城生活和读书；他自1691年起直

到 1727 年逝世止，都在哈勒大学任教。他最初教授东方语言，后来教授神学。首先在德国大学讲授虔信主义神学的就是他。虔信派跟旧日顽固的正统派是对立的，从刚开始就公开冲突；虔信派强调宗教的主观方面，着重人类灵魂的拯救工作，讲求宗教生活方式，要求基督教义的实践。此外，弗兰克还创建和掌握哈勒的孤儿院以及和孤儿院有联系的各种教育机构；他又组织"实践研究会"(Seminarium Praeceptorum)，从而使他在教育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托马西乌斯以现代启蒙运动者的精神教育新兴的普鲁士的法官和官吏，在腓特烈大帝极盛时期，这种教育的优越作用就显出了；弗兰克则以重实践的基督教精神教育北德意志的僧侣和教师，促使他们重视青年的培养，并帮助他们改进教学方法。

克·吴尔夫 该校的第三位成员是克·吴尔夫。他生于1679年。他一生中以大部分时间在哈勒大学讲授数学、物理学和哲学，只有从 1723 年到 1740 年曾到马堡大学任教。他是创建现代哲学体系的第一人。这种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哲学极适合于当时的大学教学。在康德哲学取得统治地位之前，克·吴尔夫和他的学生支配着德国的大学和德国的一般教育达半个多世纪。这种新哲学的基本原则同纯理性主义的"无理则无物"的格言，完全一致。简而言之，没有充分理由则无事物出现，因为因果关系决定一切存在；没有充分理由则无事物的真实性，因为逻辑论证决定一切真实知识。

理性主义 在上述情况下，哈勒大学便成为学术自由的第一个发祥地，同时也成为理性主义的大本营——最初是哲学的理性主义，后来到十八世纪末期，又发展出神学的理性主义。这所大学的建立恰好象征着普鲁士邦与文化进步势力的相互结合，从而成为具有鲜明的重要意义的联盟。这所位于哈勒的普鲁士邦大学，在创建之初即同它的邻邦萨克森在魏丁堡和莱比锡所设的大学，

持有截然对立的主张；因为萨克森的大学是极端保守的和严格坚持马丁·路德派主张的。纵使不能从其它方面找到证据，我们也可以肯定它们的敌对关系。当时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谚语："你要到哈勒大学求学吗？等你回来，你一定是一个虔信派信徒，不然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了！"哈勒大学的前进精神是显然的。

b. 格廷根大学

与哈勒大学对比 在十八世纪期间，哈勒大学已成为德国境内最主要的大学，并逐渐迫使其他大学也吸取了它的特点。在德意志北部居于第二重要地位、并通过它的统治者而和英国有着联系的，是汉诺威。该地于1737年也按照普鲁士的路线建立了一所大学，从而更加促进了这种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这所新大学就是格廷根大学(The Unirersity of Gottingen)。它既是脱胎于哈勒大学的学校，又是哈勒大学的对手。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自由主义的神学以及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几乎已成理所当然之事，这足以表明新运动的开展是非常迅速的。格廷根大学不同于别校的优点，是该校使真正的科学研究受到大力的鼓励和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有经济充裕和设备富丽的图书馆，还有专门从事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研究所。在格廷根大学最享盛名的学科中，历史科学，特别是法学和政治学，居于首位。哈勒大学的法学系属于神学院，而格廷根大学的法学则特别显赫。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格廷根大学成了全德贵族阶级所赏识的学校，贵族青年都到那里学习法律和政治科学，同时也在那里学习礼貌和风度。格廷根大学的教授很注意自己的尊严和所负职责的重要；他们享有优厚的待遇和崇高的职衔，更由于结交外国宫廷而身价大为提高。在伟大的改革运动中，那些十七世纪不谙世故的迂腐学究和教师，竟然由于在物质上受到帮助，一跃而为社会上有良好教养的人，成了人所共仰的"大学教授兼权贵的私人顾问"，从而产

生侧身于上等阶级、并且凌驾于执教生涯之上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在哈勒大学不受重视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格廷根大学却获得了新的生机。促成这一转机的代表人物格斯纳 (J. M. Gesner) 和海涅 (Chr. G. Heyne, 1729—1812, 自 1763 年起任职于格廷根大学，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采用了新人文主义者的研究方法，抛弃了旧人文主义者强令学生摹仿西赛罗文体而练习拉丁文写作的作法，从而取得了成功。这种新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对于古典文学从美学和文学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和对于古典作家进行历史的探索。他们的努力赋予古典著作以新的意义。在海涅历次进行学术讲演时，各学院所有致力学术研究的人无不前往聆听。语言学研究所的建立更是海涅任职期间的另一重大发展；它不啻是培育北德意志所有高级教师的师资培训学院。

哈勒和格廷根两大学的影响 到十八世纪末，所有德国大学，包括新教大学和天主教大学，都按照哈勒和格廷根两大学的模式进行了改革；的确，在德国依然坚持天主教信仰的地区，在启蒙运动的年代里，确实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把教育事业提高到新教地区所达到的水平。这次转变的结果可归纳为下列各项。

(1) 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精神已经浸入所有学院的教学领域，首当其冲的是哲学院，因此，在此以前一直被视为“低级学院”的文学院，这时则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2) 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已成为人所公认的原则，除偶尔发生过倒退情形之外，已经政府认可为大学的基本法权。

(3) 大学教学方法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旧日根据标准教材照本宣科的方法已被学术报告所代替，所谓学术报告就是系统地讲述科学的知识，因为教授要讲述具有创见性的科研成果，就非如此不可。传统的论辩方法也被淘汰，逐渐由各种有关学术的课堂讨论所代替，这种课堂讨论不象辩论会那样专为肯定某项“既定真

理”的教条——因为这样的教条,至少在哲学上,已不复存在——而是启发人们对于学术研究进行独立探索，其最后解决的办法是靠首创性的研究。

（4）在大学中,一般是用德语作报告,这是必然的，因为人们认为这种报告是教授个人随便发表意见的性质。唯一例外就是各处的哲学报告和练习,仍坚持用拉丁语;当然还有天主教大学的神学院用拉丁语，因为在国际方面，天主教会仍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

（5）各地的古典文学的学习,已不再以文学创作为目标;新拉丁文学已衰亡,代之而起的是以新人文主义思想去探索古典文学,其目标是通过古典文学的研究来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

德国大学洋溢着时代的新精神。这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有助于使大学在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法国在大革命中，大学已完全被废止;英国大学则暮气沉沉,早已被人们视为落于时代之后,除供青年就学外，难以起任何更高明的作用。与此相反,德国人对于大学却寄予厚望,不仅仰仗它们来解决科学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民族兴亡的大事,也期待它们提供解决的方针和解决的动力。

学会和学术团体　德国大学的另一特点表现在对于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态度上。在法国和英国，学术研究工作根本未放在大学的肩上；这种学术研究工作从十七世纪起就被新建立的学术机构承担了,在法国就是皇家学院,在英国就是皇家学会。这种情形至今未变。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学并不足以作为国家学术的代表。在德国,学会实际上是各地都有，最重要的是1700年经莱布尼兹的不懈努力而在柏林所建立的科学院。但德国的学会从来没有达到象西欧国家学会那样大的影响。普鲁士的最高学府不是柏林的科学院，而是哈勒大学——尽管柏林科学院曾受到象腓

特烈大帝这样最高统治者的极力关怀和积极支持，甚至其本人还参与过领导工作；而哈勒大学却依靠极不充分的捐赠，也象其它德国大学一样地仅仅享有皇家一份极为吝啬的拨款。至于格廷根大学，由于汉诺威宫廷远在伦敦，"科学学会"从开始就只是大学的附属组织。德国的学会组织和它们的成就，至今仍然如故。所以德国的大学才是科研与学术的真正代表，学会可以说是大学教师团体中推选出来的各种科学工作的专业委员会。

III、中等学校

第一期(1648—1740)

先驱者 中等学校墨守旧规更甚于大学，所以在废除旧的教学法方面也较为迟缓。很明显的原因是，它们总是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不过，有些教育机构向往现代化的苗头，是早已显露出来了。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个别受教育改革家影响的开明君主和个别争取跟上时代要求的校长或市议员，都进行过点滴的革新；对此不能详为介绍。概括地说，处于德国心脏地带的图林吉亚(Thuringia)各小邦在这方面是显著的；弗兰克在哈勒成立的一些教育机构更很快地就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弗兰克曾准备把一所设在哥达地方的学校发展成为大学，因为虔信派信徒埃纳斯特公爵曾允许该校象他的领地内其他学校一样，采用教育改革家拉提克提倡的"新教学法"。这所终于成为教育革新的旗帜的学校就是哈勒学园。

哈勒学园 这是1702年以一所贵族学校为基础所建成的收容高年级学生的寄宿学校。它适合作为过渡时期教育的实例。它仍保存着旧日的课程；但增加了一些新的学科。其主要学科仍是拉丁文，教学目标依旧是精通语言以应会话和写作之用。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教学法上有了一些变化，即教授读、写时，先用德语讲解，关于一般文法规则、词类和词类变化等等，也是先以德语作练习，并以实物教学为辅助，因为哈勒学园的理想是要尽量运用直观教学。

拉丁文法教学所用的课本，最早是塞拉利亚斯(Cellarius)编的，后来是朗格(J. Lange)编的，两者都是用德文编写的。每课开始都先使学生懂得各课的教材的意义，然后再由教师逐字逐句翻译课文，学生跟着反复练习；最后再解释和分析文法构造。就此可以看到拉提克的"新教学法"在该校教学上的影响，虽则这种方法已经有了些显而易见的改变。到了高年级时，学生不仅要用拉丁文写作诗文和撰拟演讲稿，还要用拉丁语公开演讲，参加讲拉丁语的辩论会，并且要朗读和讨论学术刊物上用拉丁文发表的文章。拉丁语也是课堂教学和日常交谈的用语。在学园中讲授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时，以《新约》和《旧约》为读本；教学方法同拉丁语教学法相似，只是不要求象以往那样用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写作而已。

现代语文 学园中除教授古典文之外，当时增授两种现代语文，即法文和德文。德文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熟练地写出典雅的德文"；因此，还简要地讲些演说术，并要学生结合创作、表达和讲演等活动来进行练习，"以便使动作和发音恰当和准确无误"。关于德国文学则不予讲授。法文课的目标也不是学习法国文学知识，而是掌握法语。在教法文时，也以《新约》为读物，因为学生对于《新约》的内容已经熟悉了；同时，法语会话要求刻苦的实地运用。但在学习过程中，课程的安排须按照每个学生不得同时学习超过三种学科的规定，而且须在完全掌握一种学科之后才能学习另一种新学科。所以同时只能讲授两种语文，即拉丁语和希腊语，或希伯来语和法语，"以使学生不感到负担过重，也不感到学科太多，而且学习负担越少则学得越透，进度也越快。"

科学 在科学方面，学园设有数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历史和地理等学科，一般重点都放在实物教学和实际应用上。因此，几何课"尽可能提早增加野外实习"；数学课可以举一反三地进行说明，分数要以实物来讲解。夏季应到乡村或田野里讲生物学；冬季要利

用雕刻和"有时利用狗的尸体",讲解解剖学。还要带学生参观艺人的实地操作,借以获得人类艺术产品和手工生产的清楚概念,同时还教学生学习所见所闻的事物的拉丁文名称。另外,还提供学生以实地练习车削工艺、磨镜片工艺和锯木工作等等的机会。历史教学则包括讲述《圣经》和基督教的历史,以及德皇和现代各邦的历史;教学方法是以图画和大量地图来帮助学生记忆。地理完全被作为历史课和政治课的辅助学科。该科的教学以胡布纳(Johann Hubner)的课本为基础,该课本是用问答法来巩固学生对于教材的掌握的。

宗教教育 贯穿在全部课程中的宗教教育是极受重视的。当然,宗教教育是同样适应实际要求的。在哈勒,教导工作的实际目标是以有关上帝、人类罪恶所造成的灾难和基督救世等活知识来教育学生。在高年级,这种教育要为神学课奠定基础,所以讲解有关教会教义的基本理论。哈勒学园在教育思想方面的胜利多赖于宗教教育;虔信派的宗教教育的影响可以从一些学校的规章上看出许多遗迹。到后来,它产生了反作用;在宗教福音和祈祷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特别欣赏伏尔泰的讽刺文章——这就是跟随虔信主义时期之后的启蒙运动时期开始了!

班级的编制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改革是班级的编制的重新安排。以往采用的死板的班级制度被废除,现在改用按学科分班的新办法,即按照学生所学习的各科进度来分班。

哈勒学园的影响 哈勒学园所企望的是把旧的古典学科同现代语和现代科学综合在一起。它可称为十八世纪前半期所有规模较大的学校的教育目标的典型。可以说,所有较有地位的学校都在课程中增添了法文和数学;不过,还没有把这些学科作为主要课和必修课的规定;它们在形式上仍是私设的学科;正因为它们属于私设的性质,修习这两科的学生须另交学费。大量小规模的文法

学校尚没有受到这些影响，它们仍以拉丁文法和作文作为唯一的重要学科。

第二期(1740—1800)

腓特烈大帝与启蒙运动 腓特烈大帝于1703年登上普鲁士王位，标志着一个新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的开始。从此，德国文化向独立和自由方向发展的步伐加快了；而启蒙运动所到之处，民族的精神生活都获得了新的和丰富的内容。作为宇宙的哲学解释者克·吴尔夫所著的教科书，风行于世，他的哲学思想也浸入各门学科，特别是浸入神学和政治科学。大约从1760年以后，莱布尼兹的更为深刻的思想还借着渥尔夫的形而上学外衣而问世了。德国文学也摆脱了模仿法国古典文学的局限；克劳普斯多克和莱辛的诗都给德国文学增添了火热的激情和蓬勃的朝气。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 1717—1768)歌颂和阐述希腊艺术的崇高的美，赫德和哥德教导人们通过文学领会无理性的创造冲动乃是民族和个人的天赋智慧。这时，崇尚希腊文化的新人文主义成为文化领域中涌现出的新生力量。与之相随而出现的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目标，得到人们热情的鼓吹。所有这些新生力量不能不把它们的影响显示在学校教育上。中等学校的彻底改革是到十九世纪才得实现的；但早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学校在某些方面的活动，已被引入了新的轨道。

希腊文再度受到重视 首先，经过格斯纳和海涅在格廷根大学哲学研究班所作的努力，使学习希腊文不仅在大学重新受到重视，而且在中等学校也重新受到重视。在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和虔信主义盛行时期，希腊文已很不受重视；的确，若不是因它对于新教神学有着重要的关系而受到庇护，它可能早被废除了。新人文主义的兴起使人们对于事物进行重新评价；诗歌产生的新的启发力对于这种重新评价的促进作用，并不亚于卢梭的新教育思想的

力量。人们在这时已经感到还有比对一般功利更为高尚的兴趣；感到“人性”以及知识分子的全面教育，在它们本身都具有绝对的价值。就这方面而论，则不能认为还有比探索希腊知识和熟悉希腊文学更加重要的事。以传授最高文化为目标的教育，若想抛开希腊语文于不顾，似乎是不可能的。布伦兹维克-吕内堡(Brunswick-Luneburg)于1737年公布的学校规章是最先提出重视希腊语文的，这项规章乃是德国高等学校最重要和最详尽的规章之一。规章说："凡确定从事学术工作者不可不攻读希腊语文，否则将遇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凡欲从事任何研究工作者，为求以后工作进行顺利，莫重于事先掌握希腊语文。"这些意见，在以后的年代里又曾多次听到，这种意见并且导致各学校重新研究希腊的古典作家。在布伦兹维克的学校规章中，荷马和西希奥德的著作是同格斯纳论文集相提并论的。厄内斯梯(Ernesti)起草的萨克森邦于1773年公布的学校规章正式规定，地区学校的课程中增加研究尤里披蒂(Euripides 480?—408B. C.)、沙孚克理斯(Sophocles 495?—?406B. C.)、柏拉图和狄摩西尼斯(Demosthenes 385?—322B. C.)等希腊学者的著作。以前希腊文教材除《新约》之外，都是些来路不明的格言式的作品；现在都改用希腊古典名著了。

新语言教学法 这些变化对于语言教学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厄内斯梯论述读书方法时曾建议，阅读名家著作时要精读与粗读结合进行，精读时学习语言文字和文章笔法，粗读则领会主题思想。上举的学校规章还规定给学生安排时间学习古典文学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习时不仅要注意德文作法，还要注意德国文学"对于本国作家的优秀作品不仅应认真阅读，还应留心其措词的优美和用字、用词的恰当。"厄内斯梯的见解已被哲学教学所借鉴了。

普鲁士的教育改革情况 普鲁士的教育改革是由腓特烈大帝时所任命的公共教育大臣策德利茨男爵(Baron von Zedlitz)着

手兴起的。这次改革的目标是秉承腓特烈大帝的意旨，在古典文学教育方面，不论是希腊文学或罗马文学，都必须注意其内容和实质；在学习有造诣的杰出的古典作家方面，应使他们从哲学、辩证法、美学和文学等领域发挥教育作用。策德利茨很赞同热心积极的教育改革家巴西多的思想，并指定普邦大学一律设置教育原理为必修课，还在哈勒大学专为巴西多的学生特拉普（Trapp）创设教育原理讲座。在帮助策德利茨推行他的理想的众多学校校长中，最得力的首推柏林的盖速克（Fr. Gedike）。策德利茨还建立了中央学校管理委员会，作为国王之下的最高教育领导机构。这是使教育脱离教会控制的决定性的措施。这个新机构的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从1788年起在文科中学实行毕业考试的制度；这项措施为十九世纪斩然把中学和大学的界线划分开来，铺平了道路。

实科学校 启蒙运动时期有一项特殊功绩是不应忽视的。这就是这个时期不仅清楚地认识到在文科中学之外，还需要设置高级学校，而且首创性地建立了这样的新教育机构。这种教育机构的产生仍起源于哈勒学园。早在十八世纪之初，哈勒的副主教塞姆勒(Semler)曾经试图为成年人学习数学、机械学、自然知识和手工工艺设立学校，也可以说是学习班，但它并没有成为长久性的教育机构。一个曾经肄业于哈勒学园的学生海克尔(J. J. Hecker)，在考克斯特拉斯（Kochstrasse）建立了第一所这样的学校，名叫“经济数学实科学校”(The Okonomiseh-mathematische Realschule)。这所学校办得很成功，很兴旺；它至今尚存，仅在形式上有所改变。据1747年该校规划书上提供的材料，它除实施基础宗教教育外，还开设德文、法文和拉丁文等学科，后来又增设历史、地理、几何、机械、建筑和绘图等学科。各种工业学习班也在这所学校附设了。这种情形不久就推广开来，许多城镇都随而设立了类似的学校。我们还应注意，这所学校同哈勒的教育机构一样，也具

有师资培训学院的性质，所以它的影响很快就推广到一般学生的范围以外了。

社会的变化 很明显，教育机构的发展取决于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进步。都市的发展和商业的振兴，使人们感到需要新型的学校，需要超出原有初等学校课程范围的新型的学校教育——不再以升入文科中学和大学为目标，而以为学生提供现代生活实际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宗旨。

巴西多的泛爱教育 巴西多(J. B. Basedow, 1724—1780)是泛爱教育运动的领导人。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推行一种切合实际生活的、适合人性的和符合时代精神的教育，也可称之为现代教育、现实主义教育或中产阶级教育。实行这种教育不是使旧文法学校的古典文教育与之并存，便是反对古典文教育。巴西多曾任西兰德(Seeland)的苏罗(Soro)骑士学院的教授，并于1774年在莱奥波德王子(Prince Leopold)的支持下建立泛爱学校于德骚(Dessau)。这是仿照骑士学院举办的而又带有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色彩的中产阶级学院。它以顺乎天性为出发点来安排学生生活，并排除宫廷贵族的生活方式。它以鼓励儿童的积极性为教育的主要凭借，以奖励好的行为来代替体罚。它那现代的、功利主义的和博学的教学性质，可以巴西多所编的《基础知识》为最好的实例。这是一本适合于学校使用的包括各科知识的选集。它的教学方法在于使学习变成有趣的游戏，特别是语言教学。法文和拉丁文要通过日常应用来学习；具体说，就是完全按照十七世纪教育改革家的主张，开始是在游戏中进行练习，后来在学习时作为教学用语，以达到完全精通的目的。策德利茨和康德等有卓识者对于德骚的泛爱学校所寄予的愿望，并没有获得实现，至少没有直接获得实现。经过长期的不景气之后，泛爱学校乃不得不宣告结束。其所以得到如此结局，一方面是巴西多本人有不足之处，即他是富有鼓动能

力的人，擅长向群众宣传的艺术，但缺乏行政才能和领导艺术；另一方面，尽管巴西多曾有卓越的卡姆佩(Campe)和光明磊落的萨尔茨曼(Salgmann)等无可非议的人们给以支持，但新人文主义兴起后，其中某些领袖人物都鄙视泛爱运动。甚至饶玛尔(Raumer)在其所著的《教育史》中对于泛爱主义、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仍显露出嫌恶之情和菲薄之意。不过，泛爱运动所散播的种子终于成长起来而结出果实。最主要的是设于哥达附近的史内波芬索(Schnepfenthal)的泛爱学校和它附属的教育机构，在当地的教育机构中，是最先重视体育运动的。还有，泛爱运动竭力使学校生活变得活泼愉快，也不能说对后世没有影响。同十八世纪笼罩在教鞭恐怖下的学校相比，我们今天的学校确是非常"仁慈"的机构；虽则今天的教师似乎还在被人指摘为"残酷"和"粗暴"之人。当然这种指摘是一切时代的教师所常常遭到的命运。

IV、初等学校

政府管理和强迫就学 这时期的主要变革是初等学校的管理由教会转移到政府手中，强迫儿童入学变成了人所公认的和必须强制执行的公民义务。在十六世纪以前，初等学校无异于教会的附属机构。到十八世纪末，德国的初等学校已不再是教会的组织，而成了政府的机构。政府掌握管理学校的全权，尽管僧侣在政府的委托下仍以国家名义，在很大的限度内，对学校行使管理权。在十六世纪，把儿童入学视为对教会尽义务，学校在教士检查和督促下，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到十八世纪末，一般认为教育属于公民义务的范畴。就社会来讲，有供应学校经费的义务；就家庭来讲，有督促子女入学的义务，家长如不尽责，还以罚款办法迫使其履行义务。

强迫就学的原则首见于1619年威玛尔地区颁布的学校规章。该项规章要求境内僧侣和校长准备登记簿，记录所有年满六岁至十二岁的男女儿童，"以便劝告拒送子女入学的家长履行其职责，

必要时可由地方政府勒令家长履行。”适龄学生须全年上学，无论冬夏均不得中断，“除农业收获季节假期四周和教区节日与教会节日放假数天外，不得缺席一天，甚至不得缺席一小时。”1642年哥达的埃纳斯特公爵所颁布的著名的《学校规程》也按照这个原则规定：所有儿童自年满五周岁起，即须入校读书，“直至学完所应学的全部知识，并经当局审查合格”，方得离校。儿童第一次缺席时，每缺课一节，罚家长一便士，依次递增，至每节课罚金六便士为最高额。这项章程很可能是第一份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的规章。埃纳斯特公爵对其公国的教育事业尽心竭力，是忠于他的诺言的。

普鲁士 在十八世纪，所有普鲁士各地区纷纷仿照埃纳斯特公爵的先例颁布了类似的学校规章，几乎无一例外。渥尔鲍姆(Vorbaum)编辑的《新教区学校规章集成》对于这些细节记载甚详。大致说来，较小的地区实行较早，大地区实行得很迟。在此且就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①的具体发展情况予以介绍。普鲁士当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期间(1713—1740)才采取了一些真正有效的措施。腓特烈·威廉(1620—1688)任勃兰登堡选侯期间(1640—1688)的良好意图，因新教与天主教的分裂而未得实现——勃兰登堡采纳新教信仰是在1613年。腓特烈·威廉的继承人腓特烈一世(1657—1713)于1703年加冕为第一任普鲁士王，他专心致力于宫廷艺术与科学，不暇多关心群众教育。腓特烈·威廉一世恰与其父腓特烈一世相反，专注意低级社会的事务，而不关心宫廷学术与教育。他是弗兰克的推崇者和支持者。他重视初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使每人都理解基督教的主要真

① 勃兰登堡—普鲁士是指勃兰登堡“选侯”(有选举神圣罗马皇帝权的诸侯)腓特烈一世于1688年加冕为普鲁士王以后的普鲁士。此时神圣罗马帝国逐渐名存实亡，各诸侯中普鲁士实力最强、疆土不断扩大，勃兰登堡成为其核心。

理；不过，对于初等教育在提高臣民及士兵的经济生活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也并非不予注意。在普鲁士，他是第一个实行强迫教育的人，他于1716年和1717年连续发布了实行强迫教育的法令，同时他又为他的权势所能及的地区的学校，特别是乡村学校，奠定了巩固的经济基础。他的继承人，腓特烈大帝于1763年颁布的《普通学校规章》，乃是重要的发展步骤。这份规章规定：强迫教育最迟应自儿童五岁开始，最后至十三或十四岁为止，“他们不仅须精通基督教的主要教义，娴熟读写能力，还须能回答教学手册中所规定学习的知识”。儿童缺席的罚款应作为学校的基金。学校上课时间规定为每日自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下午则除星期三、六两日外，均自一时至四时。学校和教师宿舍的维修费由教区负责；教师工资由学校收取学费支付。凡入启蒙班的学生每星期交费四分之三便士，入读书班者交费一便士，入读写班者交费三个半便士；夏季收费减为原定数额的三分之二。遇有特别需款时，则由教会捐拨，或由教区基金支付。僧侣和教会主管人员负监督学校的责任，教会主管人员每年视察学校一次，僧侣每周视察学校二次，他们须同教师交换意见，并须给学生上课。

教学内容　这时初等学校的学习科目仍同十六世纪一样，包括读、写、宗教教育和唱歌。算术和自然与历史等知识，是慢慢增加的。威玛尔于1619年制定的学校规章曾提到乡村学校教授拉丁文，这时则已取消了；哥达的学校章程也没有再提拉丁文课。在哥达后来的学校章程中，曾规定高年级学生在学完其它功课之后，可学些自然和历史知识。除算术之外，他们还学一些几何学、博物学、本地的教会及政府的制度等，这些都要从同他们有切身关系的和他们眼前常见的事物讲起。在1763年颁布的普鲁士学校规章中，教学内容仍仅限于读、写、宗教教育、唱歌和少许算术知识。除此以外，该规章只谈到儿童学习一种讲述“有关上帝、世界和人类

的普通知识"的柏林出版的课本,还学习一种讲述乡村儿童所需要的各种知识的乡村儿童教育课本。萨克森选区于1773年制定的学校规章曾提到较多的教学内容,除程度最好的学生的算术课要教到比例算法以外,对程度比较好的学生要"用引人入胜的叙述方式,讲授些最必要的和最有用的地理、宗教史和政治史等知识,首先要讲有关萨克森的宗教和政治方面的知识;也要讲解《奥格斯堡信仰与教条的声明》(Augsburg Confession)中的主要信条;还要讲述有关市政和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宗教和政府机构、教会法和民法等方面的知识,以及有关日历、新闻报纸和其它常用物品的知识。"从一般目标看,这些要求并不高,而实际却未达到。刚刚开始,强迫教育的执行就遇到一些严重的障碍,例如家长方面的经济困难、漠不关心、态度不积极、思想不通;再如校长和教师方面的自私自利和自以为是。"豁免"入学的情形到处可见,最常见的是:在夏季,学校每周只上课三天,而且那时正是半天上课的时候。征收缺席罚金时困难之大,自不待言。同时可以想象,学校教育的成效虽属低微,但到这时期之末,没有上过学校的儿童倒是没有了。与此同时,学校本身的障碍也很严重,如校舍拥挤不堪,最突出的是教师普遍学养不足。严格的师资培训教育在当时还没有。只有个别地区刚在出现师范学校或师资培训学院的萌芽;普鲁士的孔尼兹堡、朱利考(Zullichau)、什切青等地曾仿照哈勒学园,后来又仿照海克尔的实科学校,纷纷建立孤儿院,在这些孤儿院中曾小范围地从事培养师资工作。在许多地方,毫无疑问,有些僧侣曾无私地致力培训教师的工作;普邦于1763年颁行的学校规章还曾把师资教育列为僧侣的责任之一。至于大量乡村教师,则是依然如旧,没有改进,他们的知识范围从未超出他们以前在乡村学校或其它地方所学的贫乏知识。在设有教堂的大村庄里,一般都由教区僧侣兼任学校教师职务;小村庄的学校则由手艺人,特别是由有久坐习惯

的手艺人来担任教师，他们借助学校菲薄的报酬来维持生活，这份报酬在他们心目中是很值得的。的确，直到1738年以前，普鲁士还把乡村教师享有包揽本村缝制衣服的专利权，作为改善教师经济状况的办法。这些教师自然只能教简易的读和写，最多再教些简单的算术而已；至于教学方法之差，就更不消谈了。所以许多地方学校的教学水平始终没有超出启蒙阶段，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在小有声望的学校里，特别是在上课不正规的地方，很多学生只学会少许背诵，此外便什么也不会。我很熟悉这种情况，因为我开始读书就是在一所只有一个班级的乡村学校，这种学校当时仍然是普遍存在。不少学生只在冬季才上学；所谓阅读学习者不过是被教师拷打而已，他们积年累月地从念字母和学拼音起，直到背诵单词为止，结果是并无成效；写字教学则只是描绘粗糙而令人生厌的字母；长年辛辛苦苦的最终成绩就是反复叽哩咕噜地背诵《教义问答》，熟记一些《圣经》摘句和几首赞美诗而已。

强迫教育的成就 人们很可能要问：所有学校既然如此，实行强迫教育有什么益处呢？强迫教育既然没有好处，当权者何不听任家长自便呢？如果想到儿童被禁闭在校内，两眼终年瞪着几个毫无意义的字母而口中朗读连意思都不知道的教条时，他们的身心受到何等严重的摧残，我们就不难理解裴斯泰洛齐为什么那样怒责这种强迫教育是杀害儿童心灵的凶手了。不过，强迫教育仍是推动教育前进的渠道，因为强迫教育所经过的道途虽是阴暗的，却仍是导致光明的。的确，正是这种强迫教育激发起所有心地良善的人们，为整顿现行教育而呼吁。因为既然使儿童都到学校来，政府自然就把无可逃避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负责提供受过专业培训的合格教师，来充任真正的人民的教育者。事实上，国家的领袖们曾在一些时候对这种呼吁确是装聋作哑而未予置理。如所周知，腓特烈大帝曾命令由领取养老金的士兵担任学校教师，这

样，士兵和学校就都可不由他支付任何代价了。如果腓特烈大帝的观点是这样，如果他认为农民受了高于启蒙水平的教育就会造成社会危机，甚至说“农民一旦受到较优的教育，就要到都市里来当职工”等，那么，过于责难乡绅对学校不够热心，说他们甚至对学校应尽的起码义务也漠不关心，就不公平了。

罗考　在这里，还应提起一位勃兰登堡的贵族、勃兰登堡-普鲁士教育史上的显赫明灯，他就是勃兰登堡附近的莱坎(Rekahne)地方的罗考(Frederick Everard von Rochow)。他感到提高臣民的生活水平是贵族统治阶级的责任，遂以极大热情从事他那领地内的学校教育的改进工作，并以他个人的力量发展学校教育，慷慨地向教师和学校捐资，另外，他还为学生编写了课本和为农民编写读物。他虽遭到和他地位相同的人们的白眼，但他看到策德利茨男爵这样人对他的赏识，看到他的学校已成其他地区的学校所效法的典型，终于感到无比的欣慰。1778 年，海尔伯施塔特(Hal berstardt)的天主教会建立起第一所名符其实的师资培训学院时，他既是教会的人员，又是这所学院的主要创办人。

私立学校　除公立学校之外，德国还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学校。城市里的私立学校尤多。它们常受人鄙薄为“露天学校”；但一切想取消这种学校的企图都失败了，这点似乎证明这种学校还是社会所需要的。有些私立学校是长期性的，拥有众多的学生；也有些是临时性的，规模很小，或者是几个家庭为自己的儿女合聘教师施教，或者是个别人为谋生而设馆招生。人们对私立学校的指责很多，有的说公立学校的学费被它们给剥夺了，也有的说它们所收的是回避学校管理的逃学学生。在教学方面，特别在宗教教育方面，遭到的批评也不少。至于私立学校的教学工作，则同公立学校无甚区别，教员也不相上下，因两种学校的教师都是没有受过专门培训而自学成师的。直到师资培训学院普遍设立和公立学校进一步

整顿之后，那些滥竽充数的学校和教师才被逐渐淘汰。

以上所述就是十八世纪教育机构发展的概况。

其他教育事业的概况及其影响 还有一种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事业，在此须加阐述。在这时期，特别自十八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一种在教育影响上开始与教会和学校相抗衡的新事业——普通读物的出版。直到此刻，德国的下中层社会的广大群众才为提高心智而养成读书的习惯。在此以前，人们只是为宗教信仰而读些《圣经》、赞美诗集和福音集等宗教书籍；现在的人们则为开发心智、增广见闻和提高见解而转向世俗书籍。托马西乌斯是第一位不为推广学术知识，不为宣传宗教信仰，而为启发各阶级人民的智慧进行写作的作家。他于1688年创办的《德意志月刊》是第一份定期刊物；这份月刊同托马西乌斯用德文撰写的有关哲学，特别是有关逻辑和伦理学的论文一样，是第一份适合于"各阶级有教养的读者"的手册，并且如同这类出版物在今天一样的时髦。托马西乌斯在所著《推理艺术概论》的扉页上写道："本书以深入浅出的、一切有理性的人(不论阶级，不论男女)均可理解的方式来阐述：不必借助演绎法，就能判别事物的真伪，并能发现新的真理的方法"。很显然，在他心目中的"一切有理性的人"就是"普通"而"无偏见"的读者；他撰写这本书的真正目标是鼓励读者不要被大学里流行的"迂腐"学术所吓倒，而要相信自己的常识。克·吴尔夫的《合理概念》也是以这种观点讨论各种哲学问题，尽管他的著作中带有一些学术气味。后来到十七世纪下半期，他陆续出版了大量通俗哲学读物，其中包括腓特烈大帝时期由柏林科学院发表的法文论文。《德意志月刊》不久同《道德》周报合并起来。这种经过汉堡从英国引进的以新兴阶级为对象的刊物，都将少量"启蒙知识"提供读者，以便于他们吸收。戈特谢德在莱比锡主编一份类似的报刊，是以鼓励德国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为目标，他的活动是很有成效的。当

时还有些评论刊物成了作者与读者的媒介。黑勒(Haller)、克劳普斯多克和格勒特(Gellert)更成了当时德国群众喜爱的作家。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一批有教养的群众终于在十八世纪生气勃勃地成长起来。在通俗读物的影响之外，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剧院也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它很有利于宣扬启蒙运动在教育和道德方面的作用。新的舞台已不仅只供观众娱乐消遣，其最突出的用处是增进观众的品德和提高观众的智慧，使他们分清智、愚、贤、不肖，并明确他们的不同后果。青少年文学就是在这时产生的。各种男女儿童的书刊，其中包括有教育意义的和有道德意义的故事、诗歌、轶事和会话，还有冒险小说，甚至儿童周报——其中最成功的是魏赛(Chr. F. Weisse)的《小朋友》(Kinderfreund)——都在这振兴教育的时期出而问世了，它们都乐观地相信：人们一旦看到表现善良与正义的哀婉动人而富有感染力的情节，将不会再干丑事坏事了！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坚信苏格拉底的保证：没有人明知错误而仍愿去做的。启蒙运动时期对于有关青年训练和教育的任何事物所怀的热烈希望和乐观感情，皆导源于这种信念。

V、天主教地区

启蒙运动　在十六世纪大分裂之后，已经分道扬镳的天主教地区和新教地区的德国人，到了十八世纪下半期，又在启蒙运动中寻到了共同之点。在教育领域中和在哲学、科学、语言、文学等领域中一样，天主教地区急起直追，向走在它前面的新教地区看齐。限于篇幅，在此且略述两个主要邦的发展情况。在哈普斯堡(Hapsburg)和魏特斯巴赫(Wittelsbach)两统治家族的领土范围内，①

① 哈普斯堡皇族先后统治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西班牙等地；魏特斯巴赫皇族先后统治巴伐利亚和莱茵河巴列丁奈特等地。欧洲的皇族开扩疆土，一方面是通过征服，另一方面是通过婚姻。玛丽亚.德利莎属于哈普斯堡皇族，她是奥地利大公爵地位的公主，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后，神圣罗马帝国女皇；约瑟夫三世属于魏特斯巴赫皇族，他是巴伐利亚的国王。

约当十八世纪中期，都开始了从大学直到小学的全面教育改革。例如，玛丽亚·德利莎（Maria Theresa 1717—1780）统治下的奥地利和约瑟夫三世（Maximilian Joseph III）统治下的巴伐利亚（Bararia）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其主要目标就是将各地教育机构纳入政府的统治之下，使教学世俗化和现代化，并使学校增设科学和历史等学科。

奥地利的教育改革 维也纳的医学院，在宫廷太医总监荷兰人斯维丁（G. van Swieten）的掌握下，首先引进了现代科学和现代方法；随后，其它学院也纷纷跟了上来。紧接着，中等学校也着手进行了改革。以前曾经在教育领域占领导地位的耶稣会的声望，久已逐渐衰落。曾经委交耶稣会办理教育事业、并在十六、十七世纪曾经取得一定成效的贵族统治阶级，此刻在奥地利也同在其它各地一样，厌弃了逻辑的和形而上学的论辩，厌弃了人文主义的雄辩和学术气味的诗歌。因此，一个同现代要求无大抵触的新教派，皮亚利派（The Piarists 1600 年前后创建于罗马的教团，以教育教团闻名于世），一跃而起，与耶稣会相抗衡。1752 年，皮亚利派在学校课程中增添了德文和现代科学，并规定了学校应受政府监督管理的一套崭新的学校规章，在各学校强制推行。1773 年，耶稣会被勒令停止时，该会财产被充公，拨作整顿小学教育之用。皮亚利派的马科斯（The Piarist Marx）是随后于 1775 年颁布的学校规章的执笔者，也强调把德文、科学和历史列为教学科目，他还进一步建立了中学毕业考试制度，规定学生必须持有毕业考试及格证书，始得升入大学哲学院肄业。初等学校，则在大修道院长费尔比格（Abbot Felbiger of Sagan）的掌握下，按照海克尔在柏林所树立的典型进行整顿。费尔比格早年，当塞里西亚（Silesia）归属普鲁士之后，曾在该地积极从事教育改革工作，随后又奉奥地利女皇之命执行一项任务。该地于 1774 年颁布的《师范学校、文法

学校和初等学校的规章总纲》，就是根据他的建议所制定的。

巴伐利亚的教育改革概况 巴伐利亚的教育改革是在克·吴尔夫的弟子伊克斯塔特(J. A. Ickstatt)的主动努力下完成的。他于1752年首先整顿英戈尔斯塔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ngol-stadt)，然后进行整顿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并于耶稣会被停闭的次年，即1774年，颁布了新的学校规章。约在同时，他还在梅茵河和莱茵河沿岸广大的主教统治地区，进行了类似的教育改革。

天主教地区和新教地区在教育改革上的显著区别 天主教区的改革是比较突然的；而北方新教区的改革则是逐渐地、有组织地发展的。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都是从上而下地"奉命开展启蒙运动"。因此，许多地方的运动显示出按政府规定和受政府监督的气氛，教师和学生在运动中感受同样的沉重负担。顽固的功利主义思想所产生的急功速效的愿望，在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0—1790，玛丽亚·德利莎之子)的谕令中特别明显。这一切曾在利奥波德二世①统治下的奥地利，在狄阿多②统治下的巴伐利亚，引起了相同的反抗倾向；在德国新教区也引起了与腓特烈·威廉二世③这个不光彩的名字相联系的类似的反抗倾向。

小　结

一般趋势 这一历史时期的教育发展，显示了三种主要趋

① 利奥波德二世(Laopold II)是约瑟夫二世之弟，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国王，于1790—1792曾继约瑟夫二世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② 狄阿多(Charles Theedore)系巴伐利亚国王。

③ 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于1786—1797年任普鲁士国王，在他的统治时期普国军队腐败不堪，大败于法国，丧失了莱茵河西岸的所有领土。

势——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不断扩大，世俗化不断进展和教育洪流不断加阔。第一，这时教育机构的监督管理权开始从教会转移到政府手中，政府不久即设置了专门管理教育的官员，尽管在许多地方仍由僧侣暂时用政府的名义承担管理教育的职责。第二，神学失掉了在教育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各科教学都要服从教会教条的事体，已经废止。这在大学中最为明显，大学讲授的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已完全不受教会的限制，大学在这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中等学校，甚至在初等学校，宗教教育的支配地位已经丧失，或至少也不得不允许世俗学科取得与宗教教育并存的机会。第三，受到学校教育影响的群众不断扩大。在写作上一般都使用德文，在哲学和文学作品上一般都带有民族色彩，于是一个爱好读书、阅报、观赏戏剧、关心艺术与科学、和重视政治生活的广大有教养的阶层，遂逐渐形成了。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也在这时开始出现。尽管十八世纪的初等学校还不值得称为教育机构，而广大群众毕竟是前进了一步了；十八世纪的强迫教育更为十九世纪群众地位的得到提高，打下了基础。

第 三 章

十八世纪末期——教育的新理想

本章的目的是比较详细地阐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德国文化教育领域取得支配地位的两大思想运动——自然主义运动和新人文主义运动。在此以前，在文化教育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是启蒙时期的思想。在前一章，我们已经在一些地方提到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但它们充分地发挥作用，是十九世纪之初的伟大教育改革时期的事。

A. 自然主义

卢梭 形成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年精神面貌鲜明特点的自然主义思想，始源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他的同时代的人们喜欢叫他"让·雅克"。他是瑞士日内瓦人，是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反叛分子。他反对他那时代以及一切被当时视为合法的和伟大的事物，他反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他反对当时的思潮和价值准则。他用从他那受尽折磨的心灵深处迸发出的感人的语言，把这种反叛精神灌输给他的读者。一切他所见到的事物，一切在他那时代足以令人自豪的事物，无不使他义愤填膺——宫廷和宫廷生活；豪华的文明的上流社会和作为这种文明基础的社会阶级，即把人类分成"主人"和"仆人"的阶级制度；口头上谴责这种社会，却心安理得地同其谴责的人们坐在一起的自由思想哲学家和作家；还有教会，一方面宣讲人性本来堕落和信奉基

督以求升入天堂的教条，另一方面却以教条为基础建立统治人类灵魂的人间王国，同时又借支持现世王国以获取物质财富和奢侈生活的报酬。他那种为贫苦阶级的反抗精神所激起的自我意识，使他坚定地反对当时充满浮华和虚伪、肤浅和欺骗的社会，反对那缺乏真实、坦率和尊重自然价值的社会。卢梭所作的恰是此类切中人心和从而使人心充满愉快之情的事体。

卢梭这种对于人生评价的彻底改变，只能从潜在于人性深处的强烈的反抗中产生。这种从内心深处爆发出来的强烈的反抗精神，一直是对准现代文化的全部理论，对准风行一时的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他所反对的这一切，都在启蒙运动时期发展到了顶峰。这种“认识”的目的就是把整个世界简化成“概念”和“公式”，以便用这些“公式”解释客观现实，在遇到任何套不进“公式”的现象时，则统统加以歪曲或排拒。崇尚理智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从不尊重人生和自然，无情地强使它们屈从制度或“公式”的枷锁。卢梭的真正敌人就是这种理性主义。他以其对于人生的现实的强烈敏感来痛斥理性主义。在此以前，现代世界仍普遍地以理性主义的观点对待人生，把“认识”看成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力量，“认识”引导人通过科学而精通哲理和豁然贯通，“认识”改变人的性格和人的生活，从而导致人们达到文明和幸福的境界。卢梭的第一篇论著就强烈地抨击了这种观点。他说：“不！艺术和科学并没有使人更好一点，没有使人更道德一点，甚至也没有使人更幸福一点！在自然状况中，人对科学一无所知，但人在本能和感情的指引下，却比有了所谓文明更幸福的多！”正是这种论调，后来竟在喜气洋洋的进行曲中引起一种极不协调的怪调；也正是这种对于思想、科学和文化价值的否定论调，后来竟发展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

卢梭的《爱弥儿》(Emile)　卢梭这位批评家以批判当时所公

认的文明准则的心情，把他的探索目光投向了教育方法问题，并在他于1762年著成的《爱弥儿》中，发出了一股新的抗议洪流。他坚定地指出，现行的教育压制和奴役人的天性，不是任其自由和使其充分发展。的确，儿童甚至得不到接触自然和接触真实事物的机会。几乎从婴幼儿时期起，他们就被"概念"和"公式"给牵制住了；死记硬背就是教师的教学方法，博学是唯一的教学目标。一些欺人惑世的所谓成就，还有外国语和五花八门的华而不实的知识，成了学校所重视的宝贝；而对于探索正确对待现实和人生所需要的判断能力和实际智慧的教育，却一点也没考虑到。谈到品德教育，也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心灵和意志的培养，高尚理想和雄心壮志的培养，都被视为无足轻重，除社交礼仪之外，再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因此，我们到处所见的都是以流俗的价值准则代替原始的和永恒的自然价值准则，只求外表的华丽和壮观，而不顾自然的真实和纯朴。人的天性拒不接受这样的教育实验，是不足为奇的。但人们为了把这些反乎自然的"成就"当作"精华"来塞进青年的头脑中，却不得不依靠强制手段叫他们反复诵记拉丁文法的规则，学习那似通不通的外语，或咕噜一些晦涩不解的神学公式，这是必然的。青年的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一样，也是用强制和压迫、认罪和惩罚等戕害青年意志自由发展的办法，硬把一切传统的礼节和道德准则以及各种行为规范，灌输给他们而已。

以上是《爱弥儿》的否定现实的方面。但它也有积极的方面。卢梭不是悲观厌世之人。他不象叔本华那样把文化与人生完全看成是不可救药的现象。在卢梭看来，还有一种有价值的生活，它不是教会口头宣传却不能实践的彼岸生活；它是"自然"所培植的、是从人的天性中滋长起来的、是未经虚伪文明所践踏的自然的和原始的生活。与此同时，人类也另有一种文化，它是不使人类败坏而痛苦的文化，它是存在于人类的"天赋才能和力量"的自由发展和

完美无损之中的文化。为了这种文化的实现，卢梭便以他的新教育理论，并以他那与《爱弥儿》同时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的新政治理论，来铺设道路。卢梭认为，顺乎天性的真正教育不是按照既定的体系培训人，也不是按照人的社会地位训练人，而是倾听“自然”的呼声。这就是在形成学生个性时，要按照受教者的意志所指明的倾向。要允许学生在锻炼自己的能力时，有自由活动的余地，从而使他在物质社会和精神社会中取得经验，这乃是学生们达到正确理解怎样待人接物的唯一途径。这种教育所要作的是在儿童自行摸索经验时，耐心地帮助他避开太困难的问题和有危害的问题。一个人除非通过自己努力和体验，是没有别的办法能获得道德或文化修养的。只有通过自己主动地吸收的知识才有助于他的修养；自己无动于衷、自己漠不关心，单凭外力生塞硬灌，是没有用的。的确，现行教育的主要错误就在于相信：对不愿意学习的人，可以把教育强加于他。正如内部没有生机的事物，就无法使它发育成长一样；自己心里没有学习要求的人，也无法使他的知识提高。

卢梭正确地提出了关于智育理论的第一条准则——坚持期待的态度，一直等到他首次显示出其本能渴望求知的时候，才慎重地提供合于其本能接受能力的资料，以备他进行练习之用。感觉是最初启发儿童的心智，使他去接触外界事物的；而儿童急于观看外界事物，就是他的智能的最初表现。教育者应拿实物或实物的模拟品来满足这种渴望。儿童不仅要观看东西，而且要握或拿这些东西，但这时他对东西的实质还没有充分的认识；等到他发现能够利用这些东西作什么事体时，才达到充分认识的阶段。爱弥儿就这样在乡村中成长起来，并且在游戏中高高兴兴地学会运用各种艺术的能力。自然王国中的人就是通过这样历程获得最初的关于实际的真正知识的。他不是从书本上或文献资料中搜集事物的抽象

知识，而是从与事物的日常接触中，直接地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他对周围环境很熟悉，却不曾学习过地理；他通过日夜的变化而知道一些天象，却没有听说过天文学和浑天仪。儿童凭着这种方法，就把自然知识的基础奠定了。随后，他就慢慢地想要“理解”事物了，就是想要知道各种现象的原因了。在这时，教育者不应去教他死记物理学定律，而应帮助他去自行探索事物的底蕴。他第一步应该使儿童观察事物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帮助他自行找出这些问题的内在联系和掌握具体现象所体现的普遍规律。最后，学生的心中开始了理性活动，要去理解事物的全面，即理解事物的意义和事物的成因。教师此时不应要他死记教条式的公式，而应利用自己的经验鼓舞他去进行独立探索。教师以自己的经验教育学生并不是要学生按照自己的答案去解答类似的练习课题，而是在学生解答练习课题时提供参考，使他加快进步而已。

卢梭的教育理想 这种新教育理想是：不应培训人成为驯服工具，在社会上循规蹈矩，或盲目信仰某教派的教条；而是通过培养人的全部天性，以发展“自然”赋于他的一切才能，从而培养他那全面发展的而且不受任何压制的个性。简言之，培养人性。

卢梭的影响 卢梭对他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德国引起的轰动或许比在法国更大。在法国，伏尔泰仍然被奉为他那时代的伟人；在德国，青年一代对于卢梭这位“日内瓦伟人”的崇拜取代了对伏尔泰的崇拜。康德、赫德、哥德、希勒和费希特等英俊之士的内心深处，都曾受到卢梭的激励。卢梭道出了他们存于内心的炽热愿望，那就是废除对于法国宫廷文化的摹仿，这种摹仿是压抑和歪曲人性的；废除以宫廷社会和阶级区分为基础的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因为这种制度降低了人们作为理性动物的地位；并且要“重返自然”，即重新恢复纯朴而天真无邪的生活习惯，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尊重自然而寻求更好的文化的途径，这种更

好的文化将使符合自然的人生价值恢复到应有的地位，并将同真诚和善良、忠诚和真挚的品格，互相协调起来。

康德 康德的伦理思想完全是由上述的精神中发展起来的。他认为人的真正价值不建筑在学识、风度、智慧或任何特殊的造诣的基础上，而是完全建筑在合乎正义的意志上的；即建筑在诚心诚意而不是随波逐流和虚心假意地服从道德规范的意志的基础上的。他认为教育的伟大目标和主要任务是培养每个人或每个有理性的人的天赋的合乎正义的意志，使它达到清楚的自我意识的境界；或者说，培养能坚持自己确认为合乎正义的事物的自由人。

赫德 赫德是联系卢梭自然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纽带。正是赫德使我们看到历史生命的永无止境的变化；也正是他使我们看到幼儿的智慧活动，从观察事物时所显示的最初活动开始直到最高的活动表现，其间的每个简单表现都含有神意的启示。以虔敬而愉快的心情如实地认识历史生命的变化，更因有了从成长和发展中获得的"广阔的视野"而感到欢欣鼓舞，从而提高个人的生命价值，并且把个人生命纳入永恒的生命之中，在赫德看来，乃是真正的文化，也就是人性的培养。所以教育的目标必然是使青年一代紧密接触自然和历史的实际，从而启发他们按照自己天赋的能力来谋求个人生命的发展。在公式和抽象中是没有教育意义的，只有在生命的充分发展中才有教育意义。

裴斯太洛齐 把卢梭思想开始应用到德国教育实践中的，是巴西多和裴斯太洛齐。巴西多和他的业绩，本书已曾论述，不再赘叙。现在且扼要地谈谈裴斯太洛齐。他生于瑞士的苏黎士，毕生的活动也从未离开过瑞士。在热烈同情人民和极端厌恶宫廷生活方面，他与卢梭有着同感。在表达这种感情的方式上，卢梭是发出滔滔不绝的激动人心的论证；裴斯太洛齐则以真挚而深厚的热情，积极投身于教养一些受压迫和受鄙视的穷苦儿童。帮助这些可怜

的儿童得到基础教育和人道主义待遇，乃是他的伟大愿望。在这种心愿的驱使下，他把纽霍夫(Neuhof)的一些乞儿收容到自己的身边，给他们工作和教育，希望把他们教养成在人类社会中有用的成员。当这项努力失败之后，他又在斯坦兹(Stantz)进行同样的实验；并且当他发觉自己已经发现了真正初等教学方法时，他立即把这种教学法在柏格道夫(Burgdorf)的幼儿园进行试验；然后又在伊佛登(Iferten)的学校使用，并进一步加以改善；直到晚年，他仍在艰苦与困难中坚持辛勤的工作。他的教学法的主导思想，在他所著《葛姝教子法》(How Gertrude Teaches her Children)中作了最有系统的叙述，其要点与卢梭的思想完全一致。他也认为教育人的唯一途径，只有激发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作用。要充分发展人的天赋或充分提高人的才能，除实践和实地练习之外，别无其他办法。从这观点看，他藐视他经常见到的学校，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他愤怒地谴责它们，从无厌倦。他猛烈地抨击它们用有害的死记拼音和死记课文，作为初等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因为这种教育已经把欧洲的基督教徒降低，使他们成为没有接触过人间世界的和没有灵魂的饶舌者和空谈者。他说这种麻痹生气勃勃心灵的纯粹诵记，把运用感觉和运用理解的机会统统给排挤掉了。他痛斥印刷业在各阶级中散布对书本的盲目信任。他痛斥宗教改革运动为宣传《教义问答》而鼓励印刷业，和以《教义问答》作为初等教育的主要内容。裴斯太洛齐为革除这种愚蠢荒谬的呆板机械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主张教学方法要以洞察儿童心理活动和心理发展的心理学研究为基础，并应有计划地启发儿童的天赋能力和促进它们的有机发展。这种方法的第一条规律必然是从具体到抽象。他承认，概念离开了感觉经验，只是一些文字和空洞的外壳；而以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事物为基础的概念，乃是能够掌握事物的有生力量。他自己认为这条真理是他的方法的精髓。他认为，

他的主要功绩是以直观教学为教学的绝对基础，从而揭示出一切教学的基本形式，那就是通过感官使智慧从其萌芽中发展起来。关于裴斯太洛齐所实行的和他在《葛姝教子法》中所论述的直观教学法，其主要之点就是使语言的运用同对实物的实际观察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用通过双眼观看和双手触摸所理解的事物形象，作为理解反映事物形象的语言声音的基础；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练习掌握事物的数与量。当学生从总体上对于实际已有了基本理解时，教学范围就可以走向专门化。就是说，到这时候自然和历史、语言和数学等知识就可以逐渐分开进行教学了。这种教学方法上的变换所产生的结果，即教育不是叫儿童机械地死记呆板知识，而是培养心灵，使它成为在各方面利用一切感觉活动和智慧活动的有生力量。

B. 新人文主义

新人文主义与卢梭的自然主义的关系 卢梭提倡的自然主义运动，在许多方面同另一个伟大运动产生共鸣和产生相互的影响，而且当时的文学、艺术以及人生观等方面也深受这一伟大运动的影响。我们习惯上称这一伟大运动为新人文主义运动。这两种运动的结合起了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的作用，并在教育领域起了积极作用和起了决定新教育理想的范畴的作用。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大致如下：新人文主义认为卢梭所探索的真正文化与教育，可以在古希腊世界找到完美的典型。它把希腊文化看作是"自然"的完善的和理想的体现，把希腊人的典型看作是充分地和不折不扣地体现了"自然"的创造精神所要求的人类形象。因此，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按照古希腊的模式塑造青年一代，即使不能在体格和容貌上如此，至少在心灵和精神上应该如此。就是说，应该用希腊人所具有的情操、寻求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反对内外敌人的坚定气概以及对善与美的热爱，来培育青年的心灵。

新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关系 在德国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已经被宗教改革和其他一些反文艺复兴的运动所窒息，或至少退回到无生气的古典主义。新人文主义运动似乎是一种复兴“文艺复兴”的运动。无条件地崇奉古典文化为完美的典型乃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特点，同样也是新人文主义运动的特点。当然，新人文主义也还有它自己的特点。其较为重要的特点是：第一次文艺复兴运动所瞩目的是恢复古代罗马的世界，认为奥古斯丁的岁月是应该复活的伟大时代。这第二次文艺复兴运动则把雅典文学和艺术以及雅典哲学和雄辩术的辉煌岁月视为黄金时代。这两个运动之彼此不同是渊源于它们的历史背景不同。第一次文艺复兴运动的实际发源地是意大利，而第二次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则是新教统治下的北德意志。前者带有一种浪漫的爱国主义色彩，它的目的是恢复被野蛮民族入侵所毁灭的古代语言和文化。后者乃是建筑在纯粹精神关系上的。新人文主义时期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论证德国人和希腊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具有密切关系。仔细地讲，就这两国的历史使命而言，德国人或希腊人都是以哲学和科学、文学和艺术等思想因素为国家存在的重心，并不象罗马人或法国人那样以政治和军事为国家生存的重心。这件事又引出了第三点区别。意大利的或拉丁文学的文艺复兴的主要倾向在于复活或延续古典作家的写作，新拉丁文学就是这种努力的产物。但德国的或希腊的文艺复兴恰好是阻止向这方面发展，所以它的复活古希腊语言和文学的目标也不相同。无论如何，就复活希腊文学而言，根本不是要去摹仿，而是要自己创作出可与希腊文学媲美的作品，要从希腊文学的精神方面，如果可能，还在其创作能力方面，寻求指路明灯。这种精神又导致由新人文主义者在学校中兴起了古典文学研究的革命运动。旧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拉丁文体的摹仿活动，早已衰落，到此时则完全废止；而新兴的希腊古典文学则和国

语并驾齐驱，并居于首要地位了。

新人文主义的高潮 十八世纪末，新人文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哥德和希勒一同站在新人文主义的立场上，在德国文学界起着支配作用；并使德国文学界相信古希腊世界是人性发展的最高境界。弗·吴尔夫(F. A. Wolff)和洪保(Baron Wilhelm von Humboldt)把这种思想灌输到大学和各级学校之中，以致"用希腊模式塑造你们自己"一语，历经一个世纪之久，始终在学术报告中不曾停断地回荡在学生的耳朵里。

新人文主义发展的客观条件——宗教、政治和社会 希腊古典文学之所以得到迅速复活，从当时的情况看，是三方面的原因促成的。第一是宗教的处境。旧的宗教信仰已经丧失，不仅宗教信条失去了信任，连基督教本身也是如此。显然，从来没有过任何历史时期，比启蒙运动时期，更不能容忍那大讲"赎罪"的宗教。态度比较坚定的人把基督教视为文化与教育的敌人，而态度温和的人也把犹太的教士认为是和蔼可亲的善人。古希腊世界似乎给这个时代提供了一个新宗教，一个更近乎人性的宗教，它是以理想人性代替上帝的宗教。古典文学研究在这个时期风靡一时，这种研究却不是旧日神学意味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复活，而是热情崇拜那被视为获得新生的古希腊文学，因为古希腊文学的新生乃是真正人性的新生。

第二是民族感情。获得觉醒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在这时摈弃了法国语言和它的伪古典主义，而把古希腊视为真正的古典主义的源泉，视为西方文明所共同继承的各种文化生活的真正的始创者。就莱辛看来，摈弃法国文化和热爱古希腊文化乃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

第三是当时的社会变化。以宫廷和贵族为一方同以新兴的中产阶级为一方的阶级差距，正在逐渐缩短；在新文学和新哲学以及

在科学和大学之中，这时都弥漫着大众化的和自由主义的精神。这些新兴阶级现在也从古代希腊寻求同盟者和支持者，借以抵制德国贵族所欣赏的法国的宫廷文化和教育。他们相信已经找到了唯一的真正的人类教育；在他们眼光中，具有高尚教育的实际代表不是法国人，更不是效仿法国宫廷的第一、二流的德国宫廷，而是希腊人。

新教育理想 这样，法国的达官显宦和豪门贵族的理想，到了启蒙运动的后期，已为新文化和新教育的理想所代替。这种新理想就是富有人性的理想，也就是古希腊所体现的理想。这种只有合乎“自然”才能完善无瑕的文化，正是卢梭所追求的文化。人已不是按照社会习惯准则所塑造的傀儡，也不是他所隶属的职业界的枯燥无味的专家，更不是神学教条的奴隶，而是具有人的个性和特性的人，具有真正人的意义的自由人，他们象有创造才能者创造艺术作品那样来创造自己的生活，他们确实是这种伟大艺术作品——公民自治社会——的首创者。希腊人称它为 Kalokagathia 是很恰当的，这一词应作为全人类教育的真正而永久的理想。

第四卷

十九世纪

第一章

本时期教育的主要倾向和一般概况

浪漫主义运动 在十九世纪开始时，德国人的精神生活深受当时盛行的一种伟大革命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潮就是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运动和启蒙运动恰是彼此互相补偿的两个极端。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以来全部文化思想发展的最终产物，它以纯理性主义为基础，绝对相信"理性"，认为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唯一手段是理性与科学。浪漫主义与此相反，是反理智的，它的特点之一是倾向于非理性主义。在精神生活上，它对于非理性方面的感情、情绪、幻想和想象给予高度评价，以此来反对过分强调理智的思潮。它不在有意识的智力活动中去寻求创造的生命力，却在潜存于人的内心深处的本能中去寻求。这一点正可说明在启蒙运动时期遭到鄙视的大众诗歌和类似的表现群众精神的作品，何以竟然受到浪漫主义的热爱和欣赏。这也正可说明浪漫主义所热爱和欣赏的中世纪，为什么也恰好是启蒙运动时期所鄙视的对象。难道中世纪

不是一个充满大众诗情的崭新的生活时代么？难道那时的宗教不是信徒们所信仰和憧憬的真实世界么？难道中世纪的国家和中世纪的法律，不都充满各种真实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同于今日流行的抽象概念么？这就进一步说明浪漫主义之所以热爱和欣赏旧教了。从浪漫主义者的角度看来，宗教的真实意义只能存在于天主教，而不能存在于新教，因为在宗教的发展上，天主教似乎已经到达了终极目的，它已经把"自然宗教"提炼成为几个抽象的哲学命题了。

整个浪漫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导源于卢梭的自然主义；但在德国，它有一个以海曼(Hamann)为代表的独立分支。这位"海曼谬种"厌弃具有明确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启蒙运动时代，并且对赫德和雅可比(Karl Gustav Jacob Jacobi 1804—1851)都曾产生一定的影响。浪漫主义的神学家是施莱尔玛赫(Friedrich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他坚决主张宗教的最深的根是从"感触"和"感情"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象正统派和理性主义派一致声称的那样从"理解"中生长出来的；因为正统派和理性主义派在一切问题上都是浪漫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浪漫主义哲学以舍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helling 1775—1854)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为代表，他们推翻了以前被视为一切科学典范的数学和物理学的统治，而确立了那以探索生存奥秘来解释"自然"为目标的形而上学。他们在所谓的"意志"中，即在那种无意识和无理智的天赋本能的"意志"中，发现一切"真实"的实质，而"观念作用"和"理解能力"则是由"意志"逐渐发展出来的，因而属于第二义的。

法国大革命的失败 历史事件的发展助长了这些倾向的发展。法国大革命——按照人的理性建立新国家和新宗教的企图——遭到人类的无理性的和历史性的力量的挫折。这些无理性

的和历史性的力量在以往曾经遭到过打击，但不久又重新恢复起来，终于战败了理智；理智遂显示出没有建立人类社会新秩序的能力，并使人们回复到建筑在习惯风俗和历史发展基础上的旧的生活方式。历史本身似乎在教导人们知道，人并不是旧时定义所肯定的"理性动物"，也不是在逻辑上和理性上足以自傲的生物，只不过是历史环境所形成的人，即按照种族经验所体现的"普遍理智"而生活的人。

历史中的理智 在这种理解下，坚信历史的价值遂形成为十九世纪人们在思想感情方面所独具的特点。一切事物的合理性，都被视为是事物本身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历史学家看来，在法律和习惯以及在语言和宗教中，内在的逻各斯(logos)无处不是显然存在的。所以他们认为主观地探索或研究如何从外部促使历史生活的一切形式合理化，是没有必要的。现实本身就是有理性的，不仅那受"客观逻辑规律"支配的物质世界是如此；而且那按照"进化论"(进化目的是有理性的)发展的有机生命，以及显示出有"客观理性"(使"自我意识理性"成了"客观理性"的支流)的历史，也都不例外。历史派的法理学家和思辨哲学家在这点上的见解是一致的，这种思想已经复兴了，最近并以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形式行动起来，他们的行动，从历史的理论上讲，不是没有根据的。

历史研究 这种认为历史本身含有理性的信念，引起了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与爱好。当历史被看作只不过是一堆偶然发生的事件，绝大部分是由愚昧和野蛮造成的事件，而且各个事件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内在意义或必然关系的时期(这就是十七、八世纪理性主义者所持的基本历史观点)，人们把历史研究除作为涉奇猎异的资料之外，几乎别无他图。一般科学研究的兴趣只限于理性领域，只限于探索普遍的和必然的真理。这种状况到十九世纪就完全改变了。人们既认识到历史发展本身是"有理性"的，史学便变

成了科学，不仅引起哲学家的关注，而且很快地促使人人积极学习史学，以致使史学研究和探讨蔚为十九世纪的独特风气。语言学和神话学、法学和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文学和艺术、科学和哲学等等，到此时都从进化论的观点进行研究。对于历史事实的鉴定以及对于历史事实内在的逻辑必然性的探讨，乃成了杰出学者的主要课题。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著名学者有：葛利姆弟兄(Jacob Grimm 1785—1863，其弟 Wilhelm Grimm 1786—1859)、萨维格奈(von Savigny)、洪保、鲍普(Bopp)、黑格尔、弗·吴尔夫和奈布尔(Barthold George Niebuhr)。

在这时期，一种新的"观察力"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历史观；也就是从历史事物的相互关系观察历史事件的能力。在从前，史学家曾抽象地意识到人类生存的主旨随时代而不同。不过，他们虽仍然坚持通过现在的情况去观察过去的人生，而统治文化生活的教条势力必然地引导他们从过去的历史中去寻求与人们当前有关的各项争端和问题、思想和方法。直到这些教条势力垮台，正确的历史观才开始取得自由发展的机会。到此时，人类的眼睛终于睁开了，看到了历史生命的无穷变化；那种正确鉴别每一历史时期的特点的努力乃成为史学家热情探索的主要目标。关于历史观察的范围后来如何不断扩大，人文学科的学术性质如何在这种影响下不断演变，在神学和法理学以及在哲学和文学与艺术史的教学上如何采用史学研究代替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暂且留待以后各章阐述。

民主主义倾向 现在且概括地谈谈当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情况。这时期的一般特点产生于下层社会的巨大而不可阻止的进步和民主主义精神的传播。十七、八世纪时，贵族阶级业已失去其以前的优势和以前的社会特权与法律特权。十九世纪前半期以中产阶级的兴起为标志。那时由于商业和工业的进步，私人财产大量增加，而土地财产却减少了，至少在其相对价值上是下降了。发展

到十九世纪中期，人们掀起伟大的政治运动便促成了立宪政府的建立，中产阶级从而获得了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地位。人民的代议制的最初目标，当然是使富有的和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影响。到了世纪的后半期，一个新政治运动出现了——这就是"第四等级"的兴起。简单说，由于大都市和大工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庞大的劳动无产阶级队伍聚集于各工业中心；随着生活和教育水平的稳步提高，这些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起社会民主政党，并根据普选制度的规定而成了合法的政治组织的成员，从此，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他们更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现在这种劳动党派，在许多方面，还被看作是一种革命力量。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给他们以适当的地位，并劝导他们致力政府部门的各项和平工作，将成为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了。

党派之争 在十九世纪政治生活中，与上述运动有连带关系的另一种现象是党派之争，这种斗争在十八世纪尚无人知晓，到十九世纪却成为一切政治事务中的普遍现象了。我们在任何地方，不论在国家和社会，还是在教会和学校，到处都可看到彼此对峙的势力在互相倾压。在这个世纪的上半期，主要是为政治体制而斗争。在革命的1848年，新兴的中产阶级，至少在名义上，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种自由党与保守党的斗争总是同宗教与教会的冲突，紧密相联的。贯穿这一世纪，致力重建传统权威的努力从未间断，新教坚持一切取决于《圣经》的经文，天主教则坚持延续教皇的专断，双方斗争的结果是前者获得各种不同的成功，而后者也稳步地得到进展。这一系列政治和宗教教派的搏斗曾使理性主义被逐出教会，但未被逐出世界，它在世界上仍然发挥着敌视教会的作用；这种敌视教会的势力，经过激化过程，便发展成为敌视一切宗教。和这种思潮相伴随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首先取得大部分有教养阶级的拥护之后，到此时已广泛流传于群众之中。不料，在纯粹教条

信仰与绝对无神论的两极端之间，又出现一种处于中间地位而起折衷调和作用的哲学唯心论，它认为无论在康德或黑格尔或费希纳(Gustav Theodore Fechner, 1801—1887) 的哲学中，宗教世界观与科学知识是可以协调起来的。无奈，这种唯心论无论如何已难以成为思想界中的真实力量，以往人们所侈谈的精神一体的思想遂完全不见了。以前的宗教信仰一体的思想曾统治欧洲文化一直到十七世纪，甚至到十八世纪它仍以“自然宗教”形式成为协调思想与感情的基础；现在这一体已被分歧所代替，在任何地方再想取得宗教和科学两者的相互谅解和共同合作是困难的了，有时的确是不可能的了。

所有上述的这些影响也波及到学校教育，它们争夺学校的斗争经历了整整一世纪之久，至今也未曾停止。争取统治地位既是各党派之所以成立的动机，从而各党派无不企图使学校服从自己政党的利益。各党派既然希图用学校来影响青年一代，因此教育就不顾青年心理的发展与发育，硬要按照“未来的政权会掌握在得到青年一代的拥护者的手中”的准则，用个别党派的思想和政见束缚青年和培育青年。实际上，这种准则并不可靠，因为青年和未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笼络的。尽管他们设置藩篱和屏障去牢笼青年，青年们仍是善于寻求达到自己目标的途径的。

民族主义倾向　在十九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两种特点，那就是民族思想的增长以及国家的活动的不断扩展和加强。当十八世纪，在有教养阶级的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人道的国际主义；到了十九世纪，在一般欧洲人的思想中却产生了民族意识，而且这种意识不断地发展，有时甚至达到仇恨和藐视一切外国事物的狂热的民族主义的程度。每个民族都企望成为一个绝世独立的整体组织，即使最小的民族也不例外，的确是民族越小而越严重。它们以本国语言和文化受到外国的影响为耻辱，常常显露出

堂吉诃德式的过敏的神经质，好似民族界线就是判别真与伪、善与恶的界线。这种趋势由于欧洲腹地出现两个由单一民族所组成的大国，而更形加强。具体说，受历史命运的阻碍，经历许多世纪而在政治上迄未统一起来的德意志和意大利，为了保持民族成为独立的国家，都曾进行长期的流血战争。

从德国独立战争开始，民族思想便不断加强，到俾斯麦时期的战争中乃达到最高峰。随后，它导致其它国家的民族思想也同样地加强起来，特别是一直受德国语言和文化影响的东欧国家；其结果是德国人民和德国文化在多数地方遭到公开的敌视。

国家的活动扩大 在这历史阶段，国家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活动能力的加强，在所有国家都是同样的明显，在德国比在其它任何国家尤为突出。在十八世纪，国家把炫耀武力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目标，即使不是在实际上，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这种观点自然导致国家不仅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并且也努力促进其人口与财富的繁殖，从而也间接地促成了民族文化、科学知识和普通教育的进步。但在十九世纪，国家在实际上已变成了专门为民族利益而从事促进民族文化和推行民族理想的机构。这时所实现的正是费希特和黑格尔的主张。他们不仅看到国家不仅要成为巩固民族政权和民族安全的组识，而且要成为实现民族道德观念的组识。这种倾向突出地显示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教育方面，其次在社会政治方面。现代教育体系的主导思想是：国家既然是代表民族生命的组织机构，就应该使全体民族成员，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为了民族的尊严，都有接受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必要机会。这种思想促使国家大量扩充公共事业，并且促使国家对学校提供的经费惊人地增加。在这方面，德国创始于前，其它国家相继追随于后。第二个突出方面是近三十年的社会政治的发展，其主导思想也是：作为民族机构的国家有责任维护全体成员经常的

工作效能，特别是对那些地位低微或有缺陷的成员，具体说，就是要保护他们免于遭受剥削和工作过重，要帮助他们解除危难，并要保障劳动大军中的残废者和衰老者的生活。

十九世纪德国的教育 十九世纪开展的德国教育运动，在欧洲各国之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德国大学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科学研究中心。举世的学者不断到德国走访或留学；各国的大学，特别是美国的大学，力图仿效德国的大学。在初等教育和科技教育方面，德国也成了欧洲各国的师表。但不能忘记的是，德国也曾以邻国为师，其学习邻邦时间之长久和钻研之勤奋，也非其它任何欧洲国家所能及。过去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德国曾向意大利学习人文主义文化；当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时，德国又从法国学到现代宫廷文化和语言；另外，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德国还向英国的中产阶级学到哲学、科学和文学。最后，自十八世纪末叶起，德国在接受古希腊文化上也比任何其它国家更为热心。其结果便形成德国人在知识领域的丰富性以及在兴趣方面的广阔性和多样性。如果用音乐来作比喻，那么德国教育具有多音复调的特征，同其它国家教育的单调与排外相比，恰成显然的对立。德国学校设置的外语课的语种很多，学习各语种的学生人数也很多，这足以表明德国已成为沟通东西和南北各方文化的中介。

这历史阶段教育发展的三个时期 第一是从大学到小学，各种教育制度的改组和完善时期。第二，从四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是教育发展的停滞和受压制时期。这时期的教育正是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风暴的反映，以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和普通教育持有不信任的态度为特征。最后，从德国政治出现欣欣向荣的气象开始，教育又跨入生气勃勃突飞猛进的时期。由于政府和人民恢复了相互信任，引起人民对普通教育的重视。到这时，个人的知识与道德的每一步提高，都被视为整个国家的收获了。

第 二 章

十九世纪教育机构的发展

普鲁士的复兴 十九世纪初期流行于德国的思想，就是前面阐述的康德和费希特、哥德和席勒等人所倡导的崇尚人类尊严和人类文化的思想。在这里，须再谈一谈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教育机构改革的成就。因为大革命遗产的承受人和大革命遗嘱的法定执行人拿破仑，给整个欧洲政局造成的巨大变化，促使人们非改革教育不可。为了删繁就简而易于说明问题，现仅就普鲁士邦作为解说。世界公认在十九世纪教育改革中，德意志居于带头的地位，至于教育改革的功过则又当别论了。

在所有欧洲各国中，遭受拿破仑摧毁最惨痛的莫过于普鲁士。普鲁士在战后，政治组织完全陷于崩溃。因此，使它有可能，同时也有必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府。这项工作是在1806年耶拿战后的十年中着手进行的，这是最艰巨而富有成效的十年。正如施温(Schön)所说："举国人民都急切希望改善现在的社会及其个人所处的状况，所以国家便又可交上好运了。"德国最优秀的儿女，也可以说是民族的精华，都走上这一运动的前列。其他代表人物要数斯坦因男爵 (Baron von Stein 1757—1813)、夏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 1755—1813)和洪保(Wilhem von Humboldt, 1767—1835)。斯坦因重新建立起政府的组织。他以建立城镇与市政的自治和解放农民为起点，来实现他那完全以自由公民的自觉行动为基础的国家建设计划。夏

恩霍斯特是以全面实行义务兵役制来建立新军，其建军思想也是国家要以自由公民的自愿武装力量为基础，公民要紧握手中枪，随时准备为保卫国家而效命疆场。洪保重建教育制度的主导思想，同样是依靠自力奋发而养成独立自主的人格。

洪保 洪保是最卓越的人物，可能是当时唯一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哲学家和学者，同时又是语言学者和政治家。新时代的一切力量都融会于他的思想之中。当启蒙运动时期，他成长于柏林，并在柏林接受教育。他在格廷根大学受到海涅古典文学教育的熏陶，并通过对于康德哲学的研究而获得了新哲学思想。他还由于同席勒和弗·吴尔夫亲密相处，而在古典文化领域中找到他的研究兴趣的中心。在他探索古代希腊世界时，他以人、以人的本性为钻研的真正目标。他以普鲁士派驻教廷大使的身份在罗马消磨许多岁月之后，于 1809 年初被任命为普鲁士新建的教育部的教育大臣，并由尼可罗维亚斯(Nicolovius)和苏佛恩(Suvern)两名政府顾问充任他的助手。洪保任教育大臣未久，即于 1810 年 6 月 23 日离去；但这短短的时间却使他为国家在新的基础上建树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并使这个教育体系焕发出一种新思潮。这时期的大学以及中小学所采取的发展方向，历经一世纪之久，除去极少量的修改之外，始终保持未变。

民族主义的热狂 在讲述教育体制改革之前，须要谈谈当时的思潮。这个时期恰如费希特在他的《告德意志国民书》中所宣称的，是一个热情激动和人心振奋的时期。全人类的生存可以被提升到更高境界的思想，从来没有象这时那样深刻地激动人心。人心又有些象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期那样地鼎沸起来了；唯一的不同是这次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如果说这种民族主义目标比法国大革命的目标狭隘一些，也正是为此，其实现的可能性就更大一些，其目标也就更明确一些。大革命把法国人从旧政治制度下的

阴郁苦闷的生活中唤醒，使他们的一切能力可以自由发挥，并且因此使得他们的力量能够大量集中，从而拿破仑便可凭借这种力量竟把欧洲搞成当时七零八落的样子。在另一方面，大革命也促使德意志民族依靠其潜在的自力更生的本性走上复兴的道路。的确，拿破仑的入侵使德国显然失去了复起的希望；但这样反而使它得到了自谋政治生存的可能。人们感到德意志民族复兴之路，不仅是德意志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大事；在人们的思想上，德意志人的显著特性乃是人类必不可少的，这就是费希特以他那独特而深沉的笔调所表达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给爱国主义热情加上一层宗教的情趣。人们还有另一种坚信不移的信念，就是，"凡属必要的事，无论如何也必然是可能的事。"这种自由的概念正是康德的"凡是人应该做的事，人都能够做"的思想，或正是希勒和费希特所鼓吹的"按照人的意见改造现实，乃是人的事业，是人的真正的现世任务；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坚定的目标，就没有做不到的事。"人们亲眼看到强有力的"科西嘉人"(即拿破仑)凭借他个人的意志和愿望竟然攫取欧洲和改变欧洲，就更有理由相信人的意志万能了。既然毫无思想作指导的一意孤行尚能做到的事，而在理智和坚定思想指导下的意志就不能做到吗？通过伦理的、政治的和教育的论证，人们相信，在现实世界，实现一种新的高度文明的理想，并从而使人类历史跨入一个新的伟大时期，乃是我们自己的职责，而且除依靠我们自己意志的坚定之外，是绝无他途的。

I、大学教育

柏林大学的创建 1810年柏林大学由于洪保的努力而建立，随而揭开了大学教育史的新页。这所学府是在德国政治处于最危难的时刻建立的，但就当时全国经济的贫困来讲，该校在设备上可以说是不吝资财的；因为从开创起，国家就准备把它发展成为德国科学与学术的中心，成为从废墟上重建国家的力量与信心的

不朽的纪念碑，成为建立这一崇高事业的精神的纪念碑。普鲁士国王曾明确指出，建立柏林大学的主旨就是要用脑力来补偿普鲁士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失败。柏林大学从最初就是当代最杰出的学者的聚集之地，施莱尔玛赫和费希特都是它的精神的缔造者。该校的特点主要是由它致力古典文化和思辩哲学所决定的。

创造性的研究 柏林大学是新型大学的最早的代表。它的根本思想是：大学最主要的原则是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十八世纪的大学已经显露出这种趋势，哈勒和格廷根大学就是带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不过，就其整个结构而言，他们仍然只是高等学校；因为教学仍然是教授的主要任务，两所大学都希望教授把科研作为次要的业务。学生方面也是如此，其主要任务是吸收教授在课堂上讲授的知识。但是，柏林大学从最初就把致力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的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更恰当地说，该校认为在科研方面有卓著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在这种理解下，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乃是取得新颖的知识，于是大学不再以博览群经和熟读百家为能事，却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见性的科学研究。对于学术研究的看法，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却取得一致的见解，这种共同的见解便成了德国大学教育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同时也成了决定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新方法。具体说，中小学甚至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科目，可由政府规定；但科学研究却不能由政府下令规定，只能任其自由发展。科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以及方法和途径，必须留给科研工作者去自主地解决。在这方面，政府的作用只是提供工作所需的设备和条件，并建立使老科学家的工作便于同初学者互相结合的制度。洪保在1810年的备忘录上所持的观点就是："国家不应把大学看成是高等古典语文学校或高等专科学校。总地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

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署所能意料的。"

有一桩值得注意的巧合。在洪保建立柏林大学的前两年，拿破仑于 1808 年曾整顿法国的大学教育；不过，他采取的方针政策恰好同洪保相反。他把大学的学院分别改组为专门培训准备担任医务人员、行政人员、司法人员的专科学校，各校分别推行专业教育，并由政府给各专科学校制定严格的规章。各专科学校的课程与考试制度也由政府规定。各校教授只是讲课的教师和主持考试的监考人员，而不是学者；所有个人的首创精神都被压缩到最小限度。当这位耶拿战场上的胜利者（拿破仑）把法国的高等学府都置于政府官吏控制之下时，那个被征服的国家（普鲁士）却鼓起勇气，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政策，把培养未来的政府官吏的教育委托给大学，并给大学以探索学术知识的自由——这里也体现了另一种不可磨灭的特点，就是政府坚信自己的民族和坚信真理与自由。可是，经过五、六十年之后，法国也开始按照德国的教育路线来改造法国的教育了。这就充分证明：听任教育自由发展比妄施控制与约束是更为优越的。

柏林大学是十九世纪德国大学新理想的最显著的代表，也是把大学作为专心致志于真正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机构的典型。当时有许多大学是仿照柏林大学进行整顿或新建的。布勒斯劳大学（Breslau，建立于 1811 年）、波恩大学（建立于 1818 年）、慕尼黑大学（建立于 1826 年）都是新建的；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旧式的和古老的教育机构消失了，因为它仍多数存在于小邦，都随小邦消灭而消失了。还有，大学都在教学上逐渐把中学教学的气

味排除了，变成符合严格学术的要求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中等学校也在发展，尤其是中学的修业年限延长了，学习范围扩充了，毕业考试制度建立了，并且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也随中学年限加长而提高了。以前的大学，特别是大学的哲学院，一般都以课堂教授为主，现在开始注重比较专门的研究。同时，大学研究班(Seminar)也诞生了，不久还普及到学术领域的各个部门；这种研究班就是一些高年级学生，在教授指导下，从事创建性研究的小组。一般博士论文常是用这种研究班产生的带有独创性的研究，作为初基的。

哲学院 大学哲学院是最先按照新教育路线重新改编的。在此以前，哲学院被看作"低级"学院，它的使命是以补充和充实中等学校所讲的各种课程，来为准备升"高级"学院，特别是神学院和法学院的学生，奠定普通知识的基础。到现在，哲学院已是和其他学院平等的专业学院，它的目标是为新建的文科中学师资提供学术教育。因为这种教育不是医学院、法学院和神学院那样严格的"实际"专业教育；也因为教师的任务不是应用而是传播科学和学术，而其所传播的科学与学术的水平又不是高深的；哲学院遂得以与其他学院并列起来。而且德国大学中专业性质的讲学和研究班等新事物，都是首先在哲学院推行的。稍后，以费·吴尔夫为首的语言学者所带头提出的观点是：教授们的目标不是培养教师而是培养学者。在他们看来，教学根本不是可以教会的艺术，而任何精通科学的人就理所当然地能够教别人的。于是，数学、物理学、历史、现代语文等其他学科也跟着采取这种观点，推行以培养能够通过独立研究而提高科学知识水平的学者为目标的教育，不再推行以培养各科教师为目标的教育了。所有这些学科中的研究班以及其他培养研究能力的研究组识，均被认为在学术的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种种，哲学院便逐步提高起来。

哲学院与其他学院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哲学院在德国的

大学中终于取得了领先地位；不仅在科学知识本身方面，而且在大学教学方法方面也居于领先地位。语言科学和历史科学为神学和法学提供理论基础，或更恰当地说，为宗教学科和法律科学提供理论基础，因为这些科学的各部分都离不开语言学和史学的研究。同时，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又是一切医学知识的基础，因为医学随处都要利用这些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的确，从十九世纪神学和法学的发展看，神学和法学可以作为语言学和史学研究的分支，仅仅因为它们涉及到的科学不同，并且为着实用的关系，神学和法学才分别成为专门的学院。到现在，这两学科以前所有的教条性质的内容，逐渐地被史学研究方法所取代。神学已不再讲那套关于上帝和世界、三位一体和耶稣化身等绝对真理和论证，而成了基督教的历史科学。法学不再讲那套有关自然法或现行法的法律格言，而成了法律发展的历史科学，讲述从法律的起源到现行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当然这一发展过程在整个历史的长河中又只是一个短暂的片段。因此，这些学院在教学方法上都是效法哲学院所树立的典范，其结果使各类学术讲授和研究班在各学院中都得到稳步发展。这些学科因受到实用目标的影响，其向专门科学方向发展的进度，事实上并未达到相同的水平。就我们今天从各方面听到的要求看，两学科实际的发展趋势是：神学院应成为研究一般宗教科学的学院，对基督教各派以及对其他宗教，都要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医学院在研究与教学方法上是同自然科学紧密结合的，而且它在以前确已成为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开路先锋，早已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了。

十九世纪的三个主要发展时期 以上介绍了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德国大学的一般典型。至于其各阶段的发展详情，兹不赘述。大体而言，大学的发展是稳定而渐进的；但就十九世纪三个时期来讲，也各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1800—1840 年 十九世纪第一期，是大学持续迅速前进时期，它未受不利的政治环境所阻挠。不管政治环境使个人遭受的灾难有多大，而时常发生的政治压迫和残害事件却给予了德国大学及其师生一种内在的尊严和力量，同时也使他们享受到以前或以后都没有过的群众爱戴。在这四十年中，大批有声望的人领导科学研究向新的目标迈进，并给文化生活增添了新的动力，这种动力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促进的作用。

1840—1870 年 第二期的特点是大学和其它方面的社会生活一样，呈现出停滞不前的状态。它们的前进步伐缓慢下来，学生的数目也降低下来；恶劣的环境使它们感到一筹莫展。就大学的精神生活而言，思辩哲学和新人文主义哲学已失去它们原有的地位。根据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用纯粹推理就能洞察生存奥秘的信念，到这时已成彻底破灭的幻想；对于古代希腊文化的热爱情趣也被眼前迫切问题的利害关系所驱散。严肃认真的科学的治学精神，到十九世纪中期则成了德国大学的陈词滥调。不过，在另一方面，以数学和实验方法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很快赢得人们的赞誉；甚至在普通教育领域里，人们也开始把解决和探索一切真理问题的希望，寄托在自然科学，而不期之于思辩哲学了。在人文科学中，这种类似的精神也得到优势地位。史学家尤其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研究工作，调查原始资料，筛选档案记录，搜集墓志碑铭，编注各种文献材料；就是说，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分析批判的精神，被看成为学者的首要条件。那死抱着旧习陈规而不肯向实证主义屈服的神学和法学，到此刻也跟着走上了这条道路。

1870—1900 年 第三期是德意志民族突飞猛进时期。当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恢复统一之后，社会各个部门无不焕发出欣欣向荣和蒸蒸日上的新气象。大学的经济状况比以往更为富裕，学生人数大量增加也是大学兴旺发达的另一表现。大学在自

然科学和医学方面，由于有了充足设备和现代科学组织，效益不断增长。在各地区的大型的居于中心地位的大学里，学院的规模非常庞大，甚至一个学院就占有大学城的全部。在这方面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组织，尤其是从事化学研究的组织，都同工艺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凭着这种关系，科学确确实实已经变成了“金矿。”在大学教师队伍中，随着科学的分类越来越细，各科研究的范围就越来越小，新的讲座也就不断增加。专门化是我们今日科学工作发展的普遍形式；这种情形在当时各学院都很明显，哲学院就更为突出了。在教学上不论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进一步划分专业的情形很是显著。

现在从莱克赛斯（W. Lexis）于1904年所著《德国的大学》(Die Universitaten im Deutschen Reich)一书中，摘录几项统计资料作为参考。

（1）普鲁士大学收入统计表(单位为“先令”)

学校 \ 金额 \ 年份	1865年	1903年
柏林大学	590,361	3,406,918
波恩大学	485,181	1,441,990
布勒斯劳大学	365,937	1,615,575
格廷根大学	819,164	1,407,154
葛雷夫斯渥尔德	257,400	1,040,927
基尔大学	304,266	1,220,683
哈勒大学	399,854	1,861,860
康尼斯堡大学	296,991	1,239,725
马堡大学	239,451	1,017,545
蒙斯特大学	58,395	536,594
总　计	3,807,000	14,788,968

(2) 德国大学学生人数统计表

年份＼人数＼院别	神学	法律	医学	哲学	总计
1830年	6,076	4,502	2,355	2,937	15,870
1850年	3,006	4,386	1,932	3,102	12,426
1904年	3,777	11,747	6,948	15,205	37,677

(3) 德国大学教授人数统计表

年份＼人数＼院别	神学	法律	医学	哲学
1810年	151	140	201	394
1860年	137	127	194	465
1900年	215(+9)	188(+12)	443(+19)	894(+52)

大学教育发展的成就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发展成为庞大的组织，直到十八世纪还存在的那些仅有二十几位教师和几百镑微不足道的基金的旧式大学，几乎无法与之相比。教授人数，特别是哲学院和医学院的教授人数，已经增加十倍以上。在教授之外，还有大量的教学助理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各种职员和服务员从事大学的管理工作。这时仍照十八世纪那样，对学术研究工作都由上级命令布署，是再也行不通了。总地讲，这时的学术自由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作为学者组合的中世纪大学更不能与今日的大学相提并论了，那时的新思想是不但受教会的压制，还受其他组织的

妒嫉的。十九世纪科学思想在发展途中所遇到的唯一干扰，特别在神学院中，就是按照个人观点遴选教师承担大学的讲座。大学当局在遴选开办讲座人员时，往往迫于外来的影响，以来自宫廷、宗教会议和国会的影响为主。在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教授的人选上，偶尔也有类似情况。教育行政当局和各学院一样，总希望设法躲避这类影响。无奈，大学的兴旺发达是否会增进大学主持人的独立行使职权，则是另一问题。我不准备对于这个问题无保留地予以肯定。因为金钱、名誉和地位的作用，在今天比在十九世纪初期更为显著。追求名利和地位的欲望越大，则接受者的人格独立和授予者的个人尊严所受到的贬损，也必然越加严重。

这种教育路线的缺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术教育按照这条途径发展下去，将使一部分学生，至少使那些不准备终身从事高深科学研究的学生，遇到一定的困难。从事教师、医师、律师和牧师等专业工作的人们，需要事先接受那种同专业有关的学科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随着学校设置的学科不断增加，教学、特别是研究班的教学逐步专深，实施这种博学教育，对学生来讲，困难也就越来越大。这就产生一种危险，就是学生或则由于学科太多，精力不够，而感到昏昏终日；或则由于集中力量探索个别问题，而对全部课程的普通概念却毫无所知。在十八世纪，要满足学术教育在博学方面的要求，无疑是容易得多，因为那时一位物理学家可以任教自然科学的全部学科，一位史学家可以任教史学方面的全部课程。神学教授和法学教授也同样可以讲授各自学院的全部课程。此外，所有这些学科大都由教授按教条式的系统讲解。其难度并不太大。现在则不同了，学术教育的目标是引导学生接触那永无止境的科学探索的整个过程，并教导他们在前人研究的广阔无边的海洋中继续航行。后者的要求就远远超出前者了。

这种教育对于个人来讲，就表现为各地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厌

学和失望的情绪。学生由于相信科学可以使人获得真实知识，甚至可以使人达到最高目标，即获得以科学为基础的共同一致的世界观，遂埋头钻研科学。但到后来，他们体会到一切科学研究只能提供些片片断断的知识，就是这些支离破碎的知识也常是大可怀疑的。不论在历史科学中或在自然科学中，确实没有可以保证绝对无疑问和绝对无其他解释的知识。就是说，所有各科的知识，从最基本的原理到最微末的实际应用，都是在永无止境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如何弥补这个缺口乃是一个难题。

实用性的科技教育机构 十九世纪还有一种新型学校同旧式大学一并发展起来，这种学校的性质是实施有关实用性和工艺技术性的科学教育。在当时一切经济生活部门中，特别是工业和运输以及农业和商业等部门中，科技工艺惊人地进步，遂使参加这些部门工作的人必须事先具备充实的工艺科学知识；要满足这种要求，除设立相当于大学水平的科技学校之外，别无他途。这类学校中最早出现的是工业高等学校。它们是从比较低级的工业技术学校发展起来的，到十九世纪的下半期，已逐渐获得与大学相等的地位。它们最初是在实际教学上与大学相同，后来在组织和编制上也取得与大学同等的地位。现在这种学校计有十一所，都设在大都市，多数是设在各邦的首府，各校学生共计近两万人。在工业高等学校之后，又有采矿学院、林业学院、农业和兽医学院相继出现；所有这些学校都是按照大学的编制建立的。这样，农业、工业和商业三种主要经济事业也和神学、法学和医学等昔日的“学术”专业一样，侧身于高等教育的行列了。此外还有一种军事专业，它是比和平艺术更早出现的战争艺术，也有其极为复杂的技术性，所以军事学院、炮兵学校和军工学校也在这时诞生了。

II、中等学校

A. 古典学校

新理想 中等学校的改革是自帝国崩溃直到为谋求国家独立而进行的一系列的战争为止这短暂期间内的另一成就。这项成就说明了在按照理想塑造人类的问题上，要坚信人以及人的使命，坚信人的天性以及人的力量。改革中等学校的主导思想是发扬真正的自我教育，就是废除陈旧的缺乏生气的教学方法，而鼓励学生主动地和自愿地学习最值得学习的知识。一般讲来，生动活泼的古典文化教育，可以激励富有接受能力的有志于学的青年去钻研人类优美的文化。与此同时，要真正达到智育和德育的最高目的，他们不应该对现代世界文化的伟大成就全然无知。因此，他们在学校期间，首要的是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也就是接受人类智慧的最新的伟大成就。这样，全面教育就得到了实现，同时受教育者的智能在各方面也都得到了发展和锻炼，其结果乃使所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不仅具备了从事各种学术研究的良好基础，而且具备了从事各项专业的必要教育。

(1) 1800—1840 年

全面教育 十九世纪的现代文科中学的发展，也可以和大学同样地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奠基和组织时期，是欣欣向荣时期。这时期的领导人是洪保、苏佛恩，后来又有舒尔慈(Johannes Schulze)。同时，弗·渥尔夫、施莱尔玛赫和后来的黑格尔，也都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这时期的主导思想是“全面教育”，其采取以下三种重要措施乃是这个时期开始的标志。

教师考试制度 首先，普鲁士于1810年7月12日颁布考选教师的饬令，对于学校师资教育作出了新的规定。这种考选制度将普鲁士中等学校教师提高到专业工作者的地位。在此以前，古典文科中学的教师向来是由牧师充任，牧师把充任教师看作是提升为“有薪俸的牧师”职位的阶梯，有薪俸的牧师是享有较高待遇和较高荣誉的职位。培训牧师的教育当然以神学为主，而以人文

学科和哲学为基础。他们通常由学校的资助人任命为教师，就是说，多半是由市政议会委任；在接受委任时，他们一般须通过教会总监的考试；不过，凡持有学位证书或大学研究班主任教授的鉴定书者，可作同等学历看待。1810年新颁布的考选办法则由“教育代表团”负责执行。代表团的代表由柏林大学、布勒斯劳大学和孔尼兹堡大学三校各派一人充当。代表团成员可以从各方面协助教育当局，但其主要任务是考选中等学校的各科教师。从此以后，未经考试合格人员不得录用为教师，学校的捐资人再不能把未取得合格证书的人提名和任命为教师。教师考试科目包括文科中学讲授的语文、科学、数学和历史等全部学科；但考生对某一学科具有专长时，在考试中也不会被埋没，他们也有显示的机会。这种新制度的目的是保证中等学校的教师具有真才实学。因为人们感到当时教师所受的普通教育是不够充任教师的，教师必须对其所授的学科确有专长。因此种种，教师渐渐意识到他们已成为社会上独立的阶层，逐渐产生了强有力的团结精神，并因作为学术专业的成员而有了光荣感。

新课程　第二项措施是大约与此同时，苏佛恩在一些专家的帮助下，给文科中学制定了新的课程表。虽则由于谋求国家强大而进行的战争的影响，这份新课程表始终未得正式颁布；但也显示教育当局企图发展中等学校的总方向。另外还应注意，那时的教育当局也害怕对于趋向自由发展的教育干预太多。新的课程编制的最显著特点是使拉丁文、希腊文、德文和数学等四门主课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这四门主课中，除希腊文从三年级开始学习外，其余都是连续学习十年。在修业十年之中，每学年每学科在每周上课一小时，称为一个周时，十年的周时数累计为：拉丁文76小时，希腊文50小时，德文44小时，数学60小时；此外，还有历史和地理30小时，宗教教育20小时和自然科学20小时。现代文科中学

最初的情况就是如此。旧的文法学校实际只有一门主要课程，就是拉丁文写作，另外再加一点希腊文。新的中等学校的目标是推行全面教育，以古典文学研究和德文教学培养学生在语文和文学方面的能力，以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和宗教教育提高学生的"实科方面"的知识。实际上，教学的重点仍然是放在古典文的学习上。原因很简单，多数教师都是娴熟古典语文的；他们把数学和自然科学看成次要学科；的确，他们中间厌恶后两种学科而把这些学科视为额外负担的，颇不乏人。古典文学研究是根据人文主义精神进行的。以前学习古典文的目的是书写流畅的文章；到现在，这样的目的即使没被完全摈弃，至少已不再是主要的了；现在学习的目的是通过学习古代伟大作家，主要是学习希腊的古典文学，来领略古代文化的精神。人们认为这样学习会自然地在美学和文学方面产生丰硕的果实，并对知识分子的品格产生教育作用。在教学方法上的变化，就是大力号召学生把教室作业带回家去自行完成，并独立地进行小规模的研究工作；这种小规模的具有首创性的学术探索常常成为优秀学生引为自豪的事。

毕业考试制度 第三项措施是改革毕业考试制度。在新课程全部实施之前，普邦于1812年将1788年公布的中学毕业考试办法加以补充和修订，作为新的考试办法付诸实行。新办法的首要要求是精通古典语文。希腊文考试要考生"当场翻译"，甚至当场翻译舞台上的对话，以考核他们阅读希腊文的流畅程度；考生还须将德文笔译成希腊文，以测验他们对希腊文法的熟练程度。拉丁文考试则通过撰写拉丁文论文和口试，来测验他们用拉丁文写作和用拉丁语会话的能力。此外，还要求考生写一篇德文论文和解答一些数学问题；所有各科都需要进行口试。

由于新颁的毕业考试办法的贯彻落实，一些可以作为大学预备学校的正规中学便从当时存在的大量的文法学校中区分出来。

那些经政府审定作为主持毕业考试的学校，就与众不同地被称为文科中学（Gymnasium）。过去惯行的那种大学自行举办入学考试的办法，一时尚未完全废止，直到1834年这个漏洞才被堵住；从此以后，除通过毕业考试这条渠道外，青年再无其它进入大学的通路了。

舒尔慈 舒尔慈从1818年供职教育部，直到1840年，历时二十余载都在担任中等教育处的领导工作。他的伟大功绩是制定许多有深远意义的教育法规，使文科中学的课程编制得到完善和巩固。他仔细地规定了各科教学的方法和目标；并为保证这些规定的贯彻和落实，他一方面责成地方教育局对中等学校进行定期视察，同时又严格执行有关毕业考试的各项规定。全面教育的理想自然也得到这位黑格尔门徒始终不渝的拥护。他认为所有各门学科都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忽视都将有损于整体的平衡和效能。

文科中学乃是大学的预备学校 普鲁士经过这些改革，文科中学乃成为正规的和唯一类型的中等学校，即成为准备升入大学各科的"统一学校"。换言之，以前哲学院所承担的普通教育工作，现在都由文科中学取代了。在以前，学生入大学须具备的全部学识是拉丁文，或许还要求些初级希腊文，再加上一些历史和数学知识；到大学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能力进行研究。但经文科中学毕业考试而入大学的学生，则不仅精通两种古典语文，并在广泛阅读中获得了历史和人文学科的学识，而且奠定了数学、自然科学和两种现代语文的良好基础。这样，大学生在入学的时候已经具备了古典语文与现代科学的两种基础知识，他们无论专攻哪一门学术就都有了足够的条件，因为语文是通晓史学的钥匙，而数学是研究自然科学的基础。

这种学校教育的缺点 学生取得这些收获是必须付出代价

的。首先，所有各学科必须一律学习的新制度必然要消耗学生较多的时间。十九世纪的中等学校的修业年限已经延长得相当多。大学生的入学年龄，在十八世纪一般是十七或十八岁，而现在则上升到二十岁。另外，大学所需的学习年限也延长了；这样，就业的时期也被推迟了。一般人要到二十四、五岁，不少人甚至到了三十岁，才开始就业。从多方面考虑，这就极不理想。甚至延长在校年限本身就造成很多困难，因为学生到高年级时已达成熟年龄，对于学校严格的纪律和严格的教学都已难于接受。大学新生年纪太大的缺点，其严重性不亚于过早地入大学。很清楚，德国当时所需要的是英美式的学院，因为英美两国的学院是使学生从纪律严格的中等学校进到享有充分生活自由的德国大学的很有价值的过渡形式。

负担过重　这种新学校的另一不理想的后果是学生“负担过重。”正是因此才引起人们怨声载道，而在整个十九世纪中，教育当局也为此增添无穷的烦恼。第一个公开反对普鲁士“各科一律学习”的教育制度的是帖尔施(Fr. Thiersch)。他是哈曼(G. Hermann)的学生。他曾以独尊人文主义的方针，改革巴伐利亚的高等教育。他对普鲁士推行的“各科一律学习”的教育制度提出批评，认为这种教育会拖得学生筋疲力尽。在三十年代，劳伦塞(Dr. Lorinser)又从生理卫生的观点对这种制度发出第一声责难。教育当局在1837年公布的《教育细则》，对劳伦塞作出成功的答辩，却遗留下了烦恼的问题。等到下一历史阶段，他们不得不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付出艰苦的代价。学生劳累过度或负担过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教师和学生的无数次的诉苦，更是有力的证明。原因很明显，大量的主要学科和每天的家庭作业把学生的业余时间都给控制起来，而这种学校生活还要一直持续到最后，持续到严格的毕业考试。这一切的一切统统压在学生脆弱的肩头上，成了难以

承受的负担；因而一些比较活跃和乐于独立思考的青年便对于这种几乎没有自觉自愿活动的教育，极为厌恶。

(2) 1840—1870 年

在魏赛(L. Wiese)的倡导下企图回到梅兰希顿的理想 以腓特烈·威廉四世继位为始的这一时期，其中等教育政策有两种明显的趋势。第一是强调教条主义的宗教基础知识教育，指斥人文主义为非宗教的和反基督教教义的。第二是极力引导学生集中精力学习一种主要学科，以期停止经常遭受的中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责难。这种反抗启蒙运动和现实主义的势力，导致人们妄图把现代文科中学恢复成为十六世纪的文法学校。在以前，为着反对前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和博学主义倾向，曾出现以梅兰希顿为代表的人文学科与基督教福音相结合的主张，以及反对克·吴尔夫和洪保的新异教主义的主张。到这时，这些主张又被视为新的中等教育的理想。这种趋势可从 1856 年魏赛制定的教学细则看出；但是，它们的影响面并不广，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现实世界是没有怀旧之情的。当时唯一受到严重削减的课程是自然科学，因为从政治角度看，在现代课程中自然科学是最值得怀疑的；不过，自然科学对于当前的需要而言，则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很清楚，复活旧时人们热衷于拉丁诗文的设想，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强迫人们接受教条主义的宗教教育，就更没有市场了。

实科中学的起源 正当人们希图使人文主义的文科中学恢复成为纯粹古典学校时，一种面向现实的中学或半古典学校却同文科中学肩并肩地发展起来了；1859年公布的教学细则不啻是官方发给这种“实科中学”(Realgymnasium)的书生证书。德国一贯奉行的单轨制学校从此变成双轨制。关于这项重大变化在下面将另作说明。

(3) 1870—1900 年

彭尼兹(Hermann Bonitz)再次实行舒尔慈的教育理想 第三期是俾斯麦当政时期。这时中等学校的特点是以渐进步伐推行适应现代需要的教育。1875年接替魏赛出任教育大臣的彭尼兹是普鲁士教育家。他在奥地利按照现代路线改造文科中学时，就曾经担任了重要职务。奥邦旧有的文法学校已经按照 1849 年公布的教学细则改造成为现代的中等学校，使数学和自然科学在学校教学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彭尼兹受命为普邦教育大臣标志着普邦前一时期教育路线的终止。具体说，就是前一时期将文科中学恢复成为昔日的僧侣教育、并将教学全力投入人文学科的教育政策，已告结束。从此在普邦的中学里，自然科学恢复了以前的地位，拉丁文则被大幅度削减，尽管学生们希望达到的最终目标在实质上依然如故。

1890年威廉二世主持的国会 舒尔慈为推行“全面教育”的理想曾于 1837 年制定的教学细则，在这时期虽在 1882 年又予翻版；但终于是短命的。事实上，它未能使任何方面感到满意。对于提倡实科教育者来讲，教学细则虽然提出“实科中学”这个新颖名称，但没给它新的实惠；对于提倡古典教育者来讲，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授课时数又被削减了。威廉二世在坚决改革文科中学时，是怀有伟大抱负的。在 1890 年 12 月的国会上，这位年轻的帝王亲临主持，并在致开会词时宣布他的决心。他的主旨是对于传统的教学方法(他在卡赛尔(Cassel)文科中学时曾经切身了解的方法)，表示强烈不满。他说，这种教学法既不是民族固有的教学法，也不符合当前时代的要求。它被古典文化给束缚住，却没发挥促进真正人文主义文化的作用。它只不过是一种语言文字和文法的训练而已。它所致力的目标和它所希冀的成绩，无非是使学生在毕业考试时能撰写一篇拉丁文的论文。

这位帝王的发言，无疑是代表着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共同意

见。从1864到1871年间的一些伟大历史事件，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青年一代的思想上，并不是没有留下痕迹的。如今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和意义都受到了尊重，而这方面受到的重视是以古典文化学习受到轻视为代价的。当时人们感到极不正常的，就是中等学校把波斯战争和迦太基战争的历史给学生讲得很详细；但在课堂里却不讲他们本国当前所进行的伟大战争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讲普鲁士或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当然，学生们对此也有同感。那些曾经亲眼看到新人文主义突起并焕发出异彩的人们，是竭力推崇古典文化的；但在青年眼中，这些异彩已经消失了。的确，古典语文也是一样；它早已从被人们热狂追求的时期转入被人们作为一般知识来研究的时期。人们对于古典文学的兴趣也被新发展起来的艺术热和诗歌热所压倒，这主要也是由于艺术和诗歌符合青年们的爱好。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在感情方面，一般已不再欣赏那多愁善感的伤感主义。在俾斯麦时期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截然不同于在哥德时期决定德意志民族性的力量；在当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多愁善感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因而当时所崇尚的是英勇果敢。青年一代争先恐后追求的是充满运动和游戏、航海探险和征服殖民地、装甲车和摩托车、科学发明和技术创造的新世界。德皇在国会发言中所说的德国青年的思想感情，就是这些。他对国会的发言不仅是耳提面命，简直是当面斥责；而国会对此却怀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1892年的改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妥协 在国会与德皇的尖锐矛盾之下，这次教育改革的最后结果是，在国会的维持现状的主张同德皇的力争进取的主张之间，谋求妥协。如果听之任之的话，国会的决议当然要坚决拒绝半古典学校和非古典学校要求主持中学毕业考试的特权，并且更要坚决地反对那种削减古典文教学时数或推迟古典文教学开始时期的建议。事实发展的结果是于1892年

公布了新的教学细则。其中的规定是：拉丁文大量削减，在修业期间共修的周时数从77小时减到62小时；拉丁文论文在不久前尚被吹捧为镶嵌在古典学术宫殿顶巅的宝石，现在却被即刻取消了。另一方面，德文则受到特别重视。凡德文作文和德国文学的成绩达不到"良"的，就不能通过毕业考试和不能领取毕业证书。同时，德文课在某些方面的要求却比以前放低了标准，并且为了防止经常受到"负担过重"的责难，德文的每周授课时数也被减少，其节省的时间则改为提高学生身体健康的体育锻炼之用。

（4）1901年的改革

中等学校公认的三种类型——古典型、半古典型和非古典型

1892年制订的教学细则，公布时曾大张旗鼓，贯彻时曾雷厉风行；不料，第一代学生尚未毕业就告废止了。随后，一种新的改革于1901年又行开始，大胆创新和破除旧规之局重新出现了。这时，文科中学垄断中等教育的体制被废止了，古典的、半古典的和非古典的中等学校乃被置于平等地位。当时达到这样的平衡状态，是符合人们愿望的。这项新的教学细则可以引为自豪的是，至少在原则上不曾招致人们的反对，而1892年的妥协却引起各方面的敌视。半古典的和非古典的中等学校的代表们对于1892年的否认实科中学享有当时正规中学所享的权利的轻率措施，是不满的，不仅是不满，而是愤慨。古典学校的代表们对于古典学科遭受限制，感到难以容忍；他们的不能容忍，不是没有正当理由，因为没有平静而稳定的气氛给人以远大的胸襟，古典学术研究就得不到丰硕的成果。而且教育家们一致认为，新规定把注意力集中在德文教学上是行不通的，毕业考试以德文为主要科目更是不现实的。1892年的改革，正如我冒昧地对国会所作的预言，显然是把人们引进了死胡同，引入了以一种单一类型的学校来满足社会多种多样要求的老路。如果那时我们不单单考虑保持文科中学独占中等教育的制度，

而毫不犹豫地考虑以开辟第二条渠道的办法来保持古典学校的存在的问题，那就会好得多。所谓开辟第二条渠道，就是古典学校把不属于古典文化的学科全部推掉，使之另辟一条渠道，而成为古典学校与现代学校同时并存的局面。

目前进行的改革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因而有理由相信这次改革可以持续下去而不致夭折。这次改革开始也是在一次国会（1900年6月）上提出来的，在布署上同前一次的改革无大出入；但因有了1890年的前车之鉴，这次决议遂不能不允许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跟文科中学享有包括升大学在内的同样权利。古典教育的拥护者相信，为维护古典学校的存在所付的代价，只是放弃单一的文科中学的制度而已。事实很清楚，倘若保持单一类型学校的制度，这种学校就必须提供各阶级学生所需的一切教育，那样就不能使学生们倾其全力专攻古典学科，以致使古典学术无法得到出色的成果。

B. 半古典学校和非古典学校

当十八世纪时，人们已经认清社会还迫切需要一种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和传授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知识的高水平的学校，而且当时已经有了少量的这种学校出现。到十九世纪，这种学校在德国教育体系中更成为与文科中学并存的第二大分支。兹略述这种学校的发展过程。

(1) 1800—1840年

本期是这种学校的奠基时期；1832年普邦首次颁布实科学校毕业考试章程，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这种学校的迅速发展是由于两种重要因素的推动。第一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和斯坦因与哈登保（Prince Karl August Hardenberg 1750—1822）在大革命之后所制定的法律，使中产阶级获得了解放，再则，维也纳和平会议之后，城市经济得到了繁荣。第二是从普鲁士于1812年公布中

学毕业考试规章开始，严格意义的中学便同大量旧日的文法学校或城市学校正式划分开来。实际上，自从德国需要接受现代中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以来，曾由为数众多的旧有的文法学校来满足这种需要，虽则它们满足的程度是不足的。到此时，有些文法学校改为文科中学的预备班；另一些则成为六年制的中等学校，它们只包含一般中等学校的低年级和中年级，在课程方面取消古典文，至少取消希腊文，有的学校则增设了法文，有的学校则扩充了现代科学的教学，从而纷纷变成市民学校(Burgerschulen)。这种变化基本上是各校自行发展起来的，至于学校的编制问题则是市政当局随后才决定的。在莱茵河地区，这类学校是仿照法国的学院改造的。因为这些原因，这类学校的结构极不相同，也极不明确，有的相当于小学的高年级，有的成了手工艺学校，还有的成了不授古典文的中等学校。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它们才开始成为比较明确的现代普通教育。普鲁士邦于 1832 年公布的毕业考试办法正式明确了这种倾向。在考试科目中，办法规定有德文和法文(口试和笔试)，数学和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在没有拉丁文和英文的学校，加试拉丁文和英文。办法规定通过毕业考试者得享受的某些优待，但不能确保其实现，须要得到有关单位的同意始能生效。例如，办法规定考试及格的毕业生可只服兵役一年，可任邮政局、林业部和建筑专业的高级职务等，而且享受后一种优待者还必须在学校学习过拉丁文和在毕业考试中通过拉丁文考试。怎奈这种面向现实的学校并不是当局特别喜欢的或关心的对象，这种情形在南方和在北方都是一样。因此，法令给予的特权便难免落空。在那时，有关教育的问题还都是由富有古典语文修养的人来处理，而在他们的耳朵里，“实科学校”乃是最受厌恶的字眼。在巴伐利亚，帖尔施不喜新型学校，更是只竭力维护、而且竭力颂扬旧式文法学校为保卫一切教育的屏障。就此可见舆情之一斑了。

（2）1840—1870 年

就普鲁士的实科学校而言，第二期开始于1840年。如果说以前的政府对这类学校没有好感；新政府则是厌恶与敌视它了。尽管如此，事物的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时，这类学校曾被迫设置拉丁文课，以使“实科”学校的学生同沾拉丁文法教育的福音。当魏赛着手推行他那以文科中学为重点的管理办法时，他也感到另一种高级学校已成为他推行的那套教育的必不可少的补充，而不能漠视了。第一份经政府批准的《实科学校课程编制》于1859年公布，普鲁士的实科中学——至少在实际上——就在这时诞生了。甲级实科学校的修业年限延长为九年，并分为九个年级，拉丁文课依然设置未变；不过，仅限于高年级每周授课三小时了。《实科学校课程编制》从开始就明确提出，要在古典型的文科中学之外，另设新型学校来实施水平较高的文化教育。这种新学校毕业生的待遇，除不能升入大学之外，与文科中学相同；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学校则被看成是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各种科技研究所需的人才的正式预备学校。因此，这种以培训实际工作人才为目标的实科学校遂慢慢成为与古典型的文科中学修学年限相同的中等学校，其目标也同样是为准备学生升入大学进一步深造。事实上，与甲级实业学校同时并存的还有修业年限较短而课程伸缩性较大的乙级实科学校。在举办这种学校时，市民们都企图在待遇上能达到甲级实科学校的标准。

（3）1870—1900 年

大约自 1870 年开始属于第三期，其显著特点是为使这种新型中等学校毕业生获得升入大学的权利而进行了长期斗争，并于1901年以取得胜利而告终，即经政府批准而获得与古典型文科中学基本相同的地位。1870年，甲级实科学校的通过毕业考试的学生首次得以升入大学；不过，只限于升入哲学院，或甚至只限于升入

大学的一两个科,即数学与自然科学科和现代语科;而且以后对于通过上述各科师资考试的人还进一步限制，即只能担任甲级实科学校的教师，不能担任文科中学的教师。所以采取这样措施的原因,并不是对于这种新教育机构不公平,而是由于迫切需要。因为1866年以后实科学校逐年激增,为满足实科学校师资的急需,乃不得不采取权宜性措施;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局对于实科教育问题和学校师资问题,是不够重视的。当局认为实科教育不适于作“高级”学院和“高级”学术的预备教育，而只适于培育中等学校教师。这种认识是不好的,不过,若就这种教育的性质而言，他们也应当这样考虑,就是说,用这种实科教育来培育未来医科学生和未来医师要比培育未来教师，特别是比培育未来的现代语学生和未来现代语教师,更为合适得多。

一场激烈斗争终于开始了。甲级实科学校对于它们的含糊不清的地位未能满意,随而设法使它们的学生在升入大学的权利上,获得与文科中学学生同样不受限制的地位。实科学校联合会于1876年成立后,曾以极大努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斗争开展下去。它们遇到的阻力是大的,困难也是多的;但终于取得了胜利。文科中学的拥护者极力保持文科中学的特权和独尊的地位。与此同时,重古典语文者掌握的大学也无例外地采取了令人沮丧的态度，反对被降到高级技术学校的水平。在教育行政部门居高位的人，绝大多数仍然是那些维护传统教育标准的和维护正规教育价值的推崇古典语文的学者。最后，各学术专业同样反对非古典型和半古典型的中等学校毕业生作为它们的专业的候补人，认为那样会有损专业的声望和荣誉；反对声调最高的是与此最有关系的医学专业者。另一方面，技术科学的和机械工程的学者则支持实科学校所提的要求,他们对于自己的专业遭受轻视,感到不平；特别是在同法学专业相比之下，更觉得无有光彩。这场战斗在这样情况下

反反复复地经过几十年，平心静气地分析这项问题的实际必要性，在当时是没人肯听的。彭尼兹于 1882 年拟定的课程编制对此并无改进，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了。因为他提出另外设置九年制不授拉丁文的新型中学，这种设计是从工艺学校（已不存在）发展出来的，乃是对于六年制乙级实科学校加以扩充的产物。他把这种新学校称为“高级实科学校”。这次革新可能是受了奥地利的影响，因为奥地利曾于 1849 年把中等学校分成两个主要类型，一种是讲授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古典型文科中学和另一种不讲授这两种古典文的实科学校及高级实科学校。另外，德国原有的半古典型的实科中学，即介于纯古典型和纯非古典型之间的学校，到这时则被看成是一种多余的类型，因而德国在 1890 年 12 月召开国会时，多数人对它进行非难，并建议把它全部取消。由于矛盾难解，与会者为着悄悄地确保文科中学独尊的传统于不堕，乃把教授古典语文的高级实科中学所享的一切特殊待遇，其中包括限制其毕业生仅可入大学一、二学科的待遇，推广到这种不授古典语文的高级实科学校了。

（4）1901 年的改革

事态发展使这些规划落了空。受到市政当局赞助的实科中学不仅得以暂时维持现状，不久还通过 1901 年的改革而获得久已渴望的毕业生可以不受限制地升入大学的权利；与此同时，不授拉丁文的高级实科学校同样享受了这种权利。在亲自看到了1892年改革的结果之后，古典型文科中学的拥护者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仍坚持由文科中学包揽社会所需的各种教育，最后必然导致古典学术的全部毁灭。因此，1900年 11 月 26 日颁布的经德皇批准的法令，规定上述三种九年制的学校所提供的教育，在原则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这项决议之后，大学的几个学院乃分别作出一些特殊的规定。就普鲁士邦而言，最初规定凡九年制学校学生通过毕业考试

者皆可升入哲学院，后来也都可升入法学院了。医学院因涉及整个帝国的统一管理问题，而不是各邦单独所能决定的事，只扩大到准许实科中学毕业生享有入学权利，而不授拉丁文的高级实科学校的毕业生仍不能享受。神学院则墨守旧规，依然视古典型文科中学是其唯一适当的预备学校。实际上，以上这些限制不是不合理的。的确，不懂两种古典文而从事神学的科学研究，或不懂拉丁文而从事医学研究，都是无法想象的。对于法学、语言学及史学的研究，事实上也是如此。这种不讲授拉丁文的中等学校即使经政府认可适于作各种学术院系的预备学校，而德国各邦也未一律实行，例如巴伐利亚至今尚未实行；其所以如此者是由于人们相信任何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从开始就必然感到不能缺乏古典文的知识，并且相信未习古典文的学生必然要在入大学之后，急于把这项在中学未曾学习的必要的基础知识，设法补充学习，否则就没法迈步向前的。很明显，一个语言学者，不管他研究的是古代语还是现代语，若不懂拉丁文和希腊文，就休想前进。同样，法律系学生从开始就会感到拉丁文是必需的，因为不懂罗马法就无法对现代法律进行科学研究。此外，新颁行的政府考试办法也不许可学生对于必须具备的条件永远不去设法具备。另一方面，从事医学和神学研究的学生或许容易错误地认为，古典语文不仅在升入大学时并不需要，在进行研究时也不需要；实际上，这是他们应该特别警惕的。医学系尤应特别警惕，因为一般情况是学生入学后就须全力以赴地从事新的学习，以致不论语文知识如何必要，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学习和弥补了。在神学院，这种危险还不严重，因为学生入学后可能有较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精力。另外也有人担心将来想入神学院的人数会由于种种限制而严重减少。这当然是目前尚难考虑的问题。不仅如此，我还认为，神学在本质上是属于历史科学范畴的，假如神职工作者两耳不闻现代事，一心投入远古中，也不是好

办法。因为他们接受的时事教育越多，他们对现时社会的影响越大，越可避免脱离现时社会而陷于孤立无援和向壁虚构的危险。

C. 现在中等教育的体制及其最近的发展趋势

中等学校的三种类型 1901年公布的新规章制定了普鲁士各类中等学校的课程编制和考试制度。它的根本原则是使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校相互配合而成为大学的预备学校:(1)文科中学，设置两种古典语文的课程;(2)实科中学，保留拉丁文作为外语教学的一般基础,但注重发扬现代精神,并在高年级以现代语和现代科学为教学重点;(3)高级实科学校，以法文代替拉丁文作为外语基础课,废弃一切古典语文而以现代文化为主要学科。根据政府规定的课程编制,三种学校的共同之处是都须设置德文、历史和宗教科目,而且这些学科的内容与目标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这种新的中等教育体制有这样的倾向：三种类型学校都可以自由地倾其全力于其所专学科的教学工作，从而使各种教育的力量与效能得以充分发挥。这样,文科中学就不再对所有学科都必须予以同样重视了,可以自由地把重点放在古典学科上了。根据这种目标，它们增加了拉丁文的教学时数,即从原定的 62 周时增为 68 周时。高级实科学校自然把现代科学作为主课，以引导学生从事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独创性的研究而自豪。实科中学在这方面是不如上述两类学校那样优越的，为了防止按着自然趋势的发展会把主要精力分散到现代语以及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等学科上去，不仅加强了拉丁文的教学(拉丁文虽不象在旧日文法学校那样占据首要地位,但贯穿整个修业期间都有相当多的教学时数),而且特别提高了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要求。如果把各种类型学校混合在一起而设置综合中学,其困难就不可能避免了。

展望 1900年的这些改革,毫无疑问,是极为重要和坚定的步骤,是不可能、也无法从此倒退的。这一步骤意味着抛弃了从十九

世纪初期开始改革以来所坚持的那种主张，即由一种以古典语为主课而同时教授现代科学和现代语的中学，来满足众多学生的种类浩繁的需要，而使所有想升大学或想从事学术研究者都须进入这一种中学。照舒尔慈所设想的，在不推翻古典语文在学习中的统治地位、或至少不侵占古典语文所必要的时间的情况下，公正合理地将现代学科纳入课程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把文科中学倒退成旧日的文法学校的可能性，就更少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中等学校分成古典型和现代型的多轨制。

的确，这样处理最符合现代文化的需要。理由是有些研究部门和学术专业是根本离不开古典语文的，否则就会遇到很大困难；这指的是有关历史科学的各门学科。再则，还有一些研究和学术专业，即包括医学在内的一些自然科学和科技工艺，由于其他学科非常重要而必须深入学习，学生入校后就无暇学习古典语文，至少是没有充分时间去学习两种古典语文的。对于这些学生一概不授古典语文又怎成呢？

另外，这种多轨制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最终学制。的确，历史就不知道有最终的事。现代文化与科学同古典文化的距离以及现在文化摆脱古典文化支配的情形，将来仍会同过去一样地有增而无已。这种发展对于德国教育机构的影响，仍将依然如故。换言之，中等学校将继续摆脱它们原来的基础，就是摆脱以古代语文学习为基础的状况。因为学校不能与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脱节。原来代表一切高等教育实质的古典语文，到十九世纪已被降到与高等学校中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因为其他学科是同样必要的。照这样情形发展下去，拉丁文和希腊文将不会再是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基础学科，而只是某些学科所需要的工具。从原则上看，这种观点已经在最新的教育规章上体现出来了。

不过，以往拉丁文和希腊文所受到的重视，至今仍有极强烈的

影响，以致很难立即根据理论上的评价而作出实际的结论。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文科中学仍将被推崇为最过硬而最博雅的学府；但符合实际的结论迟早是要作出来的。今后希望接受现代型中等学校教育的人将要逐渐增加，因为在大学生中需要文科中学毕业的人数将不会增长或将相对减少，也就是说，大学中攻读神学、古典语言学、或许还有法学的学生人数，或将固定不变，或将相对减少；而需要受半古典型和非古典型的中等教育的人数，即在大学中攻读科学技术、工程学、自然科学和医学以及现代语和数学的学生人数，不论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方面，都将不断增加。其结果必然是由于这些而使文科中学的数量相应减少；而且，文科中学也会逐渐向半古典型和非古典型的学校转化。不管有多大的阻力，这都是阻止不了的，直到只剩下极少数的文科中学存在而后已。对于这种情形并没有惋惜的必要；因为在旧制度的高压之下，纯古典型学校由于独享特权，已出现大量文科中学过剩的现象；而且长期以来，这种特殊优惠阻碍了，甚至压制了包括高级市民学校在内的现代教育机构的发展。自从这种压制停止以来，这些高级市民学校的统计数字的显著上升恰好说明它们以往所受阻碍和压制的严重。

非古典型和半古典型的教育 我们应进一步注意非古典型学校数量的迅速增加。这是由于社会需要这些学校，特别是六年制的实科学校，即正规的高级市民学校，而这些学校却受到长期压制的结果；其中已有一部分的增加是由于没有拉丁文课的半古典型学校，即实科中学，转变为非古典型学校而形成的，但这不能作为半古典型学校也过剩了的证据。因为拉丁文成为非必要的学科要比希腊文迟的多。的确，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讲，还不能说不需要拉丁文的。尽管希腊文学可能比拉丁文学更为优美，但是直到十八世纪中期，我们对拉丁语文和拉丁文学的重视还是远胜过对希腊

文和希腊文学的重视的。原因是我们在历史上属于拉丁文化的范围。直到最近，就德国讲，在最多不超过一百五十年前，拉丁语还是教会、司法、科学和文学方面的通用语言。实际上，在我们的科学、文学和语言中，有数不清的拉丁传统，更不用说直接由拉丁语发展出的现代语文了。所以从今天大学生的角度讲，中等学校设置拉丁文课仍属必要。确实可以说，不教拉丁文的高级实科学校的毕业生取得升入大学的资格，并非由于它们的教学内容极适合于大学的需要，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两派对立主张所造成的偶合。后来各地高级实科学校都在高年级增设拉丁文为选修科目，也证明学校为准备学生升大学还是不能不教拉丁文的。

"革新学校" 可能有一天，高级实科学校和实科中学会融合为一。实科中学似乎是在沿着改革的道路发展，从实科中学效法阿登纳(Altona)首创的"革新学校"正逐渐增加拉丁文教学而言，就可证明其变化的趋势。高级实科学校的不同之处是直到四年级才开始教授拉丁文，第一外国语是从一年级就开始的法文。高级实科学校的拉丁文选修课如果提早一些开始讲授，这两种学校的区别就更小了。所以，不论表面是否合意，它们总要合并成一种学校的，而拉丁文将成为它们的选修科目。在这样的发展情形下，那些古典的文科中学同其他中等学校之间的差距将更加扩大。另一方面，因为高级实科学校和实科中学学生将更多地享有升大学的便利，这些学校也将更普遍地设置起来，这确是人所希望的事。另外，还有很多的人不待高级市民学校修业完毕，便挤到文科中学和实科中学的低年级和中年级去肄业，而对古典文，至少是拉丁文，仅学到一半就离开学校，这不仅对学生，而且对学校，都极为不利，从而造成学校的难题。

在阐述"革新学校"之后，还要谈谈文科中学的改革。这种改革，最初起于梅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随后才遍及许多学校。它们教

授拉丁文是从四年级开始，教授希腊文是从六年级开始，学生须把大量的课时用于这些古典文学科，一直到毕业为止。这种新型的课程安排引起双方面的反对。一方面，古典语教师担心这样压缩古典语文，将无法保证达到教学目标，最后将以无收获而告终。另一方面，有人担心在最后几学年内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古典语文上，将影响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学成绩。尽管有这些顾虑，这种新型文科中学还是要得到推广的。通过共同的基础教育而使文科中学和其他中等学校日趋接近，乃是一桩收获，这种收获乃是文科中学决不会放弃的。此外，拉丁文拖延到高年开始讲授，是有利无弊的。拉丁文基础教学，象现在这样，开始得未免过早，在儿童心智尚未充分发育的时期，便过长时间地劳累他们，一旦他们产生了厌恶学习的情绪，将来在讲授古典文时再去扭转，又谈何容易。所以古典语文教学比其他学科教学，更需要学生的人数少些，年龄大些。

高年级的教学 现在谈谈中等教育近年来显示出的一般性发展趋势。首先，教育当局最近的意图是以课程分化给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自由发展的领域。他们的意图是使各种类型中等学校在安排高年级课程上有较大的自由，以便于有特殊天才和特殊爱好的学生得到发挥所长的余地。在毕业考试中，人们早已看到所有学生并不能在各门学科的成绩上一律良好，常是某些学科成绩优异，而另一些学科成绩则不够理想。可是，人们却不曾注意这是教学本身造成的问题。如今有了听任高年级学生自由分化的趋势，就便于他们在学习上各发展其所长了。例如，在文科中学内一些对于古典语文有特殊天才和特殊爱好的学生，因为对数学缺乏兴趣或才能而跟不上数学班的，就可不再被迫地徒劳地去硬跟班，而可参加适合于他们的数学班。同时，对于那些对数学和自然科学有特殊天才的学生，则可提供发展其特长的学习机会，即设立数理优

普鲁士中等学校数量变化统计表

年代	文科中学	文科中学预科	实科中学	实科中学预科	高级实科学校	实科学校
1835	112	24	(12)	…	…	…
1855	124	28	(54)	…	…	…
1875	228	33	80	91	…	17
1885	259	38	89	86	14	36
1895	273	45	86	74	24	73
1905	324	39	100	27	50	158

1901 年各种类型中等学校各学科授课时数表

<table>
<tr><th></th><th>文科中学</th><th>实科中学</th><th>高级实科学校</th><th>革新中学</th><th>革新实科中学</th></tr>
<tr><td>宗教教育</td><td>19</td><td>19</td><td>19</td><td>19</td><td>19</td></tr>
<tr><td>德文</td><td>26</td><td>28</td><td>34</td><td>31</td><td>29</td></tr>
<tr><td>拉丁文</td><td>68</td><td>49</td><td>…</td><td>52</td><td>36</td></tr>
<tr><td>希腊文</td><td>36</td><td>…</td><td>…</td><td>31</td><td>…</td></tr>
<tr><td>法文</td><td>20</td><td>29</td><td>47</td><td>31</td><td>37</td></tr>
<tr><td>英文</td><td>…</td><td>18</td><td>25</td><td>…</td><td>22</td></tr>
<tr><td>历史</td><td>17</td><td>17</td><td>18</td><td rowspan="2">26</td><td rowspan="2">38</td></tr>
<tr><td>地理</td><td>9</td><td>11</td><td>14</td></tr>
<tr><td>算术和数学</td><td>34</td><td>42</td><td>47</td><td>35</td><td>44</td></tr>
<tr><td>自然科学</td><td>18</td><td>29</td><td>36</td><td>19</td><td>29</td></tr>
<tr><td>书法</td><td>4</td><td>4</td><td>6</td><td>4</td><td>4</td></tr>
<tr><td>绘图</td><td>8</td><td>16</td><td>16</td><td>8</td><td>16</td></tr>
</table>

秀生班，使他们在数理方面长足发展，而在拉丁文写作练习的要求上相应地降低。这样安排是三种类型中等学校都可办到的。当然，这不是给那没有学习能力的（不是说那些懒惰而无所用心的）学生大开方便之门，以便混过毕业考试，而是为了促使每人的天才都得到最大发展。在完成这样一系列课程任务的正常情况下，学生必然要努力使自己选修的学科获得出色的成绩；纵然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也必然有希望使各科成绩达到一般水平。这样安排是不能按一般规章规定办理的，只有因地制宜；而作到因地制宜就要取决于教师的敏锐眼光了。这种办法对于长期“负担过重”所造成学生对学习或学校的厌恶心理，也许确实是有效的或唯一的补救措施。实行这种办法，高年级的教学便多少类似大学的教学了；这样是有助于填补中学阶段严格管束学生学习和大学阶段学习自由之间的鸿沟的。这种收获也非同小可；因为学生从中学的严格管束下突然来到大学的绝对自由的环境，往往是很危险的，而且常会产生不幸的后果。

中等学校教师 上述的改进措施一定要慢慢地逐步发展，而它的贯彻落实则靠教师的学术修养，因为只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教师才能启发别人自觉地学习研究。从这观点看，教育当局进一步设法保护并加强中学教师的学术修养工作，才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为此，首先应为中学教师举办专业性的大学讲学机构，使他们赶上学术各方面的最新发展而不致落后。其次，为使教师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较为广泛的科学知识的探索，应该采用完全脱产或减轻部分教学工作的办法，或采用设置出国奖学金和出版资助等办法，来鼓励他们从事学术工作。这一切奖励教师从事学术研究的措施，能够维护德国中等学校一向所具有的探索学术的独特风气，是不可否认的，尽管这项措施似乎受到过那些从高级小学发展起来的非古典型中等学校的短时干扰。

哲学教育 有些地方的中等学校企图恢复哲学教育的努力，在此也应略加说明。自从中世纪起，直到启蒙运动期间，文学院或哲学院都把哲学作为预科的主要学科。但在这种一般性基础教育从大学转移到中学之后，哲学即被取消了。这是多种困难造成的。中学提出的取消哲学教育的理由是，学校的学科太多，学生已经负担过重，而且在许多学科中都有讲授哲学的机会，它们可以代替方

法论的教学，或至少可以作为方法论的入门。例如，文法课须涉及逻辑课，物理课须涉及自然哲学，历史和文学课须涉及心理学，拉丁文和希腊文须涉及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古代哲学家也都包括在学校的名著课之中。因此种种，人们遂主张把系统的哲学教学留到大学进行。但这张支票在兑现时，却不断地被打了折扣。当时文科中学的课程日益扩充，哲学院也和其他学院一样地变为从事专业研究的高级学院，其结果便使高级学院的大学本科生，至少是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大学本科生，都渐渐地刚进大学就立即从事专业学习。与此同时，哲学本身也曾暂时地成为不受重视的学科。到头来，遂使德国现在的大量大学生根本不曾接触过哲学，以致在有教养的阶级中，甚至在受过学术教育的人士中，竟有人可怜得连"存在"和"人生"这些基本问题都不清楚。模糊不清的怀疑主义、肤浅的唯物主义、没有哲学原则的折衷主义、不加批判地服膺一切披着哲学外衣的时髦论调，等等，就是学校取消哲学课和缺乏哲学教育所带来的后果。这种状况不能再听之任之，而且越来越成为人们深切重视的问题。解决这种状况的途径是在中等学校的高年级进行哲学教育，具体说，就是从学习逻辑课入手进而探索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从学习心理学入手进而探索形而上学的主要问题，还要在精读哲学著作的基础上探索有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担任这项教学任务的教师要具备必要的学术条件，不仅能使学生产生浓厚兴趣，而且能在那完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事物概念和那学校信奉的神学体系的鸿沟间，架起桥梁。哲学当然不能作为自然宗教来讲授；但所有哲学教学必然显示现实世界不能仅由宇宙论和进化论等简单大纲，就会完全地予以恰当说明的。一些哲学教育对于半古典型和非古典型中等学校，似乎比对于古典型文科中学更为必要；因为避免使用狭隘偏执的观点来分解现实世界(即把现实世界分解到最后都成了数理问题)，强调哲学教育或人文主义观点

或许是更为必要的。

D. 女子高等学校

历史概况 在中世纪，女修道院曾为妇女提供享受当时的普通教育的机会。宗教改革运动取消了这些天主教寺院，因而给教育制度留下一个缺口。以后，中等学校和大学成了培养学术专业人才的机构，妇女由于被学术专业所排除，也就普遍地被大学和高等学校排除了。从十六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初等教育，对男女两性同样开放，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但在事实上，女生一般仍比不上男生，不仅上学的人数少，而且学习的成绩也差。贯穿十七和十八两个世纪，情况基本未变。在宫廷文化时期，到处都曾出现为上层社会妇女筹划成立专门教育机构的现象，但这些教育机构没有一处能够长期存在。在绅士家庭中，女子常从家中为男子延聘的女教师或导师那里接受一些教育。在天主教地区，有一些教团，特别是阿苏拉(Ursulines)和萨尔(Salesiaus)教团，提供一些程度较高的女子教育。女子缺乏充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德国直到十八世纪还以男子为社会的主体。"沙龙"在巴黎的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德国则始终不能存在；直到十八世纪末，德国文学已届黄金时代，才开始有人试图把它引进来的。

十九世纪的女子教育 大约也是在这时开始的伟大的教育改革运动的影响下，妇女要求享受新的文化教育的呼声风起云涌，到十九世纪初期，德国才建立相当多的水平较高的女子学校，其中有些是市立的，有些是私立的。最早的女子师资培训学院也约于此时诞生，这些学院常附设女子高等学校。(译注：指中等教育水平的女子学校。)在课程编制上和班级数目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女子学校之间，差异很大。它们同小学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讲授外语，多数是讲授法语和英语。在这一点上，这些女子学校又同男子高级市民学校相似；不过，它们一般以注重美学和文学为

主的文化修养为教育目标，对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要求就远不如男子高级市民学校了。

最近三十年的女子教育　最近三十年来掀起的声势壮阔的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对于女子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这项新发展的结果来看，妇女已经获得参加学术专业工作的机会，他们的要求确实得到很大的满足。在以前，女子高等学校始终没有超出以家事和社会服务为目标的"普通教育"范围，现在则于普通教育之外，增添了科学训练和专业训练所必需的基础教育。1894年普鲁士首次公布的女子高等学校章程和女教师考试办法的指导原则，就是如此。一般来说，女子高等学校包括九个班级；但原有的修业十年的旧式学校仍允许继续存在。政府举办的高级女教师考试分文理两类，即语言和文学类，数学和自然科学类，听任与试者自行选定。这显示出一种发展趋势，即将来这些女教师在高年级任教的人数逐渐增加，将要与男教师肩并肩地担任教学工作了。这种趋势也显示妇女将有升大学的希望。尽管对妇女入大学仍然有人反对，而且这种反对势力在德国还是特别顽固；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叶，这一步终于迈出了。有些地区，如巴登和巴伐利亚，女子可被录取为正式大学生；在其他地区，女子则只能作"借读生"。普鲁士始终坚持后一种作法，其接受或拒收女生都由各大学讲座自行斟酌，政府举办的毕业考试就更难以允许女生参加了。对于女子准备升大学的确定的学习制度，这时尚没有制定。在教学程度不统一的情形下，有少数女子文科中学产生了，它们的教学程度相当于女子高级学校的中年级，学生入学年龄约为十三岁，课程编制与"革新实科中学"相似。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到这时已成刻不容缓的事。现在所计议的体制是，设置十年制的"女子学校"(Lyżeum)，其上再设立四年制的新的独立学校，"女子高等学校"(Ober Lyzeum)。不管这种女子高等学校在形式上是独立的，还是同十年制女子学校

相衔接的，它们在课程编制上并不象男子文科中学那样严格和划一，而是设置多种不同的学科，由学生自行选习。现在要求的是有一种正常的课程类型，象高级实科学校那样，把重点放在现代语文和现代科学上；其次的类型是设置拉丁文课；再次的类型是在拉丁文之外加授希腊文。这种学校很象朝着英美学院的方向去发展，即将中等学校的高年级成为独立的阶段，在其中设置一些自由选修的学科。这种新的"女子高等学校"的发展也为男子文科中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III、初等教育

早期的初等教育 德国的初等教育可明显地分为三个主要时期：(1) 1646年以前，初等教育隶属于教会，可称为初等教育的奠基时期；(2) 1648—1800年是政府掌握初等学校并实行强迫教育时期；(3) 十九世纪是初等学校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教育机构的时期。

启蒙运动和裴斯太洛齐 德国现代的初等学校发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十八世纪末叶兴起的教育改革运动，在初等教育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当时，决定初等学校发展目标和寻找达到目标的途径的，是裴斯太洛齐。裴斯太洛齐的教育目标——把每个人培育成为自由的人和在道德与文化上独立自主的人——正是康德在其伦理学中用极有说服力的文笔所阐述的理想。他们认为每个人，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有自由和独立自主的权利；凡是破坏人的尊严，压制人类，妄想使人作愚昧的附庸，或者甚至剥夺人们发展独立人格的机会的，都是罪恶。通向这种教育目标而使人成为自由人的途径，就是发展人的天赋才能。教育家的责任也就在于唤醒和激发这些处于潜伏状态的"才能"，并为他们寻求练习运用"才能"的适当机会。陈旧的教育方法企图以强迫手段，通过死记硬背和无休止的朗读，来把知识硬灌入不想读书的儿童的头脑，是

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教育成效的。人的观察、判断和推理等智能只有通过自发的锻炼，才能得到发展。人的道德也是要通过自发的锻炼才能养成的。所以也须要设法使人们的道德见解和道德愿望，通过有组织的和自发的发展，而成为真正的“道德修养”——即依凭个人的自由意志来掌握什么是良善、什么是正确。

法国大革命的后果和普鲁士的复兴 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陈旧的教育机构的普遍崩溃给裴斯太洛齐的教育思想的广泛实现，铺平了道路；这种教育思想当然是符合当时政治的需要、并得到教育改革家的热心提倡的。这次重大运动的进展，不管怎样落后于德国领导者在开始时所抱的奢望，它至少也算是唯一的巨大成就。在此我们且概述其发展情况。大革命使我们邻国法兰西的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因此，这个软弱而瘫痪的国家一跃而具有了对外扩张的动力，从而无情地摧毁了欧洲大陆的一些古老国家。普鲁士被颠覆的可怕情景最有力地警诫人们，只有充分地发展和毫不吝惜地贡献全国的一切力量，才足以重振国势，不，才足以使德意志全体人民免于彻底覆灭。在当时，这种信念已成为德意志民族振兴的关键。我们——相信所有愿为国家复兴而献出力量和生命的人们，意见是一致的——之所以遭受深重的灾难，是由于我们的人民处于绝对附庸的、绝无翻身希望的被压迫地位，因此，他们对政府和国家自然就冷漠而无情了。人们认为要使国家和民族复兴，就不能再把国家大事完全看成是朝廷的事，而必须看成是和人民自身同样地休戚相关。要达到这些，就须使人民摆脱在警察监视下和政治压迫下养成的无精打采的淡漠态度，摆脱地主吸吮下的悲惨生活，并使他们积极地参预国家大事；总之，必须使他们摆脱只作奴隶和只充为下奴的地位，而成为国家的自由公民。这里还包括人民必须摆脱政府、教会和学校给他们造成的没有文化知识和社会地位的状况，人民必须成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而自由

行动的独立自主的人。

裴斯太洛齐的影响 普鲁士的政治家和这位瑞士教育改革家，在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裴斯太洛齐主张的就是使广大群众脱离消极麻木的状态，并使他们有自由的人格，并且具有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独立人格。甚至在此以前，特别是由于普莱曼（Plamann）的关系，普鲁士政府早已重视裴斯太洛齐；到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了。斯坦因男爵在他的备忘录中，就常常提到裴斯太洛齐的教育方法。他说，裴斯太洛齐的方法能鼓励人们主动地开动脑筋、启发人们的宗教情感和高尚情操，从而扩大了人们的理想境界和减少了人们的声色之欲。尼可罗维亚斯和苏佛恩更同裴斯太洛齐有过长期亲密的接触。费希特在所著《告德意志国民书》中，曾把裴斯太洛齐和马丁·路德相提并论，作为民族救星。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普鲁士教育当局遂派遣大批青年到伊佛登向裴斯太洛齐学习。苏佛恩起草的政府指令中说，这些青年到伊佛登不仅要学习裴斯太洛齐教育方法的实施情况，而且要让"这位伟人胸中焕发的神圣的爱与力的火，点燃他们的心灵。这位伟人的实际成就是远不能同他的胸怀相比的；至于他的教育方法与之相比，更不啻是微弱火光或残余灰烬而已。"

费希特 上述的教育思想以及1809—1811年间柏林与伊佛登两地往来的全部函件，都强烈地反映要从根本上恢复人的本性，这乃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坚决而热情的信念。德意志人民在蒙受奇耻大辱时期所显示的那样坚强的自信，那样热切的寄情于未来，那样渴望贡献自己身心的一切力量来培育下一代，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强烈的愿望下，似乎没有不可能的事。费希特的《告国民书》所表达的就是这种精神。他把对德意志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上。德意志的一个邦带头建立这种新教育制度。它利用强迫人民服兵役的那种强制权，来推行国民教育，并且确实也没有

比为推行对于全体国民有利的国民教育而运用强制权，更为合理的了。这样，就可以使儿童免受社会上歪风邪气的腐蚀，并在公共教育机构里接受文化教育和实际操作的训练。费希特力称这样的教育是时代切实需要的；没有这样的教育，国家就无法保全。他说，如果我们认真地贯彻落实这个教育规划，“从现在起到二十五年后，我们所急需的更好的接班人就可以出现了。”他说，到那时社会上就不会再有穷苦无告的人，也不会再有流氓和犯罪分子了。国家也无须再支出大量经费去建立独立的军队了；因为所有人民都是为保卫祖国而生，为保卫祖国而学；国家有了这样人民武装力量，就将无敌于世界。在这样情况下，“所有各经济领域，不要很长时间，也不要很多麻烦，便可达到空前的繁荣昌盛，如果需要进行核算的话，国家所获的利益将超出它最初的投资的千倍。”

(1) 1800—1840 年

上述各节足以说明这个时期一般人的思想感情，即我们赖以进行初等教育改革的真正意气奋发的精神。这种新的思想感情的影响很快便遍及各地。为了尽快推行这种新教育方法，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等邦分别成立了非正式的学习班，最初是为牧师举办了学习班，然后又由牧师举办了教师学习班。在普鲁士西部，这些事业曾得到孔尼兹堡孤儿院长翟勒(Zeller)的赞助。

师资培训学院和苏佛恩　从 1815 年维也纳和约的签订直到 1840 年，是和平建设时期。在教育方面，最主要的是对教师的专门培训工作，实行严肃而积极的处理。一些有声望的人纷纷按照裴斯太洛齐的原则兴建和组织了很多所师资培训学院。当时在教育队伍中有在布勒斯劳和魏森费尔斯设立实验场所的哈尼施(W. Harnisch)，有在摩尔斯和柏林先后出色地充任这两所师资培训学院院长的第斯特惠(A. Diesterweg)。这些学校的物质条件很多是贫乏的；但人们凭着对于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念克服了这种困难。

这些领导者以自己的热忱和精诚感召他们的青年战友。师资培训学院和初等学校之不断地兴旺发达，就是由于人们把青年的培养和把全体国民的教育看作自己的神圣职责的信念，在日益增长和加强。苏佛恩于1817年在备忘录中的一段话，可以代表本时期开始时政府中流行的思想："国家不是以死的自然力量为基础的，而是依靠能够不断增长和发展的有生力量的。国家所要做的事就是培养这种有生力量，特别是当国家处于盛衰存亡的关键时刻。其它方面的力量则不必花费多大物力去培养，就将随着有生力量的增强而自行发展了。所以一个国家本身的重要性、威望和权势之所以能稳步提高，要取决于政治决策的明智，最明智的决策必然万无一失地产生实际效益，纵然不能立竿见影，也必是日益繁荣的。"

反动倾向：腓特烈·威廉三世 在最高统治阶层之中，不久便显露出一种反动倾向。腓特烈·威廉三世也许从来就不曾完全赞赏他的顾问们的推行国民教育的积极性，现在他又听信谗言，遂背离民族精神，不再相信人民，认为个人自发的爱国心无足轻重。他听任自己偏好的发展，遂陷入梅特涅（Clemens werzel Lother Metternich 1773—1859）① 政策的泥潭。奥地利也许是唯一的可以推行梅特涅政策的邦；但是要把它应用在普鲁士，就只能使普鲁士的威信扫地和它的民族复兴绝望。在这紧要关头，梅特涅的思想居然取代斯坦因的主张而成了指导普鲁士政治的灵魂。这一事件

---

① 梅特涅于1809年至1848年任奥地利外交大臣期间，曾使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占有统治的地位。他于1819年借德国戏剧家柯赛布（August Freidrich Ferdinand von Kotgebue 1761—1819）被一个精神错乱的学生所杀害的案件，便煽动德国各邦推行他所策划的反动的卡尔施巴德法（Karlsbad Decree），从而以检查出版书刊、严格控制大学和禁止集会结社等压制手段，来消灭自由主义。1848年的革命即指1848年推翻反动政治压迫的革命运动。梅特涅虽被赶下政治舞台，但反动政治不久又卷土重来。

乃是接踵而至的一切困难和耻辱的根源。1848 年的革命就是这一事件造成的必然后果，而且它的流毒至今尚未肃清。

阿尔天斯坦男爵(Baron von Altenstein) 1817 年，以阿尔天斯坦为首的"宗教和教育部"建立未久，苏佛恩便失去了掌握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力量。他于 1819 年提出的改革教育法案，始终未经政府批准实施，竟因无休止地修订和审议而终于被废弃。至此，推行伟大理想的能力已经逐渐地消失了。政府方面一向对于教育奖掖和鼓励的态度，一变而行拖延和卡制的畏首畏尾的政策。国王唯恐教育太多，其焦虑的心情已在他批示的词句中流露出来。因此，在以前与群众同呼吸时曾说费希特在《告国民书》中所阐述的正是他自己哲学思想的阿尔天斯坦，在 1822 年的政府通告上，却宣称国王陛下"不能不称赞那些为初等教育事业而鞠躬尽瘁的人们；但更要指出：必须确定一个限度，如果没有限度，则群众便都将变成一知半解的知识分子，同他们未来的职业就不相称了。"当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师从三等成衣匠和残废军人手中接管初等学校教师工作时，人们确是引以为忧的。

稳步前进 幸运的是将政府的命令落实到师资培训学院和初等学校，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甚至比今天要经过的时间要更长些；还有，在旧政治体制下，一些中层官僚主义的阻力，也比我们今天被党派之争所削弱的官员们的阻力，更大一些。各地方当局仍然受那种陈旧思想的影响，宗教和教育部本身也没有把那陈旧思想完全抛弃。就阿尔天斯坦来讲，他或许不是有雄心大志的人；但他毕竟受过高等教育，只不过偏袒愚昧主义者的企图而已。反动派想要清洗宗教和教育部里面他们所厌恶的大臣，又失败了。因此，初等学校和师资培训学院基本上得以平安无阻地照常进行。严重影响大学教育的政治干扰，对于初等教育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1840 年阿尔天斯坦下台时，普鲁士计有三十八所师资培训学院和

七所“辅助师资培训学院”，其中还有许多曾受裴斯泰洛齐思想影响的优秀教师。这些学校从开始就未受那呆板的课程编制的约束，可以自行选择典范和自行探索作法。它们有双重目标——使未来教师具备他们在业务上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同时使他们粗具教学艺术。前者要占用最初的两年时间，不过一般都要延长到三年。在这两年中，未来教师须针对初等学校所教的各科知识，以他们在初等学校已经学到的知识为基础，再就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予以提高。教学艺术是三年级和四年级的主要学习内容。为了完成后一项任务，所有师资培训学院都附设有实习学校，未来教师先以参观者的身份到实习学校观看老教师的示范课，然后再在老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教学实习。

赫尔巴特（Johau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的教育理论 在十九世纪前半叶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的发展，乃是教育领域中另一重要因素。在大学里，教育理论已被认为正式学科，有些大学甚至成立了专门研究这项新学科的研究班。许多曾受大学教育的师资培训学院的教师，就把在大学里学到的心理学这门新学科，传授给初等学校的教师。在很长的时期里，人们便把“赫尔巴特教育理论”和“科学教育理论”作为同义词。这种教育理论是以明确的定义来满足人们偏爱教条的心理；同时，它对于政党与教派的相互敌视又抱着不偏不倚的态度，从而为这种理论受到广泛采纳奠定了基础。它所曾发挥的重大作用是无可置疑的。最主要的是它启发人们对于教导问题去进行哲学的探讨。

（2）1840—1870年

反动势力：腓特烈·威廉四世 第二期开始于1840年。在这时期，德国的政治生活完全以停滞和极端保守为特征，这种势力自然影响到初等教育。普邦的宗教和教育部的大臣相继由艾希霍恩（Eichhorn）、饶玛尔和米勒（Muhler）担任。在此以前，初等教育

几乎没有受过高压政治的影响；到此时，这种政治势力却伸到师资培训学院和初等学校了。这几个教育当局者的共同点就是不信任教师和厌恶“全面教育”。关闭布勒斯劳师资培训学院和1847年解除第斯多惠柏林师资培训学院院长职务，都是具体的说明。各处的初等学校教师都大受当局的诟骂和污辱，被指责为一知半解，知识骗子、不信上帝、目空一切和不服从领导。腓特烈·威廉四世确曾自认为他已经发现：教育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在1849年普鲁士的师资培训学院教师会议上，这位国王亮出他的内心世界：“你们，并且只有你们，应该承担普鲁士邦去年发生的不幸事件（指1848年发生的革命运动，译者注）的全部责任！这种违反宗教原则的伪群众教育应该承担这次不幸事件的责任！你们曾以‘真正学识’为幌子去推广这伪群众教育，你们曾利用这种教育使我的黎民百姓不信上帝和不忠于王朝，还使他们同我个人离心离德。这种虚伪的教育，到处招摇撞骗，令人望而生厌。在我登王位之前，我已恨之入骨；我登王位以来，就不遗余力地消灭它。我决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消灭之而后已，海枯石烂，此志不移！”不管这位国王实际上是否用了这些恶毒字眼，但这些话代表他的思想感情是毫无疑问的。可以说，从来没有人象这位国王那样，把自己所干的罪恶勾当，满怀怨气而毫不讲理地硬推到别人头上。从来也没有任何时代对他们的前人，象德国反动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对于启蒙运动时期那样，满怀怨气而毫不讲理地强加予种种罪名。

斯帖尔（Ferdinand Stiehl）的《法规》 斯帖尔起草的并于1854年公布的臭名昭著的《法规》，把这些反动思想都给予法律条文化。这些条文涉及了师资培训学院和初等学校，也是最早企图迫使这些学校遵守政府规定的课程编制的法规的。在此以前，各学校在课程安排上是享有很大自由的，只是因地区不同和学校不同而各异罢了。这份新法规的主要意图是抵制“全面教育”和恢复

过去的简陋的初等教育。一切都要依照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所规定的必要的基础教材进行教学；凡超出读、写、简单算术和宗教教育等以外的教材，纵使是无害的，被认为“多余”已属幸运了，所以只能有条件地允许保留。这时期的主导思想同腓特烈·威廉二世第一次反启蒙运动的反动思想，完全一样。在那时，韦尔奈(Wöllner)所颁布的《乡村学校和城市初等学校教师管理办法》中，规定《教义问答》、《圣经》(规定章节和诗篇)和赞美诗歌为教学主要内容；除此以外，儿童还须学会“书写稍微清楚的文字和掌握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简单算术。”“因此，教师务必将注意力集中到上述各项教材；同时，绝不准许教师忽视或草率处理这些主要教材，却去讲述有关博物学或地理学等问题。”这些言词恰可作为斯帖尔《法规》的序言，只是表达这些思想的词句略为冠冕堂皇些罢了。

师资培训学院 他们既视师资培训学院为罪恶渊薮；所以第一步便把师资培训学院降低到他们认为恰当的水平，也是很自然的。各科教材都从各方面遭受削减；其用意似乎是：教师只学习他们以后教学所需的教材，就足够了，没有再多学习的必要。师资培训学院是要培养教师，而非培养妄图作学者的人——这是要反复不断予以制止的！政府明确指示：除所规定的既属必要而又属足用的各学科外，凡未经特准的学科，一律不得擅自讲授。“师资培训学院的目标不同于城市高等学校，只培养那些仅设一个班级的初等学校的教师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另外一些有关各学科的法规也都有类似的规定：“以前可以讲授的教育原理、教学理论、人类学或心理学等学科，应一律从教学计划中剔除”，并改设简易的“学校知识”学科。再则，以前一直被称为“基督教知识”的宗教教育，今后改称为“教义问答教育”，并“以未来教师必须逐字逐句懂得的简明扼要的内容为基础。”

德语教学也同样以最必要的教材为限，并以一种初级课本为

基础教材。所谓“德文名著”，虽课外阅读也在禁止之列。《法规》对于历史、地理、博物学和自然科学的限制，都表现出这种精神。

甚至在数学和算术的教学中，规定的限制也是极严格的，唯恐有读书野心的魔鬼在这里钻空子！象小数、分数和求平方根等简单的算术，也被认为超出初等教师的知识范围，“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得允许学习；而且除确属有学习必要者外，不得允许学习。”有关师资培训学院的（而不是初等学校的）法规的实质，在此可见一斑！大约就在此时，我的家乡施莱斯维（那时是在丹麦统治下）的一所优秀的初等学校，即我曾肄业的第二初等学校，不但讲授用无限小数和开立方，甚至还讲授初等代数和几何！所有在此以前师资培训学院所标榜的一些学科，此刻都被看成是“禁果”，却把讲授教会信条的宗教教育作为一切教学的基石。学习的首要要求是熟练地掌握广泛的圣经故事、经文、圣经教训、赞美诗和颂圣歌，获得这些要求的最好办法是用心死记。法规对于师范预备学校准备升师资培训学院的学生应具备的知识，更规定了明确的数量，就是必须学会五十首赞美诗，十八首颂歌，再加上《旧约》和《新约》的一些故事，还有《教义问答》。在以后的年代里，还要求学生反复地学习这些，以便运用自如。政府还进一步责成师资培训学院教师要严格遵守政府规定课本的范围，不得擅自增加教材，并且要从青年心里拔掉“唯有读书高”的恶魔的根子！另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通常的趋势都把师资培训学院设置在乡村或小城镇，并按照寄宿学校那样把学生组织起来，其意图自然是尽可能地防止未来教师受到“有毒害的时代精神”的影响！

初等学校 初等学校的法规也具有类似的倾向。仅设一个班的乡村学校是这类学校的通常模式。其主要课程是大量需要用心死记的宗教课，其他学科的内容却是很贫乏的。在《法规》上规定：“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每周可用三小时给儿童讲授一些有关本地方

和有关博物学的常识，也可用一小时教绘画。”以发展天赋才能为目标的“陶冶”方法，是被禁止使用的，用心死记和机械背诵又被恢复为各科教学的典型方法。这种教学的目标不是奖励独立判断和独立思考，而是以所谓“珍贵和有价值的教材”填充学生的心灵。一个思考太多的人是危险的——这是在《法规》的每一段的字里行间都可读到的箴言。在《法规》的结尾上，起草人又扼要地阐明其主旨：“所有学校教学无例外地要遵守两项基本原则。第一，教学不能使学生才能片面发展和养成抽象思考的习惯，而是向学生提供适当的和有价值的教材。第二，教材的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得超出学生能充分理解的范围，这些内容应为学生练习才智的资料，直到对这资料完全熟练和精通为止。”毫无疑问，这些一般性的原则是容易作出正确和合理的说明与贯彻的。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根据《法规》本身的意图和它所提出的说明看，《法规》的目的是要降低教师的学识水平和初等学校的标准，而《法规》在这方面的意义也是众所周知的。

(3) 1870—1900年

新的进展：俾斯麦 反动时期的结束标志着普鲁士初等教育史第三期，也是最末期的开始。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上述的第一期的特点的复活，即裴斯太洛齐教育理论中的原则又得重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俾斯麦当政时，普鲁士邦在德意志联邦中取得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德意志人民的勇气和力量得到恢复，从而使德意志在国际上取得了适当的地位。这些事情同国内政治变化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在外交事务上抱积极态度的国家，在内政上可能采取的准则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所有人的天赋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以便其效忠于国家的事业。在历史上到处可以看到，外交上的怯懦和软弱总是同国内的政治压迫和停滞不前分不开的；而一个在国际上奋发自主的国家，也总是努力使民族内部的一切力量有

自由发展的余地。一个有良心和自信自尊的政府总是相信它的人民的。反之，一个缺乏自信心的政府也总是害怕自己的人民的。

法尔克(Dr. Falk)和施乃达(Fr. Schneider)掌握下的师资培训学院和初等学校 1872年，法尔克被任命为宗教和教育部的大臣，表明普鲁士在教育政策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斯帕尔所任的初等教育司长一职这时也改派施乃达接替。斯帕尔的《法规》当年即被宣布废止，代之以1872年10月15日公布的《普通初等学校和师资培训学院的管理规章》。新规章的主旨是：第一，在教学目标方面，提高所有各学科的学习效能，尤其重视对历史和自然科学的提高；第二，在教学方法方面，除绝对非背诵不可的教材外，限制滥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同时注意尽量促进学生的理解力和思考力的发展。这就是有关师资培训学院的规定。教育理论、逻辑学、心理学等专业科目都在师资培训学院恢复设置了。所谓"德文名著"现在也被列入教学计划。数学课不仅讲授小数、分数，也讲授对数和二次方程，还讲授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为改善自然科学的教学，更要求设立物理馆和化学实验室。另外又增添了外语选修课（一般都是法文）。过去流行的对于"学习不当"的恐惧症，也当然消失了。

初等学校是按照这个方向进行整顿的。当时立即决定将各校扩充为几个班级，那些仅设一个班级的学校则作为临时学校。凡在同一地区有两所以上只设一个班级的学校时，如果可能，就合并成一所多班级的学校。每校学生若超过八十名，按照规定应分成两个班级；学生超过一百二十名，应分成三个班级。初等学校的修业年限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各科教学也作了规定。宗教教育要以《圣经》作为最主要的教材；《教义问答》只限用于《圣经》中较为重要的章节；需要背诵的赞美诗"最多二十首"，而斯帕尔的法规

则规定“至少四十首”。德文朗读课要求达到流畅的标准，默写和作文课要求注意文法和缀字的正确无误。多班级学校的高年级要给学生讲授初级诗歌课，讲述民族诗人的生平及其主要诗篇。高年级的数学课除包括小数外，还要包括初等几何。在物理课教学方面，至少在规模较大的学校里，要采用一些实验。历史、地理和博物等学科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熟悉他们的周围环境，并尽可能地理解日常接触的各种现象。还应通过绘画和歌咏等学科的教学，来发展学生对艺术的爱好。同样也应通过体操和运动等课的教学，来促进学生体质的发展。对于女生要进行缝纫教学，后来有些地方，除缝纫之外，还增设一些家庭工艺学科。

学校的成就 凡是确实达到上述要求的学校，就已经完成了真正国民教育制度的意图。当然，当时并非各地学校均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即在今日，也还是如此。例如在乡村学校中，有的学生太多而只有一个班级和一位教师，有的上课人数变化无常，还有的有其他一些困难，如教学用语和儿童所用土语不相同，因此，要满足上述要求便不可能。但只要具备稍好的条件和环境，这些要求还是可能达到的。这些要求并不过奢，只能满足实际需要；凡达不到要求者，均由于条件与环境所限。不过，近三十年来普鲁士的初等教育，凭着不懈的努力，在这方面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后来教育政策不时的变动也几乎没有影响到初等教育的进展。再后来，随着人民日益富足和政府收入不断增加，政府拨给学校和教师的经费更有大幅度增加，当包斯(Dr. Bose)掌权时期尤为显著。仅设一个班级的乡村学校在德国初等学校中遂不再是典型的了。由于都市扩大和人口增加，三个班级和三个班级以上的学校也不断增加，而且学生入大规模学校的人数远远超过入小规模学校的人数。就专业教育和教师社会地位的相应改善的情形看，可以想象当时学校和学生的成就，大体上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了。①

新型的"中间学校" 这次公布的《普通规章》除对初等学校作了整顿规划外，还规定成立一种新型的"中间学校"，其程度和小学高年级相同，其地位是介于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之间。这种学校一般应设六个班级，至少也要设五个班级；所设置的学科和一般初等学校一样，只是把程度提高一些，特别是在科学和历史等学科方面。另外，它们还设置法文课，或许还另设一种外文课作为选修学科。创立这种学校主要是为满足当时社会对于商业教育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样也就使文科中学的低年级和中年级的学生人数得以减少。但这种学校始终未能广泛发展，到1901年共有456所，3,759班和学生134,741名。这显然不是由于学校本身有什么缺点，而是社会条件使然。这种学校属于初等教育范畴，不能称为"高级"学校，毕业生也不能享受仅服兵役一年之类的特殊待遇，人们遂宁入实科学校而不入中间学校了。

学校与教会 在法尔克掌管教育行政时期，另一具有重要意义的特点是教育当局对教会的态度的变化。在前一历史阶段，教育当政者曾企图在不公开放弃学校为政府组织机构的原则下，重新建立教会对于学校的统治。但现在在文化斗争中，政府同天主教会的冲突达到顶峰，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使学校脱离教会，但又要不违背历史所确定的和宪法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原则，即在初等学校中，宗教教义问题应受到最严肃认真地重视，再则，宗教教育

---

① 1861年普鲁士邦有城市学校2,935所，共10,290班；乡村学校21,828所，共26,493班。1901年城市学校4,413所，共35,733班；乡村学校32,332所，共63,349班。1901年只设一个班级的学校的学生人数下降为1,373,442名，设两个班级的学校上升到487,830名，而设三个班级以上的学校上升到3,819,600名，也就是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师资培训学院在斯帖尔当权时期仅增加几所，到1901年则增加到733所。

的方针应由所在地宗教团体决定。1872年通过的《学校视察法案》所确定的原则是，视察学校的职权属于政府，教会牧师是受政府委托而对学校进行视察，牧师本身并无此项职权，政府随时可以撤销这项委托。因为地区视察工作中包括学校视察工作，所以地区视察人员中也增派了相当数量的专职教育视察员；如今，教育视察员约占全体视察人员的四分之一。在《学校视察法案》的管理原则之下，非教派学校的发展得到了鼓舞和促进。因为《法案》曾鼓励地方教育当局对学校加强管理：凡同一地方有两所以上教会办理的、规模小、经济贫困、只设一个班级的学校，应设法合并为一所较好的多班级学校。与此同时，法尔克非常谨慎。他不赞同自由党派的口号——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条件下，一律推行不受教派干预的"信仰自由的学校"（指信仰天主教或新教的自由）。除个别确有把握可使两个以上的教派学校合并为一个非教派的学校之外，他从不同意市政当局的合并教派学校的建议。毫无疑问，这乃是最易贯彻而又最易收效的政策，既对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而不从某一教派或某一政党的主张出发。总地来讲，法尔克的这种偶尔对教派学校的教徒采取妥协态度的政策，得到他的继承人的继续保持，尽管他曾遭到牧师们极端强烈的攻击。

展望 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去三十年的初等学校得到了稳步的发展，还可肯定它在今后仍将继续地发展下去。当然还有一些障碍需要加以克服。例如，对于国民教育事业，即使那些开明人士也许将不再象五十年前那样地热心了，东德地区的大地主和天主教会就更不用说了。不少被选举出的国家代表对于国民教育的进展感到担忧。自从社会民主党出现以来，对于缺乏教育的群众是否不容易管理的问题，即使那些不久前只要一听到这样提法就感到愤怒的人们，现在也严肃认真地考虑了。虽然如此，教育事业是仍将继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发展也不会被破坏的。社会的利益不

容许已经发展起来的国民教育事业被破坏，是太明显了。从党派的利益看，发展教育事业是否可取，有些地方似乎还是有问题的。但从全民族的利益来看，即从国家的利益来看，而且也从君主政治的利益来看，毫无疑问，充分发展国民的一切才能以便更好地保卫祖国和开发祖国，是确实有利的。现在文明世界的实况是，一个在这方面落后的民族，必然要受强有力的邻国的宰割的。很清楚，德意志民族要想不失掉它以前通过早期的强制入学和为培养师资付出的艰苦努力，才在教育方面取得的初步成就，就必须竭尽全力以争取其继续发展。德意志已遭遇了对教育事业全力以赴的法国和美国这两个竞争的敌手。不会有人怀疑，在为民族尊严和强权而展开的伟大斗争中，其操必胜之权者必然是那重视高标准、严要求的学校教育，和那以提高家庭经济收益与道德水平的教育来培育青年一代的国家。对于那些认为愚民政策是巩固政权的最好办法的人，最近东欧一个大帝国的下场，恰是最好的前车之鉴。一个害怕“开发民智”的政府肯定是逃不脱覆灭的命运的。

1901年的师资培训学院章程　施乃达制订的章程至今仍在初等学校施行；但1901年公布的初等学校教师培训和考试的新章程，其用意是使一般教师的学术修养提到更高的水平。这份新章程同斯帖尔的法规，在要求上完全相反。按照斯帖尔的规定，师资培训学院的目标，在实际上只不过是引导未来教师学习一些教学技术，除巩固他们在小学所学的知识以备将来任教之外，没有进行任何提高教师学养的教育。新章程的目标刚好不同，首先而且突出的是使教师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确有学识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乃依照德国各邦的范例，把师资培训学院和师范预备学校的课程表衔接起来，使未来教师共受六年的连贯教育。因此，各科教学都有比较远大的学习目标。它们把逻辑学和心理学作为学习教育原理的梯阶。在德文基础教材中，

包括了从中世纪以来的全部德国文学名著，其中有席勒和歌德对于戏剧和诗歌的论述，莱辛、赫德和席勒对于散文的论述，还有荷马古诗选读和莎士比亚的戏剧选读；，现代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在其中。除此之外，还要设置一门外语课，一般是法文或英文，也有些地方设置拉丁文；按照规定，这种外语要连续学习六年。在数学课的教材中则包括对数、二次方程、立体几何和三角。

现代小学教师　从以上开列的教学内容可以看出，师资培训学院逐渐具有引导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性质。这件事实可以说明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已经改变，并且在继续变化之中。以往的只教儿童读、写和考问《教义问答》的旧式教师，这时已不存在。年轻的教育者已取代他们的地位，来负担促使广大群众具有高度民族主义精神这项更艰巨的任务。德意志从原始农业经济发展成为第一流工业强国，正有赖于“中间学校”和类似高等小学等城市教育机构的稳步发展。这些学校对教师学识才智的要求，就不同于以前农村中只设一个班级的学校了。今天教师的任务也不仅限于讲授初等学校的课程。在前面所述的技术学校和业余学校里，教师又遇到一些新的重要任务和问题；他们如果对于时代生活缺乏全面综合的理解，如果不明确自己对于德意志民族的经济与技术、法律与政治、文学与科学等各方面生活的关系，他们就无法处理这些新任务和新问题。

初等学校教师升入大学的问题　近年来初等学校教师纷纷提出入大学深造的要求。对于这个问题必须从新的观点予以评论。因为最近在孔尼兹堡召开的教师大会上，通过一项关于各学校各年级的所有教师在原则上都应接受大学教育的决议。这种要求不免脱离实际，因为不仅从学校外部条件而论，经济条件不够；而且从学校内部条件而言，也涉及到大学教学组织问题和初等学校教学目标问题。具体说，初等学校既不需专门学者，也没有专家活动

的余地。另一方面，却应该对于完成师资培训学院教育之后而有特殊才能和特殊意志的人，给予入大学的机会。这样作，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都是可取的。很清楚，消除社会等级和职业等级之类的障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事。最近普鲁士教育章程在这方面的成功，是这份章程的最大优点。从这观点看，各大学开设假日讲习班或安排系统的学术讲演，和积极设法使渴望求知的教师得有接触新学术和新科研的机会，是该同样受到欢迎的。

IV、继续教育和其他教育影响

技术学校及其起源　继续教育学校和技术学校是十九世纪的特殊产物。它们的教育目标是在初等教育的基础上，再给予从事商业或其他职业者以预备教育。它们主要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发达起来的，虽然它们的出现是更早的。一般儿童到十四岁就从初等学校毕业了，有些地方，如德国东部的天主教地区，还要早一些；但这种教育却不一定对他们总有益处。的确，常常在他们离校后的几年内，这些基础教育已被他们忘光了或丢光了，因为青年时期常是最危险的关键时刻。这种事实极为明显，是不会被人忽视的。早在十八世纪，就曾有人开办星期日学校或夜校，来进行初等学校后的继续教育，特别是继续进行宗教教育。这些努力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其成效却微乎其微。原因是一般在生活上能独立自给的青年既缺乏学习兴趣，又难以驾驭。到十九世纪中叶，经济的蓬勃发展改变了社会生活的现实。原来在初等学校教育基础上设置的业余学校遂逐渐变成技术学校和专科学校。教学的主要目标不再只是复习和巩固初等学校所学的知识，而是要学生利用其在初等学校所学的知识，来进一步获得同他所选择的或他所从事的职业有直接用处的知识和技能。这样一种不单纯依靠熟记而是同实际生活有直接联系的教学，从开始就使学生感到兴趣，直到最后仍能使学生感到津津有味。

业余学校和技术学校的编制 这样发展起来的各种程度的业余学校和技术学校，种类既多，形式各异，构成了极复杂的教育体制。各种各类的工业、商业和农业的业余学校和技术学校，在组织形式和教育目标上彼此极不相同。它们遍布于德国各个地区。所有这些业余学校都把德文、数学和制图作为必修课，安排作业则随学生所选的职业需要而定。在许多地方，这种学校首要的是重温一般的基础知识，并巩固和补充初等学校已学的各科知识。为完成这样的教学任务，普通业余学校则成了技术学校的辅助学校。在一般农村中，由于初等学校达不到应有的水平，同时入学人数有限而无法设立专类性的技术学校，这种业余学校便成为唯一适合需要的教育机构。业余学校常常遇到的困难是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师资。还有一种困难，就是学生常常不到校上课。不过，普鲁士当局如果下决心仿照别邦的办法，对业余学校实行强迫教育，后一种困难是不难解决的。即使在现在，这个问题也是可由地方当局解决的，而且有许多市镇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业余学校和技术学校的重要性 到现在，那些初等学校毕业后再入技术性或职业性教育机构的人，已是以数十万计了。这种以初等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一种新型教育。它不仅是有助于商业和整个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对学生本身也是具有实际利益的。因为他们离开初等学校时，正是最佳的受教育年龄，同时也是最需要教育的年龄。他们的天赋才能在这个年龄刚刚开始活跃。假如不及时地予以开发，这块土壤就会被到处滋生的荒草所侵占。当这关键的岁月，对他们品德上的某些帮助作用也不是无关轻重的；这并不是说业余学校须要进行什么直接的品德教育，而是说青年们在认真追求知识和技术的过程中，就会受到这方面的充分的教育作用的。

"民众高等学校" 从斯堪第那维亚各国引进的一种特殊的业

余学校，就是“民众高等学校”。它们的组织形式类似英美式的学院；不过，它们是面向广大农村群众的。它们的特点是德育与智育并重。的确，培养青年品德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在青年品格发展的初期，叫他们在公共集体中通过自治来遵守纪律的约束。

新闻报刊和普通文学读物 在公共教育方面增添了许多种教育机构的年代里，如今又诞生另一种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的“教育体系”，而它的作用却在许多方面与教育机构又截然不同——这就是新闻报刊和各种读物。新闻报纸的传播和影响如今已经急剧地增加了。在五十年前，相对地说，读报的人是很少的。到今天，读报却成了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常事。居住在都市的人如今几乎没有不读当日报纸的，甚至居住在东德农村的落后群众，据说也有人读报了。在报纸之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周刊和月刊相继出现，最近又出版了多种多样的书籍，有供文娱之用的，也有传播知识的，有文学名著，也有精彩小说。各种文学著作已深入到各村各户，无论贫富贵贱、无论男女，都已成了读者。因此，甚至广大群众的眼界也开扩得无法估量，各种思想的传播更是迅速得无法想象了。在百年之前，农工群众根本不读书，即使读，最多也不过偶尔翻翻日历或流览几页《圣经》和几首赞美诗；现在他们却每天都要阅读社会新闻、政治时事和有关社论，也要阅读通俗的自然科学和现代神学论文、短篇故事和长篇小说、旅游书籍和历史书籍等等，这些作品有的是用爱国主义观点写的，有的是用社会主义观点写的。各阶层人士这样广泛地阅读成风，是否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只有利而无弊，则当作别论了。它的危险性是不难理解的。不过，人们不加批判和选择地贪多务广，再加上那种不求甚解和不务专精，便形成了我们时代读书的特殊风气。在过去人们读来读去只是那几本内容一致的精选书籍的时代，要想使人们的个性与民族特性保持稳步发展和有机协调，是比较容易的。但在今天，自朝至暮源源而来的报刊读物，把世界各

角落的无数的报导一一送到我们面前，其中多数又是迎合群众心理的惊险故事和淫秽丑闻。在这样的时代怎样办方能使合理而有益的教育得以繁荣发展呢？这些颇待深思。抱怨是没有用的，美好的往事是唤不回来的，何况往事在许多方面并不是尽美尽善的而且是进步迟缓的呢？如今，读书阅报已成时尚，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好好利用这种时尚。现在有大量优秀而健康的读物，只须不断地向读者广为推荐和随时剔除其糟粕了。近来出版了大量廉价的面向大众的丛书，还有各地图书馆和阅览室的设立，对于推广继续教育是不无成效的。如今，公开学术讲演、"群众高等学校"和一些类似的教育机构，遍及各地；如果再能注意指导读者选择读物，就能发挥更为有益的影响。这些努力如果能持续地蓬勃开展下去，各阶层人们的读书才能和热情，就将使人们的精神生活进一步得到开扩和提高。如果广大读者在这方面提到较高水平，新闻出版也必将随之而提高。英国在很久以前，就有读者通过致函主编来发挥对报刊的批评作用，倘若在德国这种风气也愈来愈普遍，则报刊编辑对其自身的责任感和对读者的责任感，也必将愈益加强的。

家庭教育的衰落　我们阐述现在社会具有发展的一面时，不应忘记社会还有其衰退的一面。家庭生活的教育作用就处于日渐衰退之中。青少年通过与家长一起工作来获得有关实际生活的教育，是愈来愈少了。在农村原始的生活状态下，儿童是在家庭的活动和工作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从幼儿时期开始，男孩和女孩在家庭中总是有点事情要做，有室内或室外工作，也有厨房或花园工作。这确是一种天伦乐事，父母享受子女的帮助，子女对参加工作也感到很有趣。这确实大有助于实现裴斯太洛齐所说的"家庭幸福"。无奈，今日的都市生活却有毁灭这种家庭温暖的趋势。父亲到工厂或机关去工作了，这时甚至对他的妻子来说，家庭的工作也无足轻重了。各种旧式家庭生产的商品趋于衰落了；而在商店或商

场中，任何东西都可以买得到。家庭工作只剩下烧饭、洗衣、扫除和修补了；而且就连这些也可以找人代办，所以妻子可同丈夫一样地外出工作了。因此种种，家庭简直变成了“夜宿站”，孩子变成了可厌的负担；就是在富裕的家庭里，孩子也不过是穿上衣服而伴着成人游戏的玩具；等到孩子开始入学时，麻烦就更多了。

代替家庭教育的措施 家庭教育的作用既趋衰落，社会遂提供了相应的教育措施。在家庭领域里已被忽视的和不能继续存在的教育工作，各地的公共教育机构逐渐起而任之。就女子而言，缝纫早已是学校的正规学科，其他家事工作如今也同样由学校进行有系统的培训了。对男孩也是到处设置了各种手工训练班，这是仿效北欧一些国家的办法，因为在北欧的国家中，各种古老的家庭手工业是比德国更发达的。这一切努力是值得赞扬的。因为这些手工艺术当传统的父子或师徒承传的组织形式一旦停止，就必须由国家采取相应的教育措施，以使它们免于失传。若从教育效能来讲，在普通教育中无有手工艺的教育，当然是不完善的；而能工巧匠在任何生活环境中都是可珍贵的财富，对于作妻子和母亲的人来讲更是如此。对于家庭的幸福而言，熟练的手工艺比会说几国语言的好处更大！即使对精神生活来讲，手工艺也是有其促进作用的；因为质朴无华的手工艺能常使人头脑冷静和谦逊有礼，而雄辩艺术和夸夸其谈却往往使人骄傲和自负。

“乡村教养院”(Land-Zrgiehungsheime)乡村教养院是列兹(E. Lietz)最近在乡村建立的教育机构。在乡村教养院里，把手工艺教育与乡村中各种手工生产行业互相结合起来，起了代替正在日渐减少的家庭生活的教育作用 这种和类似这种的教育机构，在德国也将象在其他各国一样，会逐渐增加的。不然的话，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不管装点得怎么时髦和怎么豪华，以及那种被大都市的奢靡和享乐给浸透了的家庭生活，都是不能提供适合于抚育青年一代的滋润土壤的。

第 三 章

回顾和展望

在这里，我们且以展望未来结束以上的历史叙述。由于人类预见性的唯一基础是对过去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分析，我们也要大胆地对教育运动所经过的广阔渠道重新作一番回顾。不待言，人们对于未来的预见是不会有任何确切的结论的，因为历史的发展常常会遇到干扰和巨大变动，致使发展进程发生改变或复杂化。然而社会发展的趋势一旦形成，它便具有排山倒海之势，可以抵制外在的偶发的历史事件的阻挠。从最近的事例看，历史发展的真正方向取决于社会人心所向的目标，而非取决于偶发的政治变故。很清楚，指引历史发展方向的无形势力，是蕴藏在社会思潮之中的。

A．教育的反宗教倾向

重温以上讨论过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贯穿在全部历史过程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教育不断向世俗化的方面发展和政府对教育的控制不断加强。第二，学校的组织系统随社会的变化而日益扩展其面向的社会阶层，此即所谓教育民主化。

政府对教育的控制　第一个特点也可称为逐渐地脱离教会的倾向。这首先在教育形式上明显地显露世俗化，即学校的控制权由教会转移给政府。在中世纪，全部教育系统都由教会掌握。到现在，政府当局则把各地教育的最高领导权都操于自己的手中，只是带有一定善意地允许教会在教育领域，特别在初等教育领域，依

然保留其或大或小的影响。这种转移由中世纪的大学开始。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特别是在新教地区，中等学校也跟着转移了；到十八和十九世纪，初等学校也都逐渐纳入政府的管辖之下了。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很清楚的。在政府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组织之前，各地的教会势力已开始末落；教会的衰落显然是同西方文化中所独有的各种思想感情的世俗化的趋势，紧密相联的。当追求来世的思想越来越不受人重视，并失去其作为人类行为的动力时，教会对于社会的影响也受到相应的减损。

世俗化的趋势 一般社会方面的世俗化引起了教育事业内部的变化。从大学到初等学校，教师不再是教会的忠实仆从或教会的神职人员。教材中的绝大部分改为世俗的艺术和科学。一切教学规章都要一律遵循教会教规的现象，到此时已不复存在。最先摆脱教规约束的是大学，到十八世纪，教规在各地的大学中都已明确地被废止了。在那时以前，大学里除神学院之外，至少还有哲学院仍然处于教会教规的严密控制之下。到这时，神学本身已成为一门科学，它所讲的道理都要能经受科学准则的考验。无论如何，德国新教的神学是如此；教会中一些当权者妄图限制神学的研究不得超出教条的范围，他们的努力虽收到点滴成效，但就整体看来仍是徒劳的。目前各校的宗教教育还是由教会掌握；不过，以往宗教教育所享有的统治地位却已经失掉了。不到二百年以前，每个学校和每个年级无不笼罩着浓厚的教会气氛和教条气氛。从那时以后，初等学校的宗教教育和高等学校的一样，在讲授的范围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它已成为和其它学科一样的一门学科了。在许多地方，宗教教育已成一门额外的学科，甚至成了受人嫌恶的学科，成了同环境格格不入的残渣，它的消灭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教育：政府的职能 直到现在，宗教日趋衰落的形势未变，并且人们也没理由会相信这种局面再有倒转的可能。当然，局部的

和暂时的倒转的现象还是可能的。教会从来不曾放弃过统治教育的企图。特别是天主教，它对于任何可以使它得到控制教育的机会，确实是绝不肯放过的。事实上，我们也须承认，从教育目标来讲，教育主要地应属于教会所关心的范畴，并且教育也不能不把心灵的拯救和行为的指导看作是自己份内的事。但历史上的既成事实是不能置之不顾的。教育的管理权落入政府之手，乃是由于历史事实发展的结果，其中有一部分也是由于教会本身错误造成的，因为从中世纪末以来，教会基本上已成了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阻碍因素；如今，政府决不甘心把自己所掌握的教育管理权再分割给教会了。我们必须承认，教育同政府自身的远大目标和未来职能的关系是太密切了，政府绝难容许教育再脱离政治管辖而重新归入教会管理。现代政府如果把维护和提高民族的文化与道德以及政治与经济的一切措施，作为自己的任务(事实上，政府只能是为民族完成这类任务的机构)，它就不会对于那培育维护人类文化遗产所赖的青年一代的教育事业，漠不关心；也就不会单凭相信教会能按政府的要求去做和能尊重政府的意见，便把教育事业交给完全不受政府支配的教会去掌握。这件事的道理是非常明显的，甚至连最早并不过问这种教育事业的英国，最近三十年来也开始以极大热情去管理和推动国家的教育了。德意志人民近年来的一些成就，已使其他国家认识到：政府为各阶级人民利益所领导和提倡的教育与文化事业，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教育与文化事业大有助于国家本身力量的发展，甚至使之成为军事或经济的强国。过去许多欧洲国家由于缺乏远见，长期听任教会掌握学校，或听任学校随供求关系自行发展；而今天，各国政府却都以极大热情关心教育事业了。

学校的监督工作 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是不会放松的。相反，它还将逐步加强，直到达到最终目的为止。摆在德意志面前的急

切的一步是：建立由政府监督学校的完善制度。教会在昔日对学校的控制，到了今日，除视察权外，都已不存在了；不过，这种牧师视察学校的事体，可以肯定也不会存在多久了。因为牧师视察学校和现代的学校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容的。最主要的是地方学校的视察工作不能再由牧师承担，因为他们太无能，无法胜任这种职务。视察任务是很艰巨的，须由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专负其责。把教师置于毫无本领的外行人的监督之下，把教师职业看成是牧师的附属品，对于教师的职位简直是污蔑；教师对此早已深有体会，同时也深为不满。我们的学校每前进一步和教师的培训每提高一步，旧的管理制度就进一步显得无法适应，当事人也就进一步感到无法容忍。最近，牧师们也屡次公开反映出同样的感觉。农村的学校视察工作也必将随地区的学校视察工作而改变。这并不是说，即使牧师具有视察学校的才能和专业知识，又对学校视察工作具有热情，而且地方上也愿把视察工作委托牧师办理，仍然不应让牧师去做。但对于这些条件一项也不具备的牧师，当然就不应叫他去做了。在一个世纪前的广大农村里，牧师是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去做或许还可以说是必要的。现在，因为师资专业有了发展，这种人才缺乏的状况已不存在了。

教育部应重新改组 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来看，宗教事务管理应从教育部中划分出去。管理宗教事务如不能单独设立一个部，最恰当的办法是将这项管理任务划归司法部。这样就可表明司法部不是专管宗教的机关，而只处理教会和政府之间的法律界限问题。以前把宗教事务与教育并为一部的主要原因是：国家还把基督教定为“国教”。

不同教派的宗教教育所造成的难题 我们应如何看待宗教教育问题呢？在教育制度的改革上，是否要完全取消宗教教育呢？如何答复这个问题，是要看对于宗教教育如何理解的。如果把它理

解为教导学生笃信教会的教条，则无论就现代国家的性质来讲，或就学校的体制来讲，便都不对头了。毫无问题，在十六世纪新教开始设置的宗教教育以及天主教随后设置的宗教教育，其最初用意当然都是为教导学生笃信教条。这种想法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消失。五十年前斯帖尔的《法规》就明确地支持这种想法，最近公布的法令也不曾有过反对的表示。在形式上，如今的学校教育和学校视察确实还在以这种思想为基础，尽管表面上宗教教育不再受到昔日那样的特殊重视。有理由认为这种宗教教育适合于过去的学校，因为旧日的学校的目标是彻头彻尾地作教会的“保育室”。这类学校的主要教学目标就是把教义作为绝对的和全部的真理来灌输给学生，这类学校只设一门宗教课便完全够了。但在现代国家的学校中，这就显然不适当了，因为现代国家并没有国定的教义。现代国家的人民可各信其不同的教义，政府对各派教义在原则上一律采取中立的态度；政府承认所有各派的教义，却没有它独崇的教义。在这种情况下，便显然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一方面政府设立学校施行强迫教育，另一方面学校教师又在政府监督之下讲授不同教派教义的宗教教育。于是遂产生一种奇怪的局面，即在同一主管下的两所学校，一所学校讲授天主教教义，推崇教皇是一贯正确的；另一所学校则讲授马丁·路德的《教义问答》，又绝对否定教皇。长期形成的习以为常的现象和我们对这种现象缺乏认真考虑，使我们对于这种内在矛盾失去感觉了。然而，这种矛盾毕竟是存在的，一旦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时，它便暴露出来了。例如，在1872—1886年的文化斗争时期，就是因为政府聘请的教师按政府的方针讲授宗教教育，不把教会新增加的教义包括进去，而教会不予同意，双方遂发生激烈冲突。还有，在信仰不同教义的人们中间，这种矛盾也同样地暴露出来，因为他们不准许子女学习与自己教派信仰不同的或与自己科学信仰不同的

教义；而且这些不同教派者的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人口调查表报上所公开披露的数字。最后，还有一种最突出的矛盾，那就是教师所感触到的矛盾：一些教师内心里根本不信仰某一教派的教义，可是按规定却硬要讲授自己所不信仰的教义。不久以前(在1905年)，不莱梅的教师曾将一份备忘录送呈教育当局，极其真挚地表白了这种感情。这种内在矛盾现在已在激化，总有一天将不能再容忍下去；到那时，德国也将和其他地方一样，政府所办的学校都要取消这种教条性的宗教教育，而听任教会对那些自愿学习的人们去提供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的必要性　这样考虑宗教教育问题并不是说取消宗教教育，不是说用任何方式或态度讲授宗教教育都要取消，至少在德意志的新教区是如此。不管每个人对宗教的态度如何，也不能否认宗教在过去人类精神生活中曾占有重要，或许最重要的地位；虽则我们相信它正一天天地趋于衰亡和走向历史博物馆，却也不能否认它在人们今天的精神生活中。仍然占着很有意义的地位。它在历史上，更到处留下了鲜明的遗迹。在西方世界各方面的生活中，无不存在着基督教及其教义与行为准则的势力。的确，在艺术和文学上，在建筑和音乐上，在哲学和科学上，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基督教乃是生活中的强大而无所不在的内容。如今也不亚于过去，没有人能够对它等闲视之。不管赞成它或反对它，一个人总须对它有明确的态度；纵使反对它的人，也不能否认它的重要性。因此，欧洲各国的政治发展史，从弗兰克第一任国王的皈依基督教和查理曼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起，到充满中世纪史册的政治统治者与教会统治者之间的巨大斗争；然后又从宗教改革起，到政治大革命和文化斗争为止；每一时期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宗教问题。在历史的每一寸土壤上，都留有基督教和教会的影响。所以，如果学校的使命是帮助青年一代在他们目前生活所在

的和有朝一日工作所在的这个环境中，寻求正确的方向；如果我们承认对人生最密切和最有实际意义的环境是历史的世界，而不是自然的世界；那就不能有所怀疑：学校不能，也不应该回避把基督教作为历史现象来讲授和阐述。任何人对于基督教教义和行为准则缺乏理解，对于《圣经》的和基督教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对于现实生活和对于历史，就只能象一个出席音乐演奏会的聋子。他就没有打开这个人类所作，所为和所企、所求的广阔领域的钥匙。因此，学校就不能不讲授这些史实，不能不把它象现实存在的事物一样来讲授；而且在这种讲授中，首要的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理解和鉴赏。再者，这是一千九百年前在犹太的土壤上开始的、随后又逐渐传遍全世界各地的一件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经验，所以不管称之为宗教教育、或基督教知识、或其它名称，讲授这一门学科是学校必不可少的任务，而且这种讲授不能仅仅作为偶尔的临时性的任务，应该尽可能地去作有系统的讲解。

非教派的宗教教育 事实上，德国学校对于宗教教育的教学问题，按照这个方针处理，已经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了。如今只等待作出恰如其份的总结，并按目前的状况予以公布；同时要让学校的师生明白，宗教教育的目标只是传授基督教的历史知识以及它的教义、它的文学记载和生活准则、它的发展和变革，等等。至于教导人们相信这种或那种教义为绝对真理，则超出学校职权和职责的范围了。如果我们下决心要得出这样的结果，首先就须做到教师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都能够做到问心无愧。在目前，许多教师感到宗教教育乃是沉重的负担。原因是，就新教教师来讲，他们总把个人良心作为最高的法庭；而天主教教师则又讲教会的教义至上，个人须退居其次。就是按照上面建议的方法进行宗教教育，在教材的选编与教法的运用上，也并非没有困难。不过，我们不能就此而停步不前，因为目前的状况已无法再容忍下去。不过，按照建议

的办法进行改革之后，教师们或许在心理上轻松了，会重新恢复对宗教教育的热情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对于《旧约》和《新约》这两部书所包含的丰富智慧和知识财富盲然无睹的。的确，作为世界名著来讲，无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圣经》是无与伦比的；教师是无法选用其它文集来代替《圣经》的；任何文集也无法发挥出《圣经》那样的启发青年领会人类生活和行为的作用的。

可以肯定，这样进行宗教教育，对于宗教本身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姑且假定基督教的某些具体信仰事例，如《教义问答详解》中所谈的原罪与赎罪、耶稣化身与耶稣献身、救世与赎罪仪式、悔罪保证与宽恕释罪、等等，不再在学校讲述；纵令那样也不会对宗教有所损失；因为这些教条所阐述的都是学生无法领会和理解的问题与经验，而一味叫学生莫明其妙地死记，反而扼杀了真正的宗教精神。宗教信仰是从深刻地同情别人的思想中产生的，最主要的是从同情自己生活所接触的人中产生的。要使宗教教育在学生中产生影响，唯一的方法是用历史和文学把宗教生活的真实情景展现给他们去看。就青年的道德教育问题而论，若不使《圣经》摆脱传统的教条解释，若不把《圣经》作为真实的人所写的人类生活经验，《圣经》也不能用来教育青年。另一方面，任何没有偏见的人也会感觉到，在树立人的道德思想的同时而又间接地陶冶人的品格的这种重要的教育方面，我们不可能不用《圣经》文学，也不可能如不莱梅教师所想象的那样，希图以世俗文集来代替《圣经》。《圣经》在我们这个世界将永远占有独特的地位，不仅由于《圣经》具有文学的价值，而且因为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非教派学校 上述宗教教育内容的改革，给德国教育未来的目标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一般德国的初等学校常常遇到新教与天主教两派教义同时并存的现象。我不赞成现在有些政党热烈支持的普遍设立“双教派学校”（即在同一学校之内分别提供新旧

教两种不同教派的宗教教育)的原则；他们认为这种所谓"非教派学校"是很理想的办法，事实上却完全行不通。利用法律手段来压迫不甘心情愿的人去学习，只能使教育上的争端出现对抗性的局面。倘若推行这一方案，教派的私立学校必将在这些所谓"非教派"学校(这一名称是否正确，尚待研究)之旁纷纷建立起来，天主教地区特别是要建立的，新教地区也很可能要建立的。这种只从政治主张出发而不从实际成败设想的方案，其最后结果必将与其希望相反，不是消除两教派间的隔阂，而是扩大和加深双方的距离。如果不这样做，而按照上面建议的办法，听任事物顺乎历史的主要趋势所预示的方向发展，就是说如果用单纯讲解《圣经》的办法来逐步代替讲解教条和教派的教义，而且进行这项改革时不采用法律规定的方式，而由教育当局保持开明的态度，那么，通过这种教学的逐步演变，到一定时候，学校就可随时采取最后一步的措施了。那就是建立完全非教派的宗教教育，不分教派而同样地讲解《圣经》和基督教发展史；各教派也可以进行各该教派的教学(当然是选修课)，作为补充，以备学生自愿参加学习。

很清楚，在众多读者中有赞成这样发展的，也有反对这样改革的；但是，他们都会认为这种理想是脱离实际的乌托邦。不过，我相信，将来事实的发展必然会走这一条路的。首先，德国各教派相互渗透的现象日益加快，这就有助于促使教育向这条道路发展。不须多久，德国各大小城市和乡村，都将出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杂居的现象。在教徒杂居之后，不同教派的学生很快同入一校的情形，也就增加起来。不同教派儿童既同入一校读书，彼此互通婚嫁的事也将越来越多。教民间彼此隔绝和疏远的现象，自然就随之而减少；彼此既相熟识，自然就增加了相互了解。另外，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不断发展，也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的一种促进因素。毫无疑问，在人们思想中和生活中，这种日渐加强的民族感情将渐渐压倒

那种教派之间的分歧。人们不要被十九世纪表面上的宗教冲突的怒火和文化斗争的剑拔弩张的局势所迷惑。那只不过是由于牧师们一心想要统治人的灵魂，又由于政治家们处事不当，才引起的积怨宿仇最后一次的昙花一现。事实上，当十九世纪之初，在不同教派处于和平共处之下的汉诺威或什列斯威格-霍斯坦等地，马丁·路德派与巴伐利亚的天主教派之间的裂痕之深，是远远超过二十世纪初帝国建立之后的。这种教派之间的距离日趋缩小的情形必然要继续发展下去。纵使各教派间的相互谅解还不足以保证不再产生裂痕，但各邻国之间的相互敌对却必将迫使德意志团结成为一个和谐的民族的。

现在的情况 在学校本身之中，很早就显示出这种教派问题渐渐被民族问题压下去的趋势。直到十八世纪中期，旧日的教派学校还在拘守着狭隘的偏私之见；但从那时以后，关于人类以及民族的思想，在德国也和在其它地方一样，不断地加强了。在法国，公立学校中的爱国主义热情，在某些程度上，取代了人们对宗教的感情。德国的学校虽则大体上避免了这样太过的情形，却已使德语和德国历史等学科的教学受到极大的重视。从教学来讲，初等学校早已不是只讲教义的学校。它们基本上已成为国民学校，尽管它们还有不同教派之分。德国中等学校的发展也有同样的趋势。直到十八世纪，中等学校的特点还是注重拉丁语(作为国际语言)，和信仰所在地区的教派的教义；但在十九世纪，它们便渐渐成了国民学校，德语即使不是主要学科，也是重要的教学科目。同时，在十八世纪，学校还理所当然地是教派学校；到十九世纪，除分散在各地的少数学校外，绝大多数都已是不同教派的学生平等相处的场所了。

所以听任“瓜熟蒂落”是明智的。初等教育若没有外力的干扰，也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世俗化的问题 不少热情拥护"双教派学校"的人，希图促使学校走上这条道路，似乎这种学校含有把宗教教育从学校中排除的倾向。我不相信学校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通往这条道路唯一的可能条件，就是各基督教国家下定决心一齐都要照这样去做。但是那些如此设想的人是有严重的错觉的。很清楚，人们的心灵永远也不能从单纯的科学和现世生活中得到充分满足的；而且越不逼迫人们相信"来世"，则越会使人们感到需要"来世"。宗教若在宏观社会中仍然成为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则在学校这种微观社会中，当然也要或多或少地保留它的地位。一般国家就是如此，别无选择余地。当然，在天主教盛行的法国，只有用从学校中排除宗教教学为代价，才能建立起民族主义的国家学校；但是，在德国，似乎既不需要，也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很幸运的是德国的教育发展，没有迫使我们为建立国家学校来付出法国那样的代价；德国教师因此能够和愿意从事宗教教育和《圣经》教学；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成为青年一代的名实相符的教育者。

政府控制的压力 政府控制学校常常产生一种附带的现象。这是指政府对教师进行管理的一些规章，和一些久已侵犯个人自由权和创制权的规章，都在越来越苛刻。这种作用是从政府的性质产生的，因为政府在基本上就是司法组织和军事组织，因此，在各项社会生活部门中，严格而统一的法令必然占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其背后总显示有强制性。随着政府不断扩大对于教育与教学的控制权，通过政府的命令与强制性措施，政府的特点也就在各方面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教会是建筑在信仰、仁慈和信任基础上的组织，对于强制措施总显得缩手缩脚，而且也没有可以充分利用的强制手段。近年来政府扩大对于学校的控制，发端于十九世纪。在那时以前，只有对各地学校的设立和各地儿童的入学等问题，一般由政府实行强迫；政府并不干预学校内部的问题。现在，政府

进一步对学校内部活动也加以控制了。中央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每个学校的教学科目、教学编制、各科教学时数以及各校应完成的任务，等等，都颁发带有约束力的法律形式的硬性规划，对各个项目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还由政府任命专职官员，负责通过定期视察和考核来监督学校严守法令。由于政府官员对于办学的知识不断增长，学校的教学方法也随而列入政府的管理范围。甚至在政党和教派的压力下，教师和学生的个人信仰是否"正确"，也都成了视察和考核的项目。学校既受到种种限制，教师的积极性便遭到难以容忍的压抑。他不能根据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时间，按照自己的见识去安排自己能做和需做的事，而只能按照每十年或二十年才改变一次的缺乏弹性的学校规章去工作。相反，旧日的规章倒使人觉得更合于实际需要；改革却会使人感到有些武断和难保合意了。无疑，这种限制性的压力沉重地落在教师的肩上，而感到最沉重的还是那些最有生气和最善于独立思考的教师。学生也有同感，尤其是中等学校的高年级学生，他们已接近成熟年龄，对于那一年到头受严格校规的约束和那天天布置与控制家庭作业的教学方式，都极为厌恶。现在，在德国，仇恨学校是极为普遍的事，人们并常常以愤怒的诽谤来发泄这种仇恨，而这些诽谤并非都是合法的和合理的。这就是政府控制学校的一种直接后果。

当前教育当局的态度 普鲁士教育当局对于这种不满情绪的同情以及寻求补救办法的急切，是任何其它邦所难与相比的。五十年前，魏赛主管教育时，就是以类似的观点而取得成功的，现在的教育主管人员希望比魏赛作得更为成功。当局的这种强烈愿望，一旦取得其下级以真正的渴望与赞赏的态度来响应，最主要是得到教师的这样的响应，就有希望得到可喜的结果；因为就教师来讲，他们主要希望的是一种善于自我约束而又有强烈责任感的自由。中层行政当局如果有尊重各种正当而真诚的愿望的作风，以

宽容的胸怀处理问题，以温和的态度予以开导，即使出现一些弯路或走错了方向，仍然有希望使生硬的教育方式和官僚主义作风等灾难从学校中消失，使教师和学生得以自愿而愉快地从事工作。

无政府主义教育 有一种更为新颖的教育家的学校理想，可以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这种理想一直未得实现。因为任何学校绝不会按照这种要求去做。他们要求学校废除一切强制；不仅废除一切强制，而且废除一切固定的制度，废除一切应该做的工作，把教学活动完全建立在学生的爱好上。那确实是对的，教育工作者和教师应该注意儿童和学生内心潜在的想望，并且应该切合他们内心的想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废除一切严格的规律。不。人们或者可以说，儿童和学生最感激的莫过于严格的管束，因为通过严格的管束才能逐步控制学生飘摇不定的爱好与冲动，从而获得坚定的意志与性格。按照马丁·路德讲解《主祷文》第四篇祈祷词时的解释，“严格管理”是幼小心灵所最需要的，而且到了儿童感到能够自持的时候，也绝不能放松管理。严格管理当然不是冷酷的和迂腐的管理，更不是粗暴的和大发雷霆的管理，而是以严肃手段和坚定意志引导儿童达到目的，这种目的是儿童从内心中承认恰恰是他们自己应到达的。实际上，教育上的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对于过分的官僚主义的一种义愤的反抗；实际上，无政府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样是不健康的和过于极端的。再者，无政府主义一旦抛弃一切自我克制而陷入一片混乱，其结果只能导致一切正常而必要的努力统统遭到破坏。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正是如此。这就是说，自由的大敌，的确，莫过于无政府主义。

B. 教育的民主化倾向

随着教育和教育机构的不断世俗化，随着政府所控制的教育领域的不断扩大，德国学校系统遂不停顿地向更多的人开放。这就成为本历史时期的第二主要特征。也可称之为与教育社会化同

时发展起来的教育民主化。

过去的发展情况 这种倾向在过去的发展情况，大致如下。在中世纪，公共教育机构是只为第一等级（僧侣）而设的；其主要的教育理想是属于僧侣的。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宗教改革时期，第二等级（贵族）和第三等级（中产阶级）也开始参加了教育运动。不过，在中世纪下半叶，大学早已使原来狭隘的僧侣教育扩大了教育面；与此同时，贵族和中产阶级也不断扩大其对于教育和教育机构的控制。这就使贵族主义的教育理想开始建立起来。可以说，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由贵族决定的贵族教育的雏形已经形成，十七和十八世纪更有它留下的烙印。自启蒙运动和新人文主义获得胜利以来，直到十八世纪末，中产阶级在都市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在十八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遂是中产阶级所决定的教育理想，即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的理想。与中产阶级同时获得享受一定教育和教育机会的，还有广大群众。因此，自十六世纪以来，读书和写字的教育已较为普及；到十九世纪，一向保持纯粹僧侣性质的旧式初等学校也逐渐转变成为按人文主义和中产阶级教育理想办理的学校。如果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下去，自二十世纪起，第四等级（广大群众）就有希望使人人都能充分享受普及的国民教育；换言之，费希特的国民教育理想就有希望得到实现，从此就不再有无知的群盲了。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目标不是要人人都受同样的教育，而是要所有成员都能按照他们不同的才能和条件，去享受每人所能接受的教育。

国民教育体系的发展 现在来谈谈这方面的未来发展趋势。在过去三十年间，我们差不多已经实现了的教育理想，的确不是人人都受同样的教育，而是普遍施行国民学校的制度。以前存在于学术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鸿沟，双方都开始进行填平的工作了。文科中学原是注重拉丁文而禁用德文的旧式文法学校，到这时已经

改变了。自从中学毕业考试不再考拉丁论文以后，以前教会以学术专业人员和一般人士仍在使用两种不同语言为借口而推崇拉丁文的问题，也就不再谈了。医师、律师、牧师、教师和学者以前惯用的神秘语言，现在也不再需要了。一切用拉丁语文为工具的场所也都消失了。全国人民遂都使用一种语言和文字了。的确，在过去一段时间，根本不懂拉丁文的学生也可以入大学了。革新的文科中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在以往，一般学生从六岁起就开始学习拉丁文，在这些革新学校里则被推迟到十二岁才开始学习；这样便腾出大量时间使学生去奠定各类型中学所共同需要的普通教育的基础了。

另一方面，初等学校还不断地朝着中等学校的领域伸展。如今普通初等学校课程的扩充，已使学生便于升入"中间学校"和高级市民学校，并且甚至可以通过高级实科学校而进入大学。当时培养初等学校师资的师资培训学院的课程中增授一种外语，适足说明国际贸易不断增长，已令人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初等学校的高年级，至少是那些设在大都市的，特别是设在通商口岸和贸易中心的设备完善的初等学校，将要增设外语课了。这种情况说明还有一种理想也将实现，那就是将各校的培训师资的专业统统归入相同的范畴。在现在，受过师资培训学院教育的教师和受过大学教育的教师还是有区别的，有时人们对于这种区别依然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也不能否认，近百年来这两种教师教育之间的区别，已经消除不少。1901 年创建的新型师资培训学院所培养出来的师资，更具备了丰富的学养，以致再没有高级市民学校——甚至应享有实科学校盛名而堪与中等学校相比的高级市民学校——由于任用这些师资而感到逊色了。大学学科的进一步扩大，教学与讨论相结合，以及全国教育委员会的建立，都是时间迟早的事体；这些都将有助于使德国全部教学专业组织成为一个无缝无隙的协调一致的

整体。

现实主义倾向 另一个消除教育内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协调的内在障碍的因素，是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现实主义在现代教育中是随处可见的，它是由于人们对于一般现实问题、工作问题和生活问题普遍地讲求实际效用而发展起来的。在一世纪以前，旧式教育到了高深阶段便崇尚纯粹美学和文学；文科中学的崇拜希腊古典文化也体现了这种旧式教育的精神。到现在，这种旧式教育的威望一落千丈。环绕人类周围的真实世界受到了普遍的尊重，那仅仅存在于人类幻想之中的彼岸世界逐渐黯然失色。由于人们不再把古典语文看成是实现人类理想的法宝，只不过是研究人类历史现实的凭借而已，而且这种古典语文在过去同在现在一样，是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其阴暗面的；因此，在古典语文的研究中也逐渐重视其现实意义了。这种对于幻想意境的美的憧憬渐趋破灭的情形，是到处可见的；其最明显的表现或许是在妇女教育上。妇女一向讲求多愁善感和爱美艺术；而现在妇女的时髦典型却是果敢而坚定的性格和锲而不舍的钻研专业的热情。在这种社会潮流之下，妇女教育开始转变。在女子学校里，科学教育占了重要地位，语言和文学的教学相应地压缩；随后，她们还可继续接受各种专业培训了。这种情形在男子学校中当然是早已存在的。在原有的人文主义类型的中等学校之旁，那些为满足现代生活实际需要而设立的学校，曾经纷纷出现；当然，后者的发展是和前者相应的减少相伴随的。与此同时，大学不仅加快步伐向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科技学院也突飞猛进地起来同大学抗衡。还有，教学方法也起了类似的变化，各地从大学到初等学校都在以独立探索和运用实事实物，来代替一向采取的书本学习方式。在大学，特别是在大学的理学院和医学院，那种依靠课本和课堂讲学等惯用的教学方式，正逐步地被实验和创造性研究所取代。这种教学方法在中小学也

在逐步发展；无可怀疑，它还要进一步发展下去。美国和英国已经先于德国而在中等学校建起了实验室和实习工厂。这两个国家的初等学校甚至也使学生同实物实事相接触，借以发展他们的观察能力和操作能力。这一切导致各国教育上的区别日益减少。道理很明显，讲求实践和技术的教育比较讲求美学和文学的教育，更不适于思想偏见的滋长。最适于产生思想偏见的土壤，是美学批评领域以及语言和文学研究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和工艺学的领域。从事实际工作颇能使那些徒尚空谈和死抱门户之见的文人，得以会聚一堂而产生互敬互重之心。到现在为止，陶醉于派系优越感的敝帚自珍的思想，总是那些舞文弄墨的文人所独具的特点。体育运动的不断普及也有助于向新方向发展。如今城市和村庄都广泛兴建运动场所，使青年聚集一处而相互竞技，这也将使那些由于教育界限所造成的相见不相识的人们，得到相互团结的机会。

艺术与广大群众 最后，还要谈谈在恢复艺术和人民的相互关系上，最近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因为艺术和人民群众本来就是分割不开的。艺术原是表达思想的一种通用的手段。在这方面，科学是远远比不上艺术的。因为科学的论证到了高深阶段，就不能大众化了；而美术的发展却是永远朝着雅俗共赏的方向前进的。把图瓦尔生(Allert Berel Thorwalelsen)的作品和米内(Constan tin Meunier)的作品陈列在一起，人们必然可以看出雕刻虽是最死板的艺术，但在精神上也是比较合于大众的要求的。人们看到一个是表现奥林匹斯山神所处的仙界中的优美运动形象，另一个是表现不须说明而人人都能熟悉的人民在实际生活中的劳动形象，两者都能使人发出赞叹的。可以说，凡是能焕发人民群众美感和恢复群众审美乐趣的事物，同时也都有助于消除教育中存在的派系偏见的。就这一点看，发展描绘和仿制事物形象的才能，乃是最值得提倡的工作。几何制图的老办法，在许多方面是起了麻痹

而不是启迪人的造型才能的作用；新的制图方法以观察实际事物为基础，从而起了保护和激发观察力和创造力的作用，使它们获得愉快的锻炼机会。如果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制图教学，再辅之以绘画教学，就将使学校和学生离开书本世界而走向实物世界，离开书本诵习和机械死记而走向实际操作和手脑并用，也将促使现实主义倾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这种学习对于学生在以后生活中从事艺术或手工工艺，都会有实际用处的。如果各种类型的成人学校和技术学校都继续坚持这种注重实际的教育，这种注重培养实际才能的作法，对于各阶级人民生活来讲，确实都是很重要的①。

人民群众 上述的种种努力正在受到广大群众的日益高涨的欢迎。在现在，人们如饥似渴地想接受教育的热情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为人们凭借才能而提高自己地位和身份的可能性，正置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大西洋彼岸的美洲新大陆，任何人的爱好和天才，不管其家庭出身和血统关系如何，都享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这种令人欢欣鼓舞的乐观现象对于欧洲的旧世界是不能不起焕发作用的。试看，欧洲居民不是都可以自由地漂洋过海吗？难道另一个崭新的世界就不能在欧洲旧世界的土壤上培植起来吗？在我们时代占有压倒优势的强大的劳工运动是任凭人们去非难的。人们可以谴责劳工运动的领袖忽视了民族精神；事实上，我们不能不承认临到战争时期，忽视民族精神的现象就不存在了，就立即显示出人们所说的乃是空洞口号。人们可以责备劳工运动领袖们过激的战斗论调和对未来的处置不顾后果；尽管如此，劳工运动毕竟不失为伟大的进步运动。伟大的劳工运动使喘息在劳动枷锁

---

① 慕尼黑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克钦斯太奈(Kerschensteiner)，在1905年所著《绘图才能的发育》(Die Entwiklung der zeichnerischen Begabung)中，阐述了如何使绘画教学成为使儿童与实物世界相接触、并使儿童的创造力获得发展的重要方法。

下和有酒今朝醉的广大群众都从消沉颓废中觉醒了。他们心目中有了未来的理想，从而大家都在振奋起来，并焕发出无限的积极性。自然和历史无时不在解答那些探讨未来的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大量书籍和刊物纷纷出版了，它们在把这种追求新理想的探索目光引向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不管这些作品如何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慎重的批判精神，也不管它们离真理有多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们都在受到人们热情地阅读、钻研和吸收。的确，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书刊，广大群众才变成了有文化的人。还可以肯定，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治、自律、自我献身和自我牺牲等道德力量，也是在现代劳工运动的号召下发扬起来的。不管其动机是否完善和是否合理，这些道德力量的价值是不会不一样的，也不会被磨灭的。一个本想出外寻求幻想的乐土而竟然发现了真实世界的人，或许仍将重弹他的老调，宣扬他的老经验；但那总是个别的事例。社会民主主义的乌托邦可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也不会实现；但它如果能使我们现代社会树立起新的理想和焕发出新的力量，使颓惰的人心发挥出强大的力量和发挥出尊重传统的精神，它就是大大地有功于世了。

富有希望的前景 总地来讲，最足以鼓舞人们对于未来抱有无限希望的，莫过于教育史。唯一的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思想就是人文主义思想。它在政治上同一切事物相比，似乎是最持久和最巩固的；而且它在经历了充分的时间的考验和各种不同民族的考验之后，更加大放异彩。一些国家在强权和财富的竞争中，因彼此相互仇视，以致陷入了战争；但在教育领域中，这些国家却都在进行和平竞赛和友好交流。教育机构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友好待人的。在政治生活上和社会生活上，相互敌对的阶级都能在这块中立的教育地带，得到协调、谅解和相互信赖。那些彼此不相往来的人们，在这种相互礼让的教育气氛中，也是能够达到相互

了解的。

不过，真正的国民教育理想，并不是使所有的国民都受相同的教育；而是在人人享有同等受教育机会的基础上，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天赋的爱好、才能和智慧的不同，来获得他们的最高的发展。这种国民教育是全人类教育的组成部分。这种国民教育体制的理想是使每个人都有使自己的文化修养和为社会服务的效能，根据自己的天赋高低和意志强弱，获取最优的发展的机会。

德国教育名称的注释

1、教育当局

(1) "宗教和教育部兼卫生局"(Ministerium für geistliche, Uterrichts-und Medizinal-Angelegenheiten) 是普鲁士邦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在1817年以前,内政部曾设教育处,该处是1808年由腓特烈·威廉二世时期的策德利茨所设的"中央学务局"(Ober-Schulkollegium)改组而成的。1817年始创立"宗教和教育部"。

教育大臣(Unterichts Minister)是宗教和教育部的长官。其下设处长(Referenten),分掌大学与高等教育处、中等教育处和初等教育处。

(2) "省学校管理委员会"(Provinzial-Schulkollegien)是各省的教育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全省中等学校和师资培训学院事宜;其主席由省的最高行政当局,省长(Ober-Prasident)兼任;其成员是省督学(Provinzial-Schulräte),负责学校视察工作。

(3) "县政府"(Bezirks-Regierungen)是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县以下又分为区(Kreise)。县、区设教育局,掌管初等学校。初等学校的视察工作则由下述的(4)和(5)两项人员负责。

(4) 区学校视察员(Kreis-Schulinspektor),多数地方至今仍由教会的高级教士充任。在新教地区,由教区牧师监督(Super-intendent)担任;在天主教地区,由教区司祭(Erzpriester)担任。

(5) 地方学校管理委员会(Lokal-Schulbehörde),设于市镇的,由市政当局组成之;设于乡村的,一般由地方学校视察员、教会牧师和民选人员共同组成。

最高教育参议会(Ober-Schulrat)是鲍尔生教授建议的从行政管理方面联系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的组织，是教育大臣的咨询机构。

II、 高等教育

大学的首脑称为校长(Rektor)。不过，有些学校，特别是较为重要的初等学校的校长，也称 Rector。为区分起见，大学校长则称 Rektor magnificus。大学校长由“正教授”互相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正教授”(ordentlicher Professor)不仅担任教学，而且能够担任院系(Fakultat)的考核与行政工作。其担任后一类行政工作者称院长或系主任(Dekan)。“副教授”(ausserordentlicher Professor)是有教授职衔的教师，但不能参预院系的考核与行政工作，也没有选举权。这两种教授都由政府发给工资，并收取听课学生的学费。此外，还有只收取学生听课费的第三级教师，称为“编外教师”(Privat-Dozenten)，当教授(Professuren)或讲座(Lehrslühle)出缺时，由他们递补；“编外教师”一般是先升为“副教授”，然后再升为“正教授”。“编外教师”须先写出以大量创造性研究为基础的论文，送经学院审查批准，方取得在学院担任讲课的资格。这篇论文名为“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他在申请之前必须获得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的授予：大学生至少须保持三年都通过严格的口试，再向大学提交博士论文，论文须显示作者具有从事创造性研究的才能。在大学学院中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博士学位是必不可少的资历；如欲从事实际专业工作，如充任牧师、法官、医师、高等学校教师等，还须通过政府的考试(Staats-Prüfung)。

学士学位不由德国大学授予。学士学位的授予仪式，在某种意义上，已被在大学录取(Immatrikulation)之前的中等学校毕业考试所代替。

大学生（Studenten）享有学术自由权（akademcsche-freiheit），这是几乎绝对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其中包括学习自由（Lern-freiheit）；即凡学生愿意听的学科，他都有听讲的绝对自由，这就是蒂里（Thilly）教授曾提出的"选修制"。

大学的讲课（Vorlesung）是大学学术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各类重要的学科都为高年级学生设置专题研究班，如语言学研究班（Philologisches Seminar）、心理学研究班（Psychologisches Seminar），等等。这些专题研究都是在教授指导下进行讨论和研究的。初级研究班是为程度不高的学生设置的。大学研究班（Universitäts-Seminare）和师资培训学院（Lehrer-Scminare）虽在德文中都用"Seminae"这个名词，却不可互相混淆。

本书第四卷第二章《实用性的科技教育机构》中所提的教育机构的德文名称，分列于后，以资参考：

Technische Hochschulen	高等技术学校
Berg-Akademien	矿冶学院
Forst-Akademien	林业学院
Landwirtschaftliche Hochschulen	农业学院
Handels-Hochschulen	商业学院
Tierärztliche Hochschulen	兽医学院
Kriegs-Akademien	军事学院
Artillerie-Schulen	兵工学校
Ingenieur-Schulen	机械学校

III、中等教育

中等学校有三种类型（在德国南部一些地方和在奥地利，统称"中学"Mittel-Schulen），除1543年萨克森邦在普佛塔（Pforta）等地建立的三所著名的"邦立学校"（Fursten-Schulen）和类似的学校外，一般中等学校都是日校，修业九年，入学前须受三年初级

基础教育。这三种类型是：(1)文科中学(Gymnasium)或称古典语文学校，学生必须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2)实科中学(Real-Gymnasium)或称半古典语文学校，学生只学拉丁文而不学希腊文；(3)高级实科学校(Ober-Realschule)或称高级非古典语文学校，或现代学校，学生只学习现代学科。

实科中学和高级实科学校取代了以前的"甲级实科学校"(Realschule I. Ordnung)；从前的"乙级实科学校"(Realschule II. Ordnung)就是现在的实科学校(Realschule)，即非古典语文学校。后者是六年制，大致相当于从前的"高级市民中学"(Hohere Burgerschule)；普鲁士的这种学校在1859—1882年经政府规定，所授课程应与"甲级实科学校"的低年级和中年级相同。现在普鲁士正式文件中已不再提"实科学校"这个旧校名了。

应注意的是，德文"市民阶级"(Bürgerstand)一词，也称"中产阶级"(Mittel-Klassen)，常常包括"下中产阶级"在内，其"上等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分界线似乎比英国划得更低一些。

实科学校的"实科"(Real)一词，同"实物"(Realien)一词相关联，它表明注重精密的科学。教育上的"唯实主义"(Realismus)就是把教学重点放在自然科学上的；而"人文主义"赞赏的则是古典语文。在德国所有较好的学校中，现代语文至今仍依照惯例被称为"新人文学科"。

"预备"(Pro-)一词，如文科中学"预备班"，表示该校只相当于"低、中年级"的程度，即学习六年，达到九年制中学的六年级(Unter-Sckunda)为止。

中等学校最主要的学科都由"首席教师"(Oberlehrer)担任教学；这种教师至少要在大学肄业三年，然后通过严格的"首席教师考试"(Oberlehrer-Prüfung)，取得"首席教师合格证书"(Oberlehrer-Zeugnis)，才有担任中等学校最高年级教学的资格。经过一

定的任教年限后，“首席教师”可以获得“文科中学教授”（Gymnasial-professor）的职称。“首席教师”一词切不可与英文“headmaster”一词相混淆，后者在德国中等学校中通常称为“校长”(Direktor)，“首席教师”相当的英文名词为“assistantmasters”。德国的“代课教师”(Hilfslehrer)，恰如英国的“短期临时授课的教师”(visiting master)，并非学校编制内的教师。

政府主持的“毕业考试”一词，德文为Abgangs-Prüfung、Reife-Prüfung或Maturitäts-Prüfung，也称Abiturienten-Examen、Abiturium或matunum。这种考试在九年制中等学校举行，现在各地都以这种毕业考试代替以前各大学自己举办的入学考试。“毕业证书”一词在德文是Abgangs-zeugnis、Reife-zeugnis或Abiturienten-zeugnis。这种“毕业证书”现在已成为德国青年入大学的唯一通行证。

“服兵役一年证书”(Einjährig-Freiwilligen-zeugnis或Einjährigen-Schein)是在中等学校肄业六年之后，即在从六年级(Unter-Sekunda)升到七年级(Ober-Sekunda)的时候，发给学生的；这张证书的持有者本应服兵役二年或三年的，得以减免为服兵役一年。他也可凭此证书享受其它特权；但那时必须放弃减免服兵役年限的特权。

从低年级起，各年级的名称如下：

Sexta，德国九年制中等学校的“一年级”（小学修业四年后开始的新学级)；Quinta，“二年级”；Quarta，“三年级”；Unter-Tertia，“四年级”；Ober-Tertia，“五年级”；Unter-Sekunda，“六年级”；Ober-Sekunda，“七年级”；Unter-Prima，“八年级”；Ober-Prima，“九年级”。德国中等学校的年级名称是按序数词的逆向排列，如以第六(Sexta)为最低年级，而以第一(Prima)为最高年级。奥地利也采用德语，却与此相反，而以Sexta为六年级，以

Prima 为一年级。

“女子中等学校” 称 Hohere Töcher-Schulen 或 Madchen-Schulen; “女子文科中学”称 Lyzeen, 相当于 Gymnasium。

IV、初等教育

师资培养——补习学校

“初等学校”叫 Volks-Schule, 即“国民学校”。在普鲁士, “中间学校”(Mittel-Schule)是高级小学, 是中等教育的边缘学校; 但在德意志其它各邦, 如巴伐利亚和奥地利, 该词就是“中等学校”的意思。

“师资培训学院”(Lehrer Seminare) 是培养初级教师的教育机构, 一般是走读学校。这学校的“教师”叫 Seminar-Lehrer, “校长”叫 Seminar-Direktor, “学生” 叫 Seminaisten。师资培训学院的“预科”叫Praparanden-Anstalten, 是培养学生准备升入“师资培训学院”的学校, “学生”叫 Praparanden。

斯堪地纳维亚的“民众高等学校” 是为青年工农设立的学院, 颇似英国剑桥大学的“罗斯金学院”(Ruskin College), 青年们于每年冬季集聚学院学习, 夏季则离校而从事他们的正常工作。德国还有仿照英国大学附设的大学推广班, 也有偶尔举办的“业余大学班”(Volks-Hochschule-Kurse)。“民众教育协会”(Volksbildungs-Vereine)负责安排这类群众性的夜校和业余补习班。

V、其它名词

allseitige: 满足多方面要求的“全面教育”, 通称博雅教育。

Anschauungs-Unterrccht: “直观教学”。

Aufklärung: “启蒙运动”; zeitalter der Aufklärung: “启蒙运动时期”, 大致与“理性主义时期”同义, 两者在时间上是同时的。十八世纪中期渥尔夫思想的盛行, 标志着这个运动达到高潮。

Dom-Schulen: 中世纪的“天主堂学校”或称教堂学校。

Einheits-Schule:“统一学校”。这种学校设想或企图满足多种不同的教育的要求。这个名词有时指一种“包括多种基础教育的学校”(Schule mit gemeinsamem Unterbau),即一种中等学校,它的课程相当于中等学校的低年级和部分中年级的课程,目的是要既适合于准备接受古典语文教育的学生,也适合于准备接受现代科学教育的学生。“革新学校”(Reform-Schulen)即其一例。

Externat:“走读学校”,相对的名称是Internat,“寄宿学校”。

Formale Bildung“形式训练”和Geistes-Gymnastik“心灵训练”的意义相同。这种教育主张开发心智而不主张灌输知识。

Fürsten-Schulen:“侯爵领地学校”,即Landes-Schulen,“邦立学校”。

Gelehrten-Schule:最高级的中等学校,特别是指古典语文学校。

Gewerle-Schulen:“职业学校”,以前是一种六年制中等学校,“高级实科学校”(Ober-Realschulen)就是从这种学校发展出来的。

hospitieren:“临时听课”,为研究和评议而临时去听课堂授课。

interkonfessionell:“非教派的”(参照konfessconell的注解)。

Kadetten-Anstalt:“军官学校”。

Klassen-Lehrer:“班主任”。

Kloster-Schulen:中世纪的“寺院学校”,“女修士学校”,有时也与“邦立学校”(Landes-Schulen)同义。

Konfessionell:“教派的”;konfessionslos:“非教派的”,也称interkonfessionell“各教派之间的”和paritatisch“同等的”。必

须明确本书中所说的“教派”，是专指“新教”和“天主教”的教派，异教教派在德国是微不足道的。本书所讲的“教堂”也是指新教的和天主教的教堂。Simultan-Schule“双教派学校”指的是在一所学校中，天主教教义和新教教义同时并授，绝不可理解为异教教义也可在学校中存在。在双教派的学校中既设新教的宗教课，也设天主教的宗教课；但其它学科则由两教派教师担任，而两派教师的人数通常须同各教派学生人数的比例相近。鲍尔生不主张把这种两教派并存的“interkonfessionelle”或“Paritätische”学校称为非教派学校“konfessionslos”；只有其宗教课不分新教教义与天主教教义的学校，始能称为“非教派学校”。

Konvikt：多指天主教的“寄宿学校”或“学校宿舍”。

Kulturkampf：“文化斗争”，指1871年到1887年间俾斯麦政权与天主教会之间的斗争。

Lyzeum：女子文科中学，有时也称Gymnasium for Girls。

Ordinarius：“班主任”，与Klassen-Lehrer同义。

Probejahr：“试用期”，高级教师的试用期一般为二年。

Ritter-Akademien：“骑士学院”，在十七、十八世纪时为贵族和骑士子弟所设的供给宿膳的学校。

Schulamts-Kandidat：有志担任教师的青年。

Seminarjahr：高级教师在“文科中学教师学院”(Gymnasial-Seminar)实习的时期。

Stadt-Schulen或städtische：中世纪的“城市学校”。

Stift：新教的供给宿膳的学校，一般是教会捐款举办的慈善事业，尤指女子学校或养老院。

Stift-Schulen：新教牧师会附设的“教团学校”。

überbürdung：“负担过重”，法文为surmenage。

我在此谨向赞助我译成此书的人表示谢意。首先，鲍尔生教

授对此书译成英文本给予热情关注，剑桥大学的赛德洛（M.E.Sadler)教授和布鲁尔(Karl Breul）博士对本书某些部分的译述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还有我的挚友安文(George Unwin)先生对我的全部翻译工作提供莫大帮助。我深感他们的盛情。

本书的英文译者劳伦兹(T.Lorenz),
于肯特，伊哥特姆，斐尔草舍(Fir Gottage,
Ighthams, Kent), 1908年3月。

参考书目录

一、有关全书的参考书

1. 《教育与教学制度百科全书》(Enzyklopädie des gesamten Erziehungs und Unterrichtswesens),十卷,施密德(K. A. Schmid)著,1876 年第二版。

2. 《教育学百科手册》(Enzyklopadisches Handbuch der Pädagogik),七卷,雷恩(W. Rein)著,1899 年再版。

3. 《教育通史》(Geschichte der Erziehung von Anfang an bis auf unsere Zeit),五卷,施密德著,1892年版。

4. 《教育史》(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四卷,施密德著,1876 年第三版。

5. 《教育史——自文艺复兴至现在》(Geschicht der Padägogik vom Wiederaufblühen klassischer Studien bis auf unsere Zect),四卷,劳玛尔(K. V. Raumer)著,1877 年第五版,见菲奇 (L. W. Fitch) 和帕金斯 (F. B. Perkins) 英译《教育史》(History of Pedagogy),第一卷和第二卷,1863年版。

6. 《课程发展史——自中世纪至现在,以古典课程为重点》(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vo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bis auf die Gegenwart mit besonderer Rucksicht auf denklassischen Unterricht),二卷,鲍尔生(Fr. Paulsen)著,1896年第二版。

7. 《教育史——以高等教学制度为重点》(Geschichte der Pädagogik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hohere Unt-

érrichtswesen)，齐格勒(Theobald Ziegler)著，1904年第二版。

8. 《德国国民教育史》(Geschichte des deutshen Volksschulwesene)，五卷，赫帕(H. Heppe)著，1858年版。

9. 《德国教育纪实》(Monumenta Germaniae Paedagogica)，克尔巴赫(K. Kehrbach)著，1886年版。

10. 《新教的学校规程》(Evangelische Schulordnungen)，三卷，福尔姆鲍姆(R. Vormbaum)著，1863年版。

11. 《德国国民学校教学方法史》(Geschichte der Methodik des deutschen Volksschulunterrichts)，四卷，柯尔(K. Kehr)著，1877年版。

二、第一卷参考书

1. 《德国教学制度史——自古代至十三世纪中叶》(Geschichte des Unterrichtswesens in Deutschland von den ältensten Zeiten bis Mitte des 13. Jahrhunderts)，施佩希特(Specht)著，1885年版。

2. 《1530年前的阿尔萨斯学校制度与教学制度》(Das Schul- und Unterrichtswesen im Elsass bis 1530)，克奈帕尔(J. Knepper)著，1905年版。

3. 《德国大学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二卷，考夫曼(G. Kaufmann)著，1888年版。

4. 《宗教改革以前与初期学校规章》(Vor-und frühreformatorische Schulordnungen und Schulverträge)，穆勒(G. Muller)等，1885年版。

三、第二卷参考书

1. 《古典文化的复兴》(Die Wiederbelebung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二卷，弗阿齐特(G. Voigt)著，1893年第三版。

2. 《德国学制史——自中世纪至现代的演变》(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Schulwesens im übergang vom Mittelalter zur Neuzeit)，卡梅尔(H. J. Kammel)著，1882 年版。

3. 《伟大的日尔曼人梅兰希顿》(Melanchthon als Praeceptor Germaniae)，哈特费尔德著，1889 年版。

4. 《理性研究与耶稣会经院哲学研究机构》(Ratio studiorum et institutiones scholasticae Soc. jesu)，四卷，帕希特勒(G. M. Pachtler)著，1887年版。

四、第三卷参考书

1.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教育制度》(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ildungswesens seit der Mitte des 17. gahrhunderts)，第一卷，霍伊鲍姆(A Heubaum)著，1905 年版。

2. 《哈勒腓特烈大学史》(Geschiche der Friedrichsuniversitat zu Halle)，二卷，施拉德(W. Schrader)著，1894年版。

3. 《腓特烈大帝时期国务大臣策德利茨男爵与普鲁士中等学校教育》(Der Staatsminister Frhr. v. Zedlitz und Preussens Schulwesen im Zeitalter Friedrichs des Grossen)，雷特威施(K. Rethwisch)著，1886 年第二版。

4. 《十八世纪德国教育改革——巴西多与慈善事业》(La Réforme de Léducation en Allemagne au 18 iéme siècle. Basedow et le Philanthropinisme)，聘劳齐(A. Pinloche)著，1889年版；见劳申费尔斯(J. Rauschenfels)和聘劳齐德文本《慈善事业史》(Geschichte des Philanthropinismus)，1896 年版。

5. 《柏林科学院史》(Geschichte der Akadamie der Wissenshaften zu Berlin)，四卷，哈内克(A. Harnack)著，1900年版。

五、第四卷参考书

1. 《德国大学》(Die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莱克西斯(W. Lexis)著，1893 年版。

2. 《德国大学与大学研究》(Die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und das Universitätsstudium)，鲍尔生著，1902 年版；蒂利 (Frank Thilly) 和埃尔王 (W. W. Llwang) 英译本，(The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Study)，并附赛德洛 (M. E. Sadler)序言，1906 年版。

3. 《普鲁士文科中学、实科中学和实科学校》(Die preussischen Gymnasien und Realgymnasien und Realschulen)，诺伊格鲍尔(J. F. Neugebaur)著，1835 年版。

4. 《普鲁士教育制度》(Das Unterrichtswesen des preussischen Staats)，二卷，罗内(L. V. Ronne)著，1854 年版；《普鲁士宪法与行政管理》(Verfassung und Verwaltung des preussischen Staats)，第八篇。

5. 《普鲁士中等学校教育制度——历史统计表》(Das hohere Schulwesen in preussen. Historish-statistische Darstellung)，四卷，魏赛(L. Wiese)著，1864等年版；该书第四卷伊尔默尔(Irmer)著，1904 年版。

6. 《普鲁士中等学校法令与规章》(Verordnungen und Gesetze für die hoheren Schulen in Preussen)，二卷，魏赛著，1886 年第三版。

7. 《普鲁士中等学校与师资》(Die höheren Schulen in Preussen und ihre Lehrer)，拜尔(A. Beier) 著，1902 年第二版。

8. 《普鲁士国民学校制度》(Des Volksschulwesen im preussischen Staat)，三卷，施奈德(K. Schneider)和布雷曼 (V. Bremen)著，1886 年版。

9. 《德国教学制度》(Das Unterrichtswesen in Deutschen Reich)，五卷，莱克西斯(W. Lexis)著，1904年版；泰姆生(G. J.

Tamson) 英译本《德国公共教学简史与组织概况》(A General View of the History and Organisation in The German Empire),1904 年版。

10. 《普鲁士中等学校制度的改革》(Die Reform des höheren Schulwesens in Preussen), 莱克西斯著, 1902 年版。

11. 《舒尔慈与当时普鲁士的中等学校教学制度》 (Joh. Schulze und das höhere preussische Unterrichtswesen in seiner zeit), 法伦特拉普(C. Varrentrapp)著, 1889 年版。

12. 《回忆录与行政经验》(Lebenserinnerungen und Amtserfahrungen), 二卷, 魏赛著, 1886 年版。